

100

— 1922-2022 —

復旦大學

經濟學科百年特刊

FUDAN ECO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全球校友會



“復旦經院全球校友會” 微信公眾號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校友服務中心
電話: 021-55665306 / 傳真: 021-55665306
Email: econalumni@fudan.edu.cn



100

— 1922-2022 —

復旦大學
經濟學科百年特刊

FUDAN ECO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回望百年辉煌，续写时代华章

从1922年经济系成立至今，复旦经济学科已走过百年征程。百年来，复旦经济学科的发展始终同时代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我们隆重地纪念她的百年华诞，是想通过一场仪式感极强的活动加深我们的思考：复旦的经济学科是如何来的，我们又将去往何方？

回望百年，不忘来时路。百年前，上海自开埠通商后发展迅猛，上世纪30年代一举跃升为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刺激人才需求急速增长，建立系统规范的本土经济学高等教育体系迫在眉睫，复旦经济学科应运而生。经济系成立后的十余年间，李炳煊、唐庆增、夏炎德等诸多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加入教师队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学科氛围初显。抗战爆发后经济学系随校西迁重庆，战火纷飞中授课不停、传承未止，以朱伯康、张薰华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革命风雨中成长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许涤新、吴斐丹、漆琪生等为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执掌教鞭，复旦成为南方的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根据国家经济战略安排，包括蒋学模、伍柏麟先生在内的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被送往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经济学家的培训，此后成长为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对国际化、专业化、精细化人才培养的需要，复旦在全国较早地陆续成立了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和公共经济系，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经济系分离出经济管理系，即现在的复旦管理学院的前身。可以说，复旦经济学科自诞生之日起便紧贴时代脉搏，和国家、民族呼吸相通、命运与共。

回望百年，不忘挖井人。我们盘点了复旦经济学科发展百年来的大事，记录了一代代忠诚于科学研究理想、致力于服务社会进步的复旦经济学人的扎实耕耘。正是他们的接续传承，成就了如今复旦经济学科稳居国内第一梯队和全球中国经济研究重镇的领先地位。而更多的复旦经济学人从这里出发，在各行各业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国家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正是他们的勉力前行，源源不断地扩大和提升了复旦经济学院的影响力和声誉。诚实与扎实，是经院百年以来薪火相传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经院所期望塑造的每个学生能够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我相信，诚实与扎实同样也是我们世界各地4万多校友的共同口碑。

提及复旦经院的百年辉煌成就，每一个经院人的自豪感都会油然

而生。学院取得的成绩是复旦大学成长和进步的缩影，而复旦的进步又折射出中国崛起的现象以及与日俱增的综合实力。进入新时代后，复旦经济学院以“上天入地”为目标，着力推进学科创新升级。“上天入地”意味着，学术研究既要创一流，接轨并跻身国际前沿；也要接地气，厚植并服务中国大地。十年来，我们持续不断地优化制度、改革政策、增大投入，兢兢业业地朝这一目标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近年来，我们的很多努力和工作都在逐步产生显著的回响：学院直升海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越来越多，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的高水平硕博论文越来越常见，海内外人才引进的高留存率越来越稳定……这一系列变化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向世界前沿稳步迈进的体现，这些成果来之不易，我们的教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经济学院担当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我们的学问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密切关注中国问题，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注重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提升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的能力。如今，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院以及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研究平台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智库机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

听闻学生们戏称经济学院是“卷院”，我暗自欣喜：这说明年轻的、优秀的他们能在这里学到真本事、真东西，经济学院没有辜负他们澎湃的热情与美好的憧憬。共生共存、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有效有益、便捷可达的成长通道，互惠互利、教学相长的一流师资力量——学院竭尽所能服务学生的需求，在竞争激烈的国内乃至全球环境中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经世济民，追求卓越”是经济学院的行动指南，站在开启新百年的节点上，我们将再接再厉打造一个有追求、有情怀的经济学院：我们将继续优化资源配置，升级改造软硬件基础设施；动态调整激励机制，吸引新生力量联翩而至；重视服务校友需求，争取促进学院、学科发展的有效社会支持。

未来已来，建设“第一个复旦”的目标意味着经济学科也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未来的百年一定将更加辉煌，因为时代在进步，中国在复兴，中国经济崛起的现象需要中国叙事。中国叙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有何影响？对变革西方中心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有何贡献？将来的世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中国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思考这些问题的重任落在了更年轻一代的复旦经济学人肩上。愿诸君怀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强烈的责任使命感、更深切的社会关怀，共同努力，不负时代召唤，推动复旦经济学科走向更高的成就，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知识体系迈入更加发达和先进的阶段做出更大的贡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会长



FUDAN ECONOMIST

復旦大學經濟學科百年特刊

编委会主任 | Director Of Editoria Board

张军 Zhang Jun

编委会 | Editoria Board

赵定理 Zhao Dingli / 俞乃奋 Stephany Yu

李粤江 Li Yuejiang / 刘军梅 Liu Junmei

总编辑 | Executive Chief Editor

窦锋昌 Dou Fengchang

主编 | The Editor on Duty

卢洁 Lu Jie

常务编委会 | Editor

王晓莉 Shirley Wang / 吕晓刚 Lv Xiaogang

邱佳佳 Qiu Jiajia / 朱家菲 Zhu Jiafei

梁冰 Liang Bing

记者 | Journalist

段旭昶 何思妍 黄琛 李大武 梁好 林珺瑶

林苗 卢洁 马雪迎 沈娇娇 万嘉茵 万晓强

王嘉怡 温瑞琪 张淑凡 朱怡

美术编辑 | Art Editor

南风窗杂志社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
Alumni Associa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Alumni Service Center,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第一阶段

首开先河，筚路蓝缕：
创立发展时期（1917年—1949年） ····· 06

薛仙舟：探索合作运动之路，奠基复旦商科发展 ····· 12

李权时：让中国经济登世界学术之林 ····· 15

李炳焕：以理论回应现实关切，构建与时代共进的经济学新体系 · 17

吴斐丹：赤诚心，精诚魂，做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开拓者 ·· 20

樊弘：大家精诚，无限热爱 ····· 24

漆珉生：鸿儒硕学求真理，兼容并包传大道 ····· 27

夏炎德：生命不息、求索不止，学贯中西的奠基者 ····· 31

第二阶段

栉风沐雨，困知勉行：
调整发展时期（1949年—1984年） ····· 35

许涤新：涤旧创新求济民，桃李争辉遍四方 ····· 43

朱伯康：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笔耕不辍书写学科辉煌 ··· 48

陈绍闻：白首穷经做学问，诲人不倦育英才 ····· 52

伍丹戈：享誉国际的明清经济史家 ····· 56

第三阶段

继往开来，踔厉奋发：
改革发展时期（1985年—2015年） ····· 60

蒋学模：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 70

张薰华：贱尺璧而重寸阴，以“经世”之传统助学科之蕃昌 ··· 74

宋承先：不倦历历，皓首穷经，博古今，通中西，绘就学科璀璨 · 78

陈观烈：奠基复旦金融学，济世师亦百代师 ····· 82

洪文达：世界经济研究，栽下一棵树终成一片林 ····· 86

蒋家俊：振奋神州研经济，培栽桃李诵诗文 ····· 90

CONTENTS

目录

郑励志：以大家之洞见，开时代之先声 ····· 96

余开祥：以毕生之功力开拓世界经济之研究 ····· 101

叶世昌：求真求实，无问得失，冷板凳上写就中国经济史学新篇章 ····· 104

伍柏麟：言之求是，为之力实，接力铸造学科“黄金时代” ····· 108

洪远朋：立足中国，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命题 ····· 112

施岳群：引“数”入“文”，探索实践，谋求经济学科的改革转型 ····· 116

尹伯成：做一生“求学”与“耕耘”的复旦人 ····· 121

吴申元：与大师同行，共铸学科“黄金时代” ····· 125

陈伟恕：求学求真，日进日新 ····· 128

徐培华：五十年不改学术初心，以哲学贯通中西古今 ····· 133

舒元：百舸争流，追求卓越，探索经济学的新发展 ····· 136

黄亚钧：学于复旦，教于复旦，见证复旦经济学院的两个十年 ····· 142

袁志刚：时代无言，下自成书 ····· 145

第四阶段

与时俱进，笃行不怠：
创新发展时期（2016年—2022年） ····· 152

张军：学术永远是年轻人的事 ····· 160

石磊：以高标准建设学科，以宽思政作育英才 ····· 167

姜波克：西学东渐立国金，固本培元桃李兴 ····· 173

张晖明：时代巨变，坚守初心，打造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 180

陈诗一：重务实、行践履，练究经济之学 ····· 184

刘红忠：汇通东西学说，创新学科建设 ····· 189

张金清：踔厉奋发，奋楫笃行，接力共铸学科新高峰 ····· 194

田素华：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能力的复旦经院人 ····· 198

封进：巾帼雄志，以科学与想象力共筑学科繁荣之路 ····· 203

寇宗来：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接力共谱复旦经济新华章 ····· 207

刘军梅：尽其所能，道在人为 ····· 210

陈钊：做经济领域建设性的批评者 ····· 214

许闲：良师益友，创新开拓，谱写复旦保险学的新篇章 ····· 217

詹璐：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 220

第



阶

段

首开先河，筚路蓝缕： 创立发展时期(1917年-1949年)

树高千尺有根，江河万里有源。日往月来，时移世易，回望百载峥嵘光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历史的起点可以一直追溯至1917年的9月。

彼时，复旦公学扩建为复旦大学，商科自此诞生，与文、理两科鼎峙而立，遂形成大学本科体制，学制为四年。“其时国内各大学之设立商科者，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得风气之先矣。”可以说在国内首创了本科体制内的商科先河。

初成立时，复旦仅设普通商业系，以“灌输近代商业管理与经验，造就适用于实用之商业专门人才”为宗旨。次年3月，师生合股的复旦大学合作商店（下称合作商店）成立，而后一年，在薛仙舟先生倡议和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又建立了“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下称合作银行）。二者作为经济学院的前身，是商科的最早实践基地，同时分别是中国最早的合作社与最早的信用合作社。

合作商店最初资本200元，同年次学期扩

充至500元，分125股每股4元，股东纯为复旦员工。经理为何乐清先生，凡商科学生都可以在复旦合作商店实习当营业员等，营业状况甚佳。而合作银行以提倡合作主义，发展民众经济为宗旨，以补助小资本营业、鼓励同胞储蓄为目的；每有盈余，抽20%为平民教育经费，余则存户与股东均分。合作银行由校长李登辉兼任董事长，各部职务由全体行员轮流分担，各行员都能得到实习全部行务的机会。如此，合作银行便为商科学生提供了极佳的实习场所，造就了许多熟悉行情及其业务的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创举。

此外，复旦大学还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学校的膳食，此亦为国内大学的首创。不仅节约了食堂的管理费用、降低了膳食成本，又做到主食和副食的搭配、花色品种繁多，适应来自各地同学的口味，而且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李登辉校长对此颇为欣赏，常亲自与各桌同学轮流



1922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成立。图为1923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会集体照

共餐，趁机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改进学校行政工作。

实际上，重视合作和交流是复旦经院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良传统。早在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薛仙舟先生在复旦任教时，鉴于贫穷积弱的中国需要人们之间的互助协助，就首创了“合作运动”。而后他在复旦讲授“合作主义”课程，从教学开始，宣传研究和实践合作思想，创立和发展合作事业，并让其成为经济学科学生的实践基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合作事业专门人才。由此，复旦大学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

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平民周刊社正式成立，它是复旦大学教职工与学生共同组织的研究团体，最初并未专门宣传合作社思想和制度，而是“提倡平民主义，促进平民教育”。在薛

仙舟先生的影响和推动下，平民周刊社逐渐趋向合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它的刊物——《平民》周刊，成为我国早期宣传行和研究合作社制度的主要舆论阵地。出版三四期以后，薛仙舟先生主张《平民》周刊专门发表合作上的文字，以便扩大宣传。于是《平民》周刊自第五期以后纯粹为一种研究“合作”的出版物，是那时国内宣传合作运动最早、五四期间在全国影响颇大的刊物之一。

不久，平民周刊社扩充为出版、图书、合作购买三部门，定名为“平民学社”。短短三年内，《平民》周刊已经出至160期，“合作丛书”出版近20本，例如孙寒冰所著的《合作主义》；陈仲明所著的《波兰的合作运动》《匈牙利的合作运动》；王世颖所著的《农业金融概论》《合作原论》《农业合作经营论》；寿勉成所著的《中国

合作问题》；陈仲明、罗虔英合著的《合作经济学》《合作供销企业之研究》；寿勉成、郑厚博合著的《中国合作运动史》；章鼎峙所著的《合作会计学》等等，平民学社社员达100余人。

同样在1920年，商科分设了银行系与工商管理系，两年后改设理财系、商业系。

1922年，复旦大学设立经济学系，隶属于文科。至此，复旦大学形成了既包括应用经济学（商科）又包括理论经济学的完整经济学科。

诲人不倦，春风化雨，经历四年的培育，复旦大学于1921年7月1日举行了首届商科学生毕业典礼，校长李登辉亲自担任了主持。首届商科毕业生计15人，占全校毕业生总人数的65.2%。

而在这年的春季，商科学生注册人数增至128人，占大学部学生注册总人数的58.1%。秋季，商科学生注册人数更猛增到了154人，已经占到大学部学生注册总人数的62%。商科成立四年即发展为全校规模最大的学科。

随着学生队伍日益庞大，课程也逐渐增多，1917年商科教授课程4种，1920年增至18种，足足是原先的4.5倍。由于事务繁忙，还专门设立了“商科学长”（即教务长）一职，首任学长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蔡竞平。

在蔡竞平之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权时也担任了商科学长的职务。在他的主持下，商科系科设置得以调整，设立银行金融系和商业管理系，加强了专业课程，开设的课程包括会计学、高等会计、成本会计、铁路会计、审计学、统计学、投资学、保险学、工商心理学、公司理财、商业地理、商法、国外汇兑、财政学、商业文件、商业英文等。

在李权时的建议下，从1924年开始，原来的学年制被改为了学分制，学生修完132学分

毕业。全部课程分为大学必修课程、商科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各系选修课程四类。商科学生在入学二年中修完基础课后，可根据个人志愿任选系别，攻读专业课程，提高教学水平。

是年，复旦大学重订《复旦大学商科章程》，分编制、学程、入学资格、投考、入学转学转科及退学、缴费、学年学期及休假、告假、考试及补考、学分毕业及学位、奖励、惩戒、附则等13章共74条。复旦大学设研究院及大学二部。大学生须学完168学分始得毕业。研究院可授商科硕士学位。

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加快，1925年12月，科科的“特商班”应运而生，以满足培训人才的需要。第二年，复旦大学经济学会成立，商科增设会计学系和国内外贸易系，更创建了商业博物馆，分商品陈列部、商业图书部二部。

1929年，系科改组的号角在复旦大学吹响：经济学系改属法学院，商科改组为商学院，下设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国内外贸易系。李权时先生（1930~1938年）与李炳煥先生（1939~1949年）先后出任了商学院的院长。

本科生之外，经济学科也终于在1930年迎来了首批毕业的4位硕士研究生，分别是经济学系的许藩芳、罗谦树、袁际唐与工商管理系的何伯禧。其中，袁际唐先生在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国民储蓄合作银行”行长。

1934年初，教育部派员视察复旦，认为“分系太繁”，令学校裁撤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校务会议、校董会对此展开讨论，最终决议向教育部申述理由，维持商学院原有四系。

七七事变，枪声与炮火声席卷宛平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



1946年，国立复旦大学商学院学生毕业留念

日，日军进攻上海，导致复旦的校舍多处被炸毁。12月，南京传来失守的噩耗。为保证师生的安全，商学院、经济学系随学校先迁往江西庐山，后又迁至重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离开了上海。1938年2月，留沪的师生在复旦沪校（位于北京路信托大楼余屋）复学上课。包括法学院经济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在内共设有4院12系，作为经济学科首批硕士毕业生的袁际唐先生便在这一时期（1941~1948年）任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会计学系主任，为教学工作付出了大量努力。

国土的另一边，商学院统计学系于这一年的秋天在重庆成立，“开创了我国大学制中有统计学系的先例”。统计学系以“训练专门人才

为宗旨”，在四年学习过程中，每年有一中心课程：第一年为普通统计学及统计应用数学；第二年为高等统计学及二年级统计应用数学；第三年为数理统计及经济统计学；第四年为统计专题研究。前二年为普通技术掌握，后二年为理论深入研究。其主要课程包括统计应用数学、制图学、高级统计学、社会统计、数理统计、生活统计、经济统计、保险数学、统计行政、统计实务、基本国势调查、商业循环、统计论文等。统计系学生还须选商学院或法学院任一系为辅系，在其中修满十二学分。

此后，在这段炮火动荡的岁月中，经济学科一路增设与调整，1939年春，设统计专修科。次年，成立复旦大学经济研究室。1942年秋，“为

培植银行之技术人才及业务人员”，与旧交通银行合办银行专修科，由交通银行提供经费，复旦大学负责教学，“学生免交学费，但入学时须填具志愿书，声明毕业后，有在交通银行任职之义务，银行有尽先任用之权”。学制两年，主要课程有包括国文、英文、经济学、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数学、财政学、公司理财、财产保险、金融市场、银行会计、银行制度、银行实务、国际汇兑、信托事业、农业金融、仓库学。此外还有选修课如打字、珠算、计算机实习等。

1944年，商科研究所创办于重庆。当年，“复旦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空气，提高学校地位，向教育部提出设立文史、经济与统计三个研究所，当时教育部以该校商科较有历史，仅准设立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以造就经济研究人才。”商科研究所主任及经济学部主任都由李炳焕教授担任，而“师资由大学部经济系及商学院各系教授兼任，又曾聘请校外部分经济学家兼任”。

秋季，研究所开始招生，甄选研究生的标准，着重在研究工具（国文、英文、统计学）的精娴及基本理论（经济学，经济思想，经济史，货币银行学）的修养两方面。只有具备优良的研究工具并健全的基本理论修养，才能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研究所在甄选研究生时，绝不放松这两个标准。

1945年冬至1946年夏，李炳焕负责复旦复原任务赴沪，所务及部务系由樊弘教授兼代。1946年，全国高校最早的合作学系在复旦开设，以“培养合作经济的研究与实务人才”为目的，分供合组，农合组、工合组。合作学系学制四年，主要课程有合作运动史、合作法规、合作行政、合作会计、中国合作问题研究等二十

多门。合作学系系主任是陈仲明（1947~1949年）。他在担任复旦大学合作经济系主任期间，亲自任教，向校方争取到一汽车库改为系图书馆，并提供图书和经费。陈仲明注重从实践中培养学生，合作系的学生在一年级就可以利用暑假，到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各地合作企业学习，在工作里获得成长。

此后一年，商科研究所迁沪，并改名为经济研究所，隶属于法学院经济系，“主任一职亦因此改由当时经济系主任漆琪生教授兼任，至1949年上海解放止”。经济研究所下分经济理论、经济史、财政金融、经济统计四门，每门设导师一至二人，主要的研究生导师有李炳焕、樊弘、储凤仪、夏炎德、唐庆增、祝百英、周柏棣、王毓瑚、漆琪生等。

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侵略战争当前，复旦学子也纷纷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武器，投身抵御外侮的事业。1947年，经济学系以读书研究经济理论为名义，成立了名为“经济科学研究会”的群众性社团，团结进步师生，与反动势力作斗争。这一年，经济学系也成为了复旦大学最大的系，本科毕业生达131人，占全校毕业生总人数的25%。

经过地下党员串联酝酿，向校方提出申请，“经济科学研究会”得到了当时经济学系主任漆琪生教授的支持，于1947年上半年成立，由汪濬、孙定输、林猷榜先后任负责人。“经济科学研究会”成立时只有10多人，后发展为20多人。这样，就把经济学系的进步学生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

1948年5月，合作学系以大型“剪报”资料展出美国扶植日本的事实。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合作学

系成为全校少数几个进步学生的堡垒系之一。当时中共复旦大学总支部书记李汉煌曾表扬了合作学系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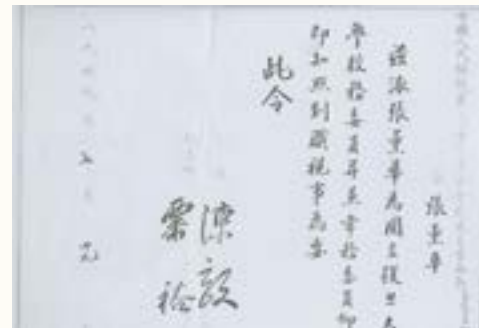
在1948年底至上海解放前，合作学系的学生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利用合作学系图书馆有油印机和纸张的有利条件，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并在全校秘密散发。又如收听延安的广播，加以刻印传播。陈邦才还刻印上海学联编辑的《学生报》。戴幼樵还参加了绘制国民党军队建造在校宿舍周围的碉堡的分布图。

据截止2010年的调查统计资料，在1949年全中国解放前，复旦大学（包括上海医科大学）共有革命烈士28位，其中经济学院有邓鏊、梁添成、黄君珏、何以文、杨奚勤、唐慕陶、何柏梁7位革命烈士，占全校总数的四分之一。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彻底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终于走出黑暗，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迎了解放与新生。

经陈望道老校长提议，学校的校庆日也在复旦大学第二十四次校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最终定为了5月27日这一天，以纪念新时代的开始。巧合的是，四十余年前的5月27日，复旦公学师生在《时报》刊登申明，使“复旦”一词正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在新中国成立前，复旦大学商学院和经济学系为我国经济事业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截至1949年，共培养毕业生3364人，占全校历届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本科毕业生3123人，专科毕业生241名；另有研究生



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署的张简华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的委任书

20余名。他们在祖国经济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成了国内著名的理财专家，有的更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总的而言，复旦的商科在这一阶段诞生，相应建立与发展了商学院。同时，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逐步设立完善，不仅是复旦大学成立时间最早的教学科研机构之一，而且是国内高校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之一。自这时起，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科就始终坚持培养经世济民的栋梁之材为己任，始终紧密把握国内外经济理论的前沿动态，始终高度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主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李权时、唐庆增和夏炎德为代表的一代大师鸿儒，奠定下了复旦大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深厚根基。

纵使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经济学院的前辈们仍保持着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姿态，巍然砥柱，屹立中流，在复旦探索、创立、发展了经济学。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院的历史也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薛仙舟(1878-1927),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银行家,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中国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时年49岁。

薛仙舟： 探索合作运动之路，奠基复旦商科发展

文 | 马雪迎

“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

也”“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曾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之时撰文《大哉薛仙舟师，吾无能名焉》，其间一连七个排比句，勾勒出薛仙舟先

生的多样身份和传奇人生。而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

动荡时局下，走上合作救国路

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

受康梁改良思潮影响,薛仙舟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

薛仙舟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在留学期间,抓紧时间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薛仙舟在课余时间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痛恨。

到德国后,薛仙舟则获得了更大启发。彼时,“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而德国正是合作主义的发源地,有着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在德国留学期间,薛仙舟听讲座、做研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

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

这一文件集中展示着薛仙舟一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亦成为了民国时期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身处复旦间，推动学科速发展

薛仙舟和复旦的故事始于1914年,彼时应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李登辉的邀请,薛仙舟来到复旦任教,讲授德文、公民、经济等课程。

1917年,复旦决定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商科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运动期间,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

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
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

学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

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补助小资本营业”理念的引导下，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因此发行周刊，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的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

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转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在《平民》上发表了《日本新创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平民》写过稿。《平民》引起大众的关注，发行量猛增。办刊四年间，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其中约600篇为译文，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

至今，复旦大学校史馆仍有一个被人牢记的曾用名——“仙舟图书馆”。薛仙舟先生逝世后，复旦大学特意将新建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李权时： 让中国经济登世界学术之林

文 | 马雪迎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稿活动，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封征稿信，旨在征求“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是怎样？”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两个问题的答案。这场前所未有的、规模空前的“征梦”活动一时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包括了柳亚子、

李权时（1895—1982），字雨生，浙江镇海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商科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等校教授，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还担任中国经济学社理论刊物《经济学季刊》总编辑，上海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周报》社经理兼编辑等。

—
生于忧患时代，
李权时始终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在经济学研究之路上探索着救国振兴的方向。
—

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而这些梦想中，有一条格外掷地有声：“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这条梦想便出自时任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李权时先生。生于忧患时代，李权时始终以“天下大同”为理想，在经济学研究之路上探索着救国振兴的方向。

1918年，李权时毕业于清华学堂，两年之后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方向博士。博士毕业后，李权时旋即回国。

1927年，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出版，这是其第一本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同时也是最早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经济思想的简易通史；1934年，李权时的《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一书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民国经济思想史。

李权时研究思想史，兴趣不仅止于思想史本身，而是希望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梳理

我国传统文献中类似的经济思想，以推动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加强国内经济学的研习。

1929年，李权时开始主编《经济学季刊》，其办刊的初衷便是“让中国经济在学术界可以登世界学术之林”。

据统计，李权时先生编著出版的著作达到41种之多，这在当时国内经济学人中是罕有的。今时今日，谈及国内早期“财政学”“中国经济思想”或是“商业制度”等领域的研究，都绕不开李权时先生。

复旦大学经济类学科早年的建设和扩张，李权时先生同样功不可没。李权时回国后，曾在复旦大学先后历任商科学长、经济学系第一任系主任、第一任商学院院长。正是在其担任商科学长之后，1924年，复旦大学商科学生人数到达301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67%之多。

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成员之一，为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理论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炳焕（1900—1975），历任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商学院银行金融系主任、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等职。任内发起建设复旦大学经济研究室、商科研究所，为后续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开设高等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分配论、世界经济史等课程，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科新体系建设贡献尤著。

李炳焕： 以理论回应现实关切， 构建与时代共进的经济学新体系

文 | 万嘉茵

李炳焕（1900—1975），福建闽侯人。192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后在上海南洋商业学校（1922—1923年）、厦门集美学校（1923—

1924年）、上海复旦中学（1924—1925年）任教。1925年9月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深造，1926年7月获硕士学位后，应李登

辉校长之邀回国任教于复旦，开设经济学原理、分配论、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并多次在复旦商学会会刊《商学期刊》中发表论文、于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发表经济学主题演讲。另有与沈麇先生联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的《苏联计划经济问题（上下册）》，系中国近现代首批系统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著述之一。

同年，李炳焕先生与黄澹哉女士、黄俊升先生合译的《经济思想史》由黎明书局出版。该书原著系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 A. Scott的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而译稿的底本则是李炳焕先生讲授《经济思想史》的讲义，经其自述：“教授经济思想史前后凡八年，课本屡次更换没有得到适当的教材，前年

（1934年）读了史考特的原著，爱不释手”，于是这部佳作才在师生之间课上课下释疑解惑的共同努力下译成书稿。

尽管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教育，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李炳焕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是不同的，不能将二者作同一的观察”，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需从历史处加深了解。1937年5月26日，李炳焕在暨南大学所作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演讲中，详述如何搜集经济史资料、辨别史料真伪及整理史料的方法，并列举大量经典中的体现古代经济思想的语句，博引参证，叙述精湛，不仅赢得了满堂喝彩，也展现了李炳焕先生学贯中西、坚实可靠的学术功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复旦大学师生迁往北碚成立渝校。1938年2月至1946年7月，李炳焕先生赴任复旦大学渝校商学院教授兼院长，兼任渝校代理教务长、招生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条件下，李炳焕与一众复旦教师在努力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不改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坚守一方安静的书桌，积极指导经济系同学的交流汇报和课外研究。

1941年6月，经李炳焕先生、吴其祥先生，研究员李蕃，吴斐丹，张光禹，邹依仁，蒋一贯，林一新，奚玉书先生及助理员王公维，吴立本，张正元等先生苦心擘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室在渝成立。在此基础上，复旦商科研究所于1944年正式成立，并于8月底首次招生。所中教师言，“商科研究所是本校商科从实务阶段进至理论阶段的产物”，因时局和经费关系，暂先设经济学部，下分经济理论、经济史、



—
尽管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教育，
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李炳焕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

财政金融及经济统计等四门，所主任和经济学部主任皆由李炳焕先生担任，除此之外，李炳焕还负责讲授《经济理论》的课程。据《复旦》记载，研究所至1946年已有研究生13人，师生于每周三晚举行研讨班、每周四晚举行“近代货币理论讨论会”，围绕罗伯逊、凯赛尔、哈耶克、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理论展开讨论；每周六晚的“星期座谈会”则是延请名家教授前来讲授。

此前，李炳焕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西方经济学原理、思想流派学说与分配论方面。抗战期间，李炳焕利用空运来渝的图书、影片继续研究，其研究方向开始了由国外向国内、由理论阐释到理论创新的过渡。具体表现在其对国内战时（及战后）经济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当代经济学新体系的思考。抗战结束后，李炳焕作为“急先锋”被委任返沪处理回迁接收事宜，不久于1946年12月19日发表《经济学新体系》演讲，由此开启复旦经济系新的发展历程。

演讲中，李炳焕直言不讳道：“一般的经济学家，不过承继传统的经济学说而多少加点修改便了，始终没有依据时代环境而独创新体系。”他大胆点出西方传统经济学中过于偏重价值论和静态均衡论两大缺点，并就此提出

要建设一个“以价格论代替价值论”“重视经济制度研究”“强调经济计划”“以‘过程’代替‘均衡’”的经济学新体系。此外他还创新性地提出经济研究中“分析”、“溯源”和“综合”三大方法应紧密结合才能得出健全结论。以此为蓝图和起点，复旦经济系为本科新生引入了微积分、统计学课程，培养方案更为科学完善。

除了革新国内经济学气象外，李炳焕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专业而学术的态度回应公众对战后国内经济形势的疑虑，对当时“新经济改革方案”“币制改革”“金融管制”等问题提出了不少专业意见。鉴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和经济复员建设的迫切性，李炳焕于每周三在上海《新闻报》主编《经济周刊》专栏，力图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交汇，沟通经济专家意见，使得战后国内经济建设逐渐开展。

投身复旦经济学系三十载，李炳焕先生爱护母校，不离不弃，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在外人看来，他总是身着蓝布长衫、只坐三等电车，是让茶房小伙都惊叹其节俭程度的大学教授；在学生看来，他一直都是那位面容和善、欢喜和学生交谈的李院长。■



吴斐丹(1907-1981),浙江省义乌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致力于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人口问题的研究。1931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33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习经济理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回国,担任过《申报》战地记者等。1939年重执教鞭,先后在中央大学、朝阳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商学院、政治大学和复旦大学担任教授或兼职教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政治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翻译和撰写的专著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经济组织论》等。

吴斐丹： 赤诚心，精诚魂，做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开拓者

文 | 李大武

1939年5月,吴斐丹受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李炳焕邀请,前往迁居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教书。自1939年下半年起,他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兼任教学工作,主讲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1941年至1943年间,吴斐丹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又当选为政治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但考虑到行政事务对教学、研究的影响,他不久后就辞去了这些职务,专心于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

虽然长期在高校任教,但他并没有养成静坐在书斋里的习惯,也没有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学究气。他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否则学术研究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

义。他做学问总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农村经济、财政金融、人口问题到外国经济学说史等领域都有所涉及,并撰写了大量鞭辟入里的学术文章。

这份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与吴斐丹求学早期的社会运动经历密切相关。1927年,他前往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读书,担任了本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与学生会负责人。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俊爱护青年,思想进步,给予了吴斐丹许多帮助。但随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吴斐丹目睹了敬爱的李汉俊老师与部分同学被枪杀在大学附近的东厂口省议会广坪。



青年时期的吴斐丹(上排右4)

现实的残酷打击并没有令他颓唐，更激起了他以国家和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深重使命感。

1928年，他转学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希望通过社科研究为中国寻找变革复兴之道。在复旦求学期间，他依然参与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左翼作家联盟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进步组织，积极开展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

抗日战争结束后，吴斐丹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结合自己教学工作，进一步开展了对旧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撰写了《战后我国财政建设要点》《当前的中国银行制度问题》《中国经济危机的分析》等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搞通货膨胀、从经济上掠夺城乡人民的种种事实，将反动当局贪污、盗窃成风的现状和盘托出。

随后，吴斐丹教授于1947年在《中国农业经济的危机及其补救方策》一文中将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归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入，致使农产品价格低廉；加之受农村高利贷的盘剥，加重了农民租税负担，致使土地兼并和集中。对于这篇文章，吴斐丹先前所指导的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伯成说：

“这些分析虽有一定局限性，但这说明吴斐丹已认识到旧中国农业衰落之根源在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这种认真负责、严谨踏实的精神也同时体现在吴斐丹的课堂上。新中国成立后，吴斐丹先生进一步投入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近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观点错综复杂，经过深入研究后，他坚定认为，只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各项经济学说的思想、社会根源，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科学评析各项经济学说观点，才能对人类历史上的种种经济学说有完备透彻的认识，在其指导下寻找出一条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因此，吴斐丹一贯对学生们强调，要通读并理解《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典。

《外国经济学说史》是当时经济系学生最主要的课程之一，因此历来都由系里声望较高的吴斐丹负责。尹伯成回忆：“他上课时总备有一本厚厚的讲稿，但从照本宣读，而是完全脱稿讲授。在讲解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把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穿插在其中，将新旧社会进行对比，用正确的道理启发和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

而在掌握了入门经济学说史的“金钥匙”后，最重要的便是阅读掌握各经济学派的代



吴斐丹(右一)一家

表作，丰盈经济学说史知识框架的“血肉”。不仅要每一个重要学派、代表经济学家的观点想明白、讲清楚，还要追溯源流，理清脉络，将每个学派、人物的观点串联起来，形成一幅层次分明、辽远壮阔的经济学说史演变“画卷”。

吴斐丹学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表达生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课堂之外，吴斐丹也会抽时间去看望学校里的青年学生们，嘘寒问暖，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吴斐丹知道学生们多数在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这个吃完晚饭的时间里待在宿舍休息，他便利用这个时间跑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们谈心，而自己吃晚饭的时间常安排在晚上七点钟以

后。他对学生们的用心付出同样被学生们看在眼里，他因此受到学生们的由衷敬佩与景仰。

在授课之余，吴斐丹注意到，当时经济系外文资料室里的许多刊物无人问津。他不忍好书蒙尘，萌生出翻译推广其中有价值的文章的想法。1957年，在吴斐丹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文汇》开始出版，由他担任第一任杂志主编。吴斐丹希望借此将国外刊物中有价值的文章译介到国内，因此早期《文汇》全部的文章都是国外经济文献译本。时至今日，在无数师生的支持与努力下，《世界经济文汇》已然成为国内权威经济学刊物之一。斯人已逝，其所遗留的无穷精神财富依然浸润着整座学院，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
吴斐丹学识渊博，
讲课时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表达生动，
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



樊弘，著名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于凯恩斯经济学说研究。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3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39年归国后任湖南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顾问等职。著作有《现代货币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等。

樊弘： 大家精诚，无限热爱

文 | 李大武

学术精进

《现代货币学》是1946年樊弘于复旦大学任教时所著，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

序中，樊弘谦逊地表示，书中的学说没有一点是自己发明的，他仅仅是把罗伯逊、凯恩斯、林达尔、马克思等人的“货币学说重新加以条理

而已”。

樊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这与其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1937年，樊弘在胡适的引荐下，前往陈岱孙处申请“庚子赔款”赴英研究奖学金。在胡适担保、蒋梦麟亲笔信推荐的情况下，他如愿申请资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樊弘深入比较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凯恩斯刚刚发表不久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撰写了《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一文。

该文于1939年10月发表于英国的《经济研究评论》第7卷第1期，引起英国学界重视。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的文章，樊弘在文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贡献，提出凯恩斯是以另一套术语讨论了马克思业已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并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意见。

1968年，该文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在澳大利亚学者霍华德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中，樊弘也因这篇论文成为书中唯一被编入书后索引的中国学者。

樊弘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论文100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尤其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精深研究。他于1952年曾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是我国较早应用比较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鼓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张薰华曾如此评价：“当时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学生运动），育人上对学生亲切。”彼时，在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樊弘邀请著名学者崔明奇在复旦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仍缺助教。当届经济系毕业班上只有张薰华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樊弘推荐其留系任教。

张薰华回忆这段往事，很是感慨：“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在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后来，张薰华也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知名学者，大家之风，一脉相承。

思想求索

在过去100年前的中国，许多像樊弘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艰苦摸索，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因此加入了革命队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据樊弘的《苦闷与得救》一文，樊弘思想的重大转折，酝酿于其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主任的时期。

樊弘在为《两条路》一书所写的代序《苦闷与得救》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近些年来，在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曾碰着了许多次的向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在实际上不能实践的困难。在困难发生，几经奋斗，而不得解决之际，

心理上曾出现了无限的冲突与矛盾。”

他叙述了自己由信奉墨翟利他主义而终于觉悟“其不足以治世”，“信佛但觉空无所依”，转而“信孔亦无所得”。多年以后，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复旦校址，一次因敌人空袭，樊弘不得已上至峨眉山稍作避难，“行到半山之上，人居破庙，赁屋读书，治微积分”。在一个夜晚，他突然感到“灵机忽发生作用”，认识到“支配人生的力量原来即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他看来，这一观点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合流，最终他也因此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熔铸自己坚定的思想信念。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他看到了无数人民的英勇牺牲，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严重腐败、独裁统治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不能希望国民党政府像虎狼一样“自行拔去爪牙，给予人民民主”，必须通过人民起来斗争，“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解决”。

抗战结束后，他前往北平，以一个著名的民主教授身份，在政治上的表现空前活跃。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积极支持民主学生运动，配合地下党员将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据其子樊平回忆，樊弘经常参与民主集会，慷慨陈词，满怀希望地呼唤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的诞生。

曾有人向其夫人表示，担忧樊弘会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被暗杀。也有人当面劝告他前往解



放区避风头，但他拒不前往，说“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追求民主的信念不会因生死而改变。时人将他与许德珩、袁翰青并称为“民主三教授”。

1949年，樊弘在北京饭店受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接见。同年10月1日，他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樊弘曾这样强调：“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

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结束后，《人民日报》刊登悼文，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这位历经风雨动荡的大家，怀抱着无限的精诚与热忱，将一生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经济、民主奋斗事业。■

樊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



漆琪生(1904-1986)，原名相衡，号伯勋，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本论大纲》撰写者。

漆琪生： 鸿儒硕学求真理，兼容并包传大道

文 | 李大武

身着朴素，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手里夹着一个皮质文件夹，其中的课程提纲已经有些发黄。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几乎从不看稿，偶尔要看讲稿时，将高度近视眼镜摘掉，凑近了看。

这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尹伯成对老师漆琪生的印象。1956年，尹伯成考入复旦经济学系。据他回忆，“我进大学时就听说我们经济系有一批老教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琪生”。与漆琪生第一次接触，尹伯成还是

漆琪生在经济学科的学术成就斐然，也始终将“治学”与“传道”相结合，教学相长。

复旦经济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在那时，漆琪生是复旦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在经济系里职称最高。即使过去多年，尹伯成仍然记得恩师漆琪生上课的样子和腔调。

1945年1月开始，至1986年4月，除1950至1953年间的两次短期调职外，漆琪生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说》、《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学》和《金融学》等课程，他曾担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求真者

在复旦的日子里，漆琪生经常在《新观察》等杂志上发布《资本论》的研究心得，并在报纸杂志上大力宣传和介绍《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漆琪生注重将理论与国家经济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政策结合，并积极参加各种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首先是弄懂理论，弄懂马克思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弄懂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用理论的武器回答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漆琪生如此总结。

50年代，上海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漆琪生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在上海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和研究的文章，并向工商界人士做了多次演讲和报告，结合时事深入浅出地阐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1953年，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漆琪生当选常委，副秘书长。他代表民建会积极筹办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并担任该校教务长，诚恳帮助上海工商界人士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行业命运。

传道者

漆琪生在经济学科的学术成就斐然，也始终将“治学”与“传道”相结合，教学相长。



《〈资本论〉大纲》一书第三稿的写作便是缘于一次外出的讲学。60年代，甘肃财经学院恳请漆琪生先生前往给老师们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漆先生当时是国内研究（《资本论》）的老师中最出名的一位，在复旦肯定是最好的。”当时是复旦大学经济系大三学生的陶增衍回忆道。

漆琪生当时已五十六岁，身体不佳，而兰州的医疗条件不如上海，令学校领导有些犯难，特意征求漆琪生的意见。面对传播《资本论》思想的又一机会，漆琪生毫不犹豫应下。陶增衍被选中作为生活与教学助理陪同，也因此与漆琪生结缘，并成为他的研究生。

漆琪生对《资本论》浸润多年，融会贯通，讲课时仅参考手上的提纲就可以旁征博引，滔

滔不绝。可《资本论》一书艰深，很多学员在理解上还有困难，希望有讲义可以温习，便集中向陶增衍反映。然而，陶增衍知晓漆琪生视力极弱，不能高强度用眼，编写讲义谈何容易。斟酌数日，他还是向漆琪生提及此事，漆琪生却极其高兴于同学们的认真，于是在每次讲课后埋头书案，工作数小时，一字一句把讲义写在一本黑皮本上，再由助教送去打字复印，送到学员的手上。

撰写一本《资本论》讲学大纲的想法在漆琪生的心中扎根已久，学生们辛勤记笔记的场量让其感触良多：如果编成大纲，学员们人手一本，在课堂上就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听课、思考，而不用将时间浪费在逐字逐句记笔记上，何乐而不为呢？有了这次讲课的讲义打底，回

到上海，他就开始夜以继日执笔写作《〈资本论〉大纲》。这一稿不幸于“文革”中遗失。漆琪生仍不气馁，在“文革”后又从头开始。

1978年，严法善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研。“漆先生名气很响，”他直接说道，“我当时研究生面试时，碰到一个哲学系的同学，一听我的导师是漆琪生，肃然起敬。”

严法善研究生的同班同学、漆琪生的另一位学生雍同回忆道：“更多时候，是我们去他家上课，上课的话题也比较宽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们有什么问题就问他，他有什么问题就随便聊，严格地说，也不是上课。”待到学生毕业时，漆琪生还亲自题词作为临别赠言，表达自己对同学们未来的期望，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

思变者

在对学术严谨专注的同时，漆琪生还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宽容态度。雍同则认为，漆琪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自然明白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统一答案，基于学术考虑，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禁区，是真正的学术自由。”陶增衍回忆自己研究生的生活。漆先生放手鼓励学生自己读书、钻研、写笔记，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雍同在本科时，主攻的专业也是资本论，据他介绍，中研究《资本论》比较早的学者大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受过苏联专家培训。而漆琪生早年是在日本研究《资本论》，所以与前者并非同种流派、风格。

“引我入门的第一位老师非常严谨，抠书

本抠得很细，但比较死板，对现实的关注可能差一点。”雍同解释说，“漆先生受日本留学经历的影响比较大，相对比较活络一点。”

来到复旦后，雍同接触到了一些当时国外研究《资本论》的新思想，并成功应用在毕业论文，这是国内一些传统的老先生不能接受的行为。“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我一直不断请示漆先生，他一直是鼓励的，让我放开去弄，不要有束缚。”

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雍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差一点没通过”。事实上，他当时运用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有高等数学方程式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仅是成文、答辩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涉及。于是，一些研究《资本论》的老师就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全国《资本论》的研讨会上引起广泛讨论。

漆琪生和经济学系另一位教授张薰华一起，请了复旦大学三位专家：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宋承先、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陈其人、蒋学模，一起来分析这篇论文。雍同回忆道：“我当时就以为还会被‘枪毙’”，但出乎意料的是，三位教授一致认为雍同整篇论文的论点没有问题，给了他很大的认可。来自恩师与专家的这份认可可是雍同继续研究事业的一大动力，他始终贯彻着这份学术自由探索的态度，在恩师漆琪生的帮助下，于学术之路前行。

与学生雍同一般，领受师者漆琪生教诲、担负经世济民责任的后辈不可计数。斯人已逝，其志长存。这位复旦经济学历史上的丰碑，其人其思其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气脉之中，至今依旧刚健雄阔。■



夏炎德：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学贯中西的奠基者

文 | 李大武

夏炎德（1911—1991），上海人。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民建创始发起人之一，中央执委。193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1935—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修经济史，师从罗宾斯教授，并深受哲学家罗素、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影响。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中断博士学业回国，历任暨南、东吴、沪江、大夏、四川、中央、复旦等大学经济学教授，1945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兼经济研究所导师。主要著作有《法兰西文学史》《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欧美经济史》《经济学之数量研究论》《理论福利经济学》《高级印度史》《文艺通论》等。

1978年9月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迎新会上的夏炎德教授有着与时代其他人与众不同的着装风格：金边眼镜，西装笔挺，授课时总会拎着一个皮包，派头十足，“一看就是留过洋的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泛海书院常务副院长严法善回忆见到夏炎德教授的场景。

这一猜测的确是对的。1931年，20岁的夏炎德考入上海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又转入经济系学习。在完成学业同时，他还从事着文学相关的写作，于1932年出版《法兰西文学史》，1933年出版《文艺通论》。卓越的学术成果使他深受学界赞誉，并在校方资助下于1935年秋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经济史硕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忧心家国的夏炎德中断学业，于1938年归国，先后前往暨南、沪江、东吴、复旦等大学任教。直至1988年离休，50年教学生涯，他一日不曾倦怠。

经受东西方优秀教育的夏炎德研究视野极为广阔，造诣精深，一生发表的著作、译著、古籍整理等研究成果可达数百万字。1937年，他翻译出版了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古斯塔夫·

卡塞尔的《经济学之数量研究论》，这是最早引入国内的计量经济学著作之一。

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他的成果丰厚。193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显征兆，战争阴云密布，法西斯国家鼓吹舆论，说自己的国家生产原料不足、市场狭隘、人口过剩等，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新分配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海外宣传、强调自己的经济困难，美化本国的侵华行为。正此时，夏炎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弭战策》的长文。这篇长文畅论国际经济问题解决的正当途径，毫不留情地驳斥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非分要求，并痛批其后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经济理论。

1941年，他还应《学林杂志》之约撰写了《世界战争与世界经济的趋势》一文，进一步认为战争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解决国际经济问题自有正当的途径，“惟有实行合理的分业，自由贸易、投资与移民，扩大为全世界的自给自足，自存共存，才能真正消除各种战争的原因而树立永久的和平”。



青年夏炎德

在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上，他更是一位开拓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他是国内最早意识到经济制度问题研究重要性的少数学者之一，在他看来，经济制度是20世纪文明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作为经济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重大课题。他强调，“资产阶级学者过去回避这个问题，目的在于维护现行制度，将其视为当然而不可更改的；现在因为这个制度破绽百出，不得不予以重视；美国制度学派重视经济制度的研究，但他们对于应采取何种制度却无

具体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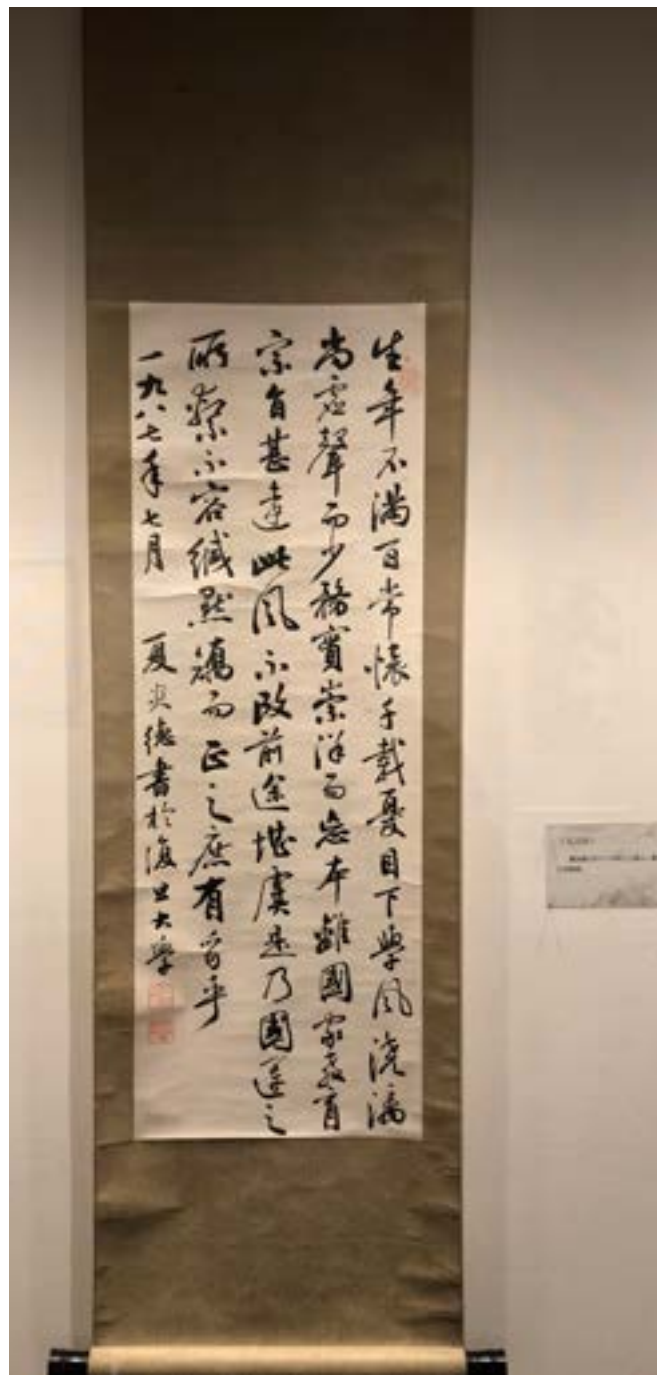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尚还是一片空白。因此，夏炎德首先在他任教的大学中开设这门新课，并鼓励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最早的文章《论经济制度之研究》于1943年发表在《经济论衡》创刊号上。

1948年，夏炎德所著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稿成于1940年，应《学林杂志》之约而著，因战乱而搁置。他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世界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背景下，论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大转变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全书分为绪言、清代重臣的富强政策、驻外使节的洋务献议、维新志士的变法理想、官商巨子的实业方案、革命领袖的民生主义、结论，共计七章。

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现在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必备参考书。实际上，这部著作不仅精辟透彻地总结了我国近代革命领袖等人的经济思想，更对其加以串联，立足于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叙述、解说我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在我国时代新旧交替、思想穷变之际，这一经济思想史开拓性的成果为国民经济的改造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欧美经济史》则是夏炎德晚年的重要著作。在其古稀之年，夏炎德花费三年时光，“以中国人的眼光观察，用我们自己惯用的文字表达”，对西方国家自古至今长期发展的经济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全书篇幅宏大，共计六十余万字。为了早日出书，夏炎德曾夜以继日地校阅清样。这部以东方本土视角观察论述

—
经受东西方优秀教育的夏炎德研究视野极为广阔，
造诣精深，
一生发表的著作、译著、古籍整理等研究成果可达数百万字。
—



夏炎德的书法作品

西方经济史的鸿篇巨著，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也是我国研究西方经济成果丰赡的里程碑。

虽然夏炎德学贯中西、成果丰硕，有着极高的学术声望，但他从不因此而自矜自傲，一刻也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严法善的记忆中，夏炎德为人“很有绅士风度，比较随和”，每次见到同学都会很客气地打招呼。

夏炎德的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备军回忆，夏炎德晚年时，有一次陪夫人出游4天，但他仍然坚持先请假，并后续尽快补上空缺的课程。曾有人请夏炎德做主编和翻译工作，但均被他婉拒，问其原因，说是注意力在学术著述，顾不过来。他哪怕是校对都亲力而为，除非是政治任务，其余著述均独立完成，这是他一贯的作风。郑备军说：“夏先生天赋极高，又勤奋好学，正是所谓的‘天才’。”

夏炎德留给后世的远远不止其百万字的著述，他的经历和风骨，如同静水深流，默默地涵养着一代代年轻的复旦人。风骨何在？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第

二

阶

段

栉风沐雨，困知勉行： 调整发展时期（1949年-1984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正文军代表接管了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张薰华等参与了此项工作。嗣后，复旦大学改组，张志让、陈望道分别任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张薰华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朱伯康教授被任命为解放后第一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就在这一年，高校开始了局部的院系调整，英士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经济系师生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是年，复旦大学恢复20世纪30年代停办的工商管理系和国际贸易系。

上海解放之初，经济研究所停办，直到9月由华东财委会建议恢复，并在华东教育部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华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被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王寅生被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并兼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王寅生教

授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复旦大学副教授李铁民教授继任副所长。

许涤新先生主持该所工作后，即着手招收新中国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招生简章”显示，其宗旨是“培养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等院校师资和经济研究人才”。

当年10月，经济研究所通过考试招收录取了89名研究生，并于10月开学。他们大都自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并有一定的社会经历。1950年实有研究生87人，被分为工业组31人，农业组9人，贸易组29人，财政金融组18人，分别研究新民主主义的工业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

该所的研究生培养计划由许涤新先生审定，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采用自学为主、辅导为辅的教学方法。还邀请华东与上海市财委、工商联部门及经济学界的名家、学者前来作专题讲座报告。授课先生多系华东

财经机关负责同志及本校著名教授。每次小组讨论均邀请教授出席指导。许涤新先生则坚持每周安排半天为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并具体指导研究生。

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1950年秋，复旦设立银行专修科。主任是陈观烈教授。设立目的是在配合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发展，培养银行工作人员，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金融事业。在当年秋季开始了招生。本科修业期限定位二年。课程着重于实用方面，理论课程虽有设置，亦力求与实际结合。

在业务学习方面，为了使同学有重点地学习起见，指定了货币银行、会计学、银行会计、银行业务、金融政策、法令以及国际汇兑为重点课；有关纯粹银行业务的课程，如银行业务、金融政策等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负责同志就现实金融问题，组织系统讲演。本科系接受教育部与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之双重领导，经费比较充足，教学设备也很充实。为便于同学研读起见，专辟有研究室，藏书百种及杂志二十余种。为求同学在毕业后即能参加实际工作，在寒暑假期内进行实习，使理论与实际业务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

另外，合作学系尝试性地施行了三年的学制。至此，商学院共辖有：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系、统计学系、合作学系及银行专修科、统计专修科、贸易专修科。次年，商学院改为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改为企业管理系，国际贸易系改为贸易系。大夏大学部分系科师生也并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2年夏，全国高校普遍拉开了院系调整的帷幕，经济学系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以及前已

并入的暨南大学、大夏大学、英士大学共9校的经济系合并组成。

其中，有一批著名教授，如暨南大学的系主任陈彪如、南京大学的系主任朱契（因故未来）、金陵大学的系主任曹国卿、上海学院院长笪移今、光华大学的系主任张伯箴、安徽大学的系主任张修山等进入复旦。

这大大加强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师资力量；同时扩大了办学规模。1949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前，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师甚少，仅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21人（其中包括经济学系所辖的经济研究所教师9人）；学生人数却在复旦大学各系中较多，共有197人（其中男生168人，女生29人）。院系调整后的1952年秋，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43人，相当于院系调整前2倍；学生共有460人（其中男生340人，女生120人），相当于院系调整前2.3倍。

院系调整前，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没有设立专业；院系调整后，先后增设了政治经济学专业与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并下设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包括科研和课程），国民经济计划教学小组，经济史教学小组，财政信贷教学小组，统计教学小组，簿记教学小组，经济地理教学小组等等。

也正是由于院系调整，辖有银行金融系、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贸易系、合作学系、统计系及银行专修科、统计专修科、贸易专修科的复旦大学财经学院，除留下个别教师外，在1952年整体调整出了复旦大学，并入上海财经学院。

1955年至1956年，经济学系的教学组织进一步明确和健全。不仅开始实行五年学制，



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我校时会见苏步青、谢希德、谈家桢、华中一、蒋学模等教授。图为经济学系蒋学模教授（左一）与里根总统握手。

还确立了本科毕业生论文制度。在1956年4月18日，复旦大学产生了解放后第一批晋升的副教授，其中就包括经济学系蒋学模、余开祥、苏绍智等老师。

当时，经济学系有教师35人，分设为政治经济学专题讲授与作业教研组，主任漆琪生，秘书陈其人；国民经济史教研组，主任朱伯康，秘书孙桂梧；计划统计教研组，主任张修山，秘书潘纪一；部门经济教研组，正副主任分别是曹国卿和陈绍闻。

1955年至1957年，经济学系举办政治经济学培训班，由苏联专家安·彼·谢莫钦科主讲。来自上海和全国高校的经济学家教师参加了培训班。经济学系有10名青年教师参加。这些

都大大提高了这些教师的经济学理论水平。

加强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1951年，蒋学模先生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故事》出版；1952年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也由开明书店出版，1954年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280多万册。毛泽东主席看了此书，称赞说这本书写得不错。1957年7-8月间，毛泽东还接见了漆琪生、蒋学模等人。1953年，伍丹戈先生编著的《中国农业税问题》出版，本年，张薰华先生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被高教部列为全国交流教材。

特别是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

军”号召以后，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据统计，1956年至1957年经济学系教师出版了6部著作，即伍丹戈著的《资本主义的工资》；蒋学模、陈其人等著的《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漆琪生著的《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间的作用》；汪旭庄、蒋家俊、孙怀仁著的《资本剩余价值和积累》；蒋学模著的《政治经济学常识》。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文教、卫生、艺术人士。其中复旦经济学系漆琪生、笕移今、蒋学模3人受到接见，占到了复旦被接见人数的一半。

然而，一场变局骤至。“整风反右”开始后，

经济系有个别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采取了种种办法试图保护一批知识分子，在1958年大跃进所兴起的那次巨大冲击波下，他想尽手段将冲击正常教学秩序的劲风，巧妙地转化为改革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经济系就正好是这种化解的对象。

“经济学，本来就是以社会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杨西光在“大跃进”期间，强调学生一律走出课堂下到农村锻炼、支持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活动中，发现这里倒有个很好的实验室，那就是“以社会为大工厂”。他因势利导，就将经济系全体师生都下放到江苏省吴县望亭公社里去劳动锻炼，为期半年。

锻炼期间，杨西光把师生混合编制到一



校工会楼，世经所1969-1978年的所址



陈观烈教授与1952年毕业班合影

起，让教学与科研就在这宽阔无边的社会大工厂里边进行。他担心师生们只顾了劳动锻炼，而忘记了，或者说忽视了实地教学的任务，便亲自去到望亭公社来看望大家，及时地做出提醒：

“学生的基本任务，是求得知识，在农村不能只是劳动。在工作上，要注意把劳动、教学、社会调查、基层工作锻炼、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经济系师生按照他的意图，除了继续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外，同时组织插在队里的教师，包括著名教授蒋学模、陈观烈等人在内，结合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坐在“社会大工厂”里为学生讲课，让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和逻辑推导变得更容易理解，也能够动手操作。

同时，系里还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安排学生每人一职地去做基层工作：有的到大队里

当副书记，有的去生产队当副队长，有的去做妇女委员，有的去做扫盲识字班教员和宣传报道员。教师们理论联系实际地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从编写家史、村史、队史着手，先解剖麻雀，吃透典型，然后再进行专题的调查，提出了像社、队办的工厂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农业与林牧副渔的协调发展关系、农村中如何处理好分配与积累的关系等课题。

“大家将这些实际问题与教科书上的一些要领、范畴、原则、规律客观地结合起来，便立刻觉得生动鲜活，有血有肉，能够触摸得到，分辨得清，然后就由学生们组成的科研小组，写出了许多篇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高校六十条”，并在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复旦大学便是上海市率先试行“高校六十条”的三所院校之一。



张薰华、洪远朋著《〈资本论〉提要》第一、二、三册分别出版于1977、1978、1982年。《〈资本论〉提要》是对《资本论》原著的简要解释和说明，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二册初版标明的印数达10万册

在这一年里，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李铁民调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张薰华先生接任经济学系主任。

他坚决贯彻“高校六十条”精神，修订了教学计划，减少了劳动实践，加强了课堂教学，重视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组织教师修改自编的《资本论》讲授大纲、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专题、部门经济基

础知识、经济学说史、统计学原理、世界经济大纲等八门课程讲义的同时，还修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外国经济史、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等各课程的自编讲义；同时，成立两个专门组与外文系合作编写俄文与英文的经济文选，作为高年级学生自学用书。蒋学模先生也与他人合作主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为国内许多高校采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经济学系对教研组进行调整。除了保留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外，撤销了计划统计教研组，将国民经济史教研组改名为经济史教研组，并增设了世界经济教研组。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经济学系教学和科研工作回到了正常轨道。1964年，副系主任蒋家俊代表经济学系在华东地区劳模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1964年2月17日，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和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12月15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



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各系政治公共课通用教材。1980年首次出版，印行197万册，1983年第3版时，发行330万册，到2005年第13版，发行总量突破了1800万册，创下了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



1. 许涤新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1949—1951）完成并出版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二卷，该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 2.《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是由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系等单位联合编写，1972年出版，1973年第三次印刷时发行量达13.5万册
- 3.《战后西德经济》由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写，1975年出版，发行17.4万册
- 4.《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材，由复旦大学经济系蒋家俊和厦门大学经济系吴宣恭担任主编，南方十六所大学的教师参与编写。这本教材第一版于1979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欢迎，为许多高校采用，至1982年先后印刷5次，发行44万册

的报告”，复旦大学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为陈传纲（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副所长为吴常铭（校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长、国际政治系主任）、张薰华（校党委常委、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最初研究人员有28人。1978年底，为扩展研究领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经国家教委批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

1966年5—8月，经济学系与国际政治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即二系一所的各自中共党支部合并组成为一个中共党总支。此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遭到破坏。不久，“停课闹革命”爆发，高考招生制度暂时停止。8月5日，经济学系三级教授肖纯锦开始被批斗，此后经常被挨斗、拳打脚踢，加上年老患高血压病，于1968年10月逝世。直至1978年9月校党委予以平反。

9月20日，经济学系“司号员”战斗组等贴出“重炮猛轰陈传纲”的大字报，把陈从市高教局揪回校斗争。10月6日，陈传纲被迫害致死。

196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进校，经济学系共来了4名“军宣队”员。次年1月，复旦校革会成立。此间，经济学系革委会成立，与国际政治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分开各自独立。6月，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师生去宝山罗店参加“三夏”劳动，年老体弱多病老教师，也被赶下乡劳动、批斗。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派进经济学系“工宣队员”多人。9月，“清队”工作改由工宣队负责。11月，经济学系开始揪斗所谓“地下黑总支”。（自1966年6月至1968年底，经济学系被批判、审查的干部、教师和职工共达32人，经济学系学生被审查的、被打成反动学生或小爬虫的共有8人。）

自1970年开始，按照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经济学系先后招收6届工农兵学员入学。1972年4月17日，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合并到复旦大学，其中部分教师安排到经济学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1973年，经济学系设立工业经济学专业并首次招生。此后一年，按国务院科教组下达任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集体编译资本主义国家政治

经济情况的书籍多部。

1976年1月9日、9月9日，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怀着悲痛的心情，经济学系师生员工纷纷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次年，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与之相应的，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经济学系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经济史教研室、部门经济教研室。本年，学校为构建经济学院框架建立了筹备组。

此后，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科产生了一系列变动与改革。1978年，根据学校决定，由经济学系部门经济教研室教师与数学系部分教师合作成立经济管理系。当年，经济学系设有人口研究室、世界经济教研室、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和部门经济教研室。

1979年，成立世界经济系，属国内高校首创。由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教师和世界经济研究所部分教师组成。设世界经济专业为本科。首任系主任陈观烈，副主任刘宏谊。本年，上海财经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恢复，原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大部分教师回到这两学院。经济学系参建管理科学系，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后发展成经济管理系。

1980年，经济学专业定为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之一。本年，经济学系举办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两年之后，受教育部政教司委托，经济系举办“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进修班”。同样是1982年，经济学系设立金融管理干部专修科，此后持续举办了十届。

1983年，世界经济系设立国际金融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又成为了国内高校的一项创举。1984年7月5日，经校务委员会批准，经济学系人口研究室改建为人口研究所，并在此基

础上成立人口学专业，后成立人口学系，直至1993年并入社会学系。12月18日，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一个跨学科、开放式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它旨在组织校内外、国内外有关专家，从事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为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名誉主任为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首任主任洪文达。也正是在这一年，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被批准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点之一。

沉浮三十余载，逆水行舟。这一时期除“文化大革命”对教学科研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外，经济学系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大进步。通过院系调整，系里的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都得到了加强，同时新建了多个新系、所、专业，促进了事业的发展与布局。

此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复旦的经济学科除了开设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外，经过国家教育部批准，采取自主招生、委托培养、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顺应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各界对经济管理知识的广泛需求，面向国内外开展多层次的教育服务，开设了大学助教进修班教育、国际金融进修班教育、世界经济进修班教育与金融干部大专班、物资经济、工业合作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等专修科教育，以及在职研究生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高级进修班教育等等，为经济社会服务培养各种层次人才。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乘风破浪，更知壮志凌云。经过几十年的学科的调整与建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雏形已经显现，万事俱备，只待正式成立的东风吹来，再次朝着下一个目标昂扬起航。■



许涤新： 涤旧创新求济民，桃李争辉遍四方

文 | 卢洁

许涤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8年2月在北京逝世，1949-1951年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顾问，民建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1949年11月的一个早晨，寒意渐起的复旦校园里，一位清瘦硬朗的中年男子正在讲台上朗声讲解《资本论》，讲台坐着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招收培养的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这位清瘦的中年人，是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而讲台下坐着的学生们，或成为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师，或成为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将复旦经济的学问和复旦精神带向更广阔的四方。

许涤新，原名许声闻，后改名许涤新，取涤旧创新之意。他看到武装到牙齿、残暴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也看到了企图破坏民主革命胜利的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更见证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再到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全过程。他的一生演绎着经世济民的篇章：前半生和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后半生积极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建设。他虽自称“一名大时代的小兵”，但实则是一位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上的闯将。



许涤新与夫人方卓芬

复旦育人，桃李天下

1949年5月，上海百废待兴，时年43岁的许涤新一心想着“经世济民”，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参加接管工作，担任上海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工商处长（9月改市工商局后任局长）、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同年10月，为了培养上海财经理论干部，许涤新与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一同倡议，成立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由许涤新任所长兼教师。

自此，许涤新开启了在复旦的教学工作，他始终认真负责，严谨治学，力求将自己的学问带给求知若渴的复旦学生。

当时，他身兼数职，面临着繁重的党政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但身为一名教师，他始终以教学为第一要旨，坚持亲自上课，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思想，启发了众多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新吾是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学生，回想起那段求学岁月，他仍然对许老心怀感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回忆道：“我是该所的研究生之一，与同学们一起对许师的精辟讲学和谆谆教诲受益良多。”

如今再看许涤新先生的当年的授课讲义，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可以透过娟秀的笔触穿越60年的光阴回忆，还原出当年课堂的样貌。那堂课的主题是“目前新中国的财经状况”，他一手握着粉笔，一手拿着讲义书卷，时不时在黑板笔力遒劲地写上一两个关键词，又时不时停下语句等一等同学手中停不下来的笔。他的语调总是那么谦和，但目光如炬，闪耀着理想和信仰的光芒；他授课的逻辑清晰明确，从东三省到华北再到上



“文革”后的“五一”劳动节许涤新（左二）约了旧日红岩几位同志，去西花厅探望邓颖超（左三），在周总理办公室前合影

海、重庆，从轻工业到农业、商业，最后讲到新中国的财政，在渴求知识的同学面前擘画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蓝图。

在许涤新看来，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他不仅要求研究生认真学通《资本论》的理论知识，还引导、组织他们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实际能力。他将44名研究生分成12个小组，调查了当时上海的棉纺织染工业的20个机关部门和12家典型工厂，调研结束后，学生们撰写了上海棉纺织染工业总结报告和12家典型工厂调查报告。学生生活学活用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经济调查的能力，还为上海市政府

部门提供了恢复和发展棉纺织染工业的决策依据。

1952年9月，许涤新告别复旦大学，调往北京工作。他虽然只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待了三年，但他对于上海经济的恢复，复旦大学经济学学科、院系建设的贡献不可估量。

在他的教学和督促下，复旦大学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届87名经济学研究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先发人才基础。在他培养出的三届研究生中，涌现出了洪文达、蒋家俊、潘纪一、宋海文等著名学者和教授。日月光华，粲然星陈，他严谨认真的教学理念在复旦薪火相传，为复旦的星空增加了

许涤新虽自称“一名大时代的小兵”，
但实则是一位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上的闯将。

无数闪耀的明星；他的经济思想如雄火，启明复旦经济学子，又经由复旦学子的传播形成燎原之势，照耀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照亮前路。

高瞻远瞩，经济时务

许涤新之于复旦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之于经济学则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理论家和践行者。他的经济理论贡献，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可依之据。他一生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将深厚的经济底蕴与实际相结合，力求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他倾注毕生精力完成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这部作品的初版三卷写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品历数“左”倾路线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下，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1978年“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结束。许涤新十分欣喜，兴奋、激动交织，他恨不得把攒了十年的劲，一股脑扑到追寻真理的征

程之上。1980年8月4日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口授了一封给许涤新的信，希望许涤新主持成立《资本论》全国研究会的工作。

许涤新勇担大任，把成立《资本论》研究会的安排挤入了本就密密麻麻的日程。1982年12月，许涤新正式创办并领导了《资本论》研究会，使得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理论重新在中国学界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在许涤新等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灯在拨开黑暗后至今长明。

随着经济改革逐步深入，中国很多地区开



许涤新先生(右)参加会议



许涤新(右一)与廖承志(中间)同志的合影

始大规模建设工厂，扩大生产、提高产能。而在地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了对立双方，一些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许涤新再一次先于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为生态环境保护大声疾呼——“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是到了该创立的时候了！”

他在《森林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提出：“森林对于人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提供木材。”“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使人们对森林的认识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不仅要看到木材，还要看到森林。”他希望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山青野碧、泉甘水美、工农繁荣、水洁空净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认识到森林、湖泊、河流的作用。许涤新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观点，至今也不过时。

周恩来总理曾对许涤新这样评价：“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许涤新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投身于经济学的工作中，谱写着经世济民的精神。

直到今天，复旦经济学仍然铭记着这位老先生的谆谆教诲，折服于当年老先生的经韬纬略之才、经世济民之心，正如他的妻子方卓芬在《回忆许涤新》中所写：“他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回荡。他的背影在我们眼前冉冉升起。背后留着一串深深的长长的足印——探索者的足印。”



朱伯康，1946年起于复旦大学任教，1949年被任命为解放后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学系主任（1949-1952）。卸任主任一职后，朱伯康历任国民经济史教研组和经济史教研组主任等职，兼任上海经济学会顾问，上海经济史学会顾问。执教复旦期间，朱伯康曾在学校为本研学生开设“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史”等课程；著有《经济学纲要》、《中国经济建设论》、《中国经济通史》（合著）等作品。朱伯康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兼史学、哲学方法论研究，重视为理论逻辑注入现实关切，引领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朱伯康：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笔耕不辍书写学科辉煌

文 | 林珺瑶

1946年，因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一事，朱伯康辗转到了上海。时局动荡之际，经由昔日老师李炳焕的引荐，朱伯康受聘于复旦大学商学院，成为银行系的一名教师，开始了于复旦40余年的执教生涯。对这段经历，朱伯康印象颇深，自谓“这一年对自己的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年”。也正是加入复旦同年的12月，朱伯康将自己从教多年的主要讲稿整理成一册《经济学纲要》，由中国文化服务出版社付梓。这本教科书借鉴了德国经济学家李士特（今译李斯特）的分析框架，一改传统经济学教育对新古典主义的单向强调，增添了经济制度嵌入社会的互动关系视角。直至1949年，该书一直是市面上影响较大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1949年上海解放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初步展开，复旦大学各系进行改组，英士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经济系师生率先并入复旦大学经

济学系。承学院之新生，朱伯康受任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任主任（1949-1952）。在朱伯康的领导下，以“培养经济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以上师资”为教育目标，经济学系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并首度成立政治经济学调研组。及至1952年秋，以南京大学等8所高校的经济系师生均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壮大，整体治学实力大大加强。

1952年，卸任经济系主任一职后，朱伯康继续潜心中国经济史兼史学、哲学方法论研究，并于1955年担任国民经济史教研组主任，领导学科专业建设。1962年10月，经济学系对教研组进行了调整，国民经济史教研组改名为经济史教研组，朱伯康继续任主任，与组内成员一道探索中国经济盛衰的规律和制度演进的特点。这一时期，在朱伯康等一众经济学系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



“源头活水”是朱伯康的治学之方，
“道德在前，学问在后”是他为师为人的准则。

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

1986年，朱伯康从经济学院退休。久违的空闲让朱伯康终于有时间去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撰写一部中国经济史。而这部“史”，也成为了他向复旦经济学系送出的一份“厚礼”。

撰史的工作在经济学家许涤新的鼓励支持下起步。了解了朱伯康的想法之后，许涤新向他提议，将这部著作改为《中国经济通史》。朱伯康欣然应之。此后，朱伯康与学生施正康花费10年时间，共同完成了《中国经济通史》



一书。120余万字的浩浩巨著，凝结了朱伯康平生治学所闻、所得、所思，文笔质朴流畅，论证清晰有力。1995年，书籍一经付梓发行，便迅速销售一空，得到全国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好评。经济史学家姜铎评价此书时指出，书籍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位置摆得十分端正和恰到好处”，“既显示出作者见多识广掌握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又显示出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胸有成竹”。次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1995年）。

21世纪初，朱伯康年近期颐，治学热忱仍激荡在怀。为了进一步补充《中国经济通史》中近代部分的内容，他指导施正康挖掘、搜集史料，将该书扩写成为15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史》，在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扩写后的文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较多的近代经济史内容，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广受读者好评。出版次年，《中国经济史》相继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三等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治学研究之外，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四十余年间，朱伯康先后为学生们开设了“经济学原理”“经济政策”“财政学”“中国财政史”“现代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史”等多项课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张忠民，华东师大商学院经济系教授



张祖国等都曾是朱伯康门下的硕士生。毕业以后，学生们也一直保持着每年一次拜访朱伯康的习惯。

在学生的回忆里，治学时，朱伯康和大家反复强调的关键是“源头活水”这一基本原则。所谓“源”，指的是真正的学问必须搞清楚源头在哪里，学习任何问题一定要知道其来龙去脉，一定要知道其学科史；所谓“活”，指的是做经济史的人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源头活水”四个字，则进一步指向了这水流经的领域。这四个字虽然简单，但对做经济史的人来说，却是非常严谨有效的方法，并深深地影响了朱伯康任教时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也彰显着经济学院严谨笃实的治学之风。

“道德在前，学问在后”也是朱伯康反复向学生们强调的道理。在张忠民看来，朱伯康

以自身之清正，践行着自己的治学之方。他直言，“道德学问皆高，不是一个达到没达到的问题，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既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个要求，也是老师对自己的要求。”

光阴历历数十载，朱伯康毕生求索，孜孜治学，“执教著述于中华复兴……与国与民同命运共荣辱”，“贡献诸多”。在与泛黄旧书卷的对谈中，他描绘出了一幅宏阔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画卷。“源头活水”是他的治学之方，“道德在前，学问在后”是他为师为人的准则。在他与诸位经济学院教师们的接续努力之下，解放后，新生的经济学院不断锐意进取，以史为鉴，经济起当世之用，也照亮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之路上的灼灼光华。■



陈绍闻，字叔异，1942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解放前先后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讲师、副教授，国立编译馆编审，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解放后任金陵大学副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副教授。院系调整后至复旦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陈绍闻： 白首穷经做学问，诲人不倦育英才

文 | 张淑凡

1912年，陈绍闻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开明乡绅家庭。他先在长沙上初中，后来又转到湘潭县中上学。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接着在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

曾经参加儿童团的陈绍闻在之后的一年里藏在湖南乡下伯父家里，跟随伯父读《诗经》《论语》《孟子》和《左传》等。“我的古汉语略有基础，就是这时打下的。”陈绍闻曾这么评价。

为了重新上学读书，陈绍闻随后别离故乡，远去他方。因大哥陈伯君任浙江大学秘书长，因此陈绍闻选择到杭州求学。他选择攻读经济学，但不囿于某一学派，各派各家都看。在专业学习之外，他常常阅读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专业或非专业的报刊他都爱看。在广泛的阅读与学习中，他不断拓宽知识面，从中得益很多。

在毕业后参加工作时，虽然他需要教授的课程曾多次改变，但因为求学时好学的态度，博物洽闻，每一门课程都能顺利担负起来。

抗战胜利后，陈绍闻在南京工作，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陈绍闻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解放前后较长一段时期，陈绍闻从事部门经济学的教学。来到复旦经济学院之后，陈绍闻改行深耕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在梳理上海市经济思想史研究时指出，50年代，上海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很少。60年代以后，该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的高等学校教学规划中正式列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作为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的必修课程，从各大学和科研机构抽调人力编写教材。同时，在上海所承担的重新修订旧版《辞海》



“愿意为建立和发展这两门学科稍尽绵薄之力。”
随后几十年时间里，陈绍闻一直践行着这句话，
为这些学科的建设尽心尽力。

任务的编写规划中，也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词目列为门类之一。

在工作中，陈绍闻接触到中国经济史，并对此产生兴趣。他说：“无论是中国经济史或中国经济思想史都还处于落后状态，人少任务重，很难改变这种局面。我个人在当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变这种局面的愿望是一直存在的。”

1962年他发表于《文汇报》的《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文，是较早发表的呼吁重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文章。1962年秋至1964年夏，陈绍闻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讲座，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课程在上海恢复重建的开端。

陈绍闻还曾在文章中指出：“在学科研究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无论古今事事不如欧洲；一是古已有之。”他希望能够开展中外比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绍闻争取将他担任主任的经济史教研室改组分为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和外国经济史学教研室。

他本着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精神，团结组内同志并提倡开展校外协作，以解决人力不足困难，编写了一套教材，包括了1978年他与叶世昌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

册，80年代初，由他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上中下三册（1988年修订本改分上、下两册），1988年，陈绍闻、姚家华、徐培华合著的《中国经济史学要籍介绍》。《中国古代经济文选》等教材，从有关经史子集中爬梳剔抉，旁征博引，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这些教材为基础，陈绍闻所在的教研室可以开设《中国古代经济文献选读》《中国近代经济文献选读》《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课。此外，陈绍闻还负责《辞海》经济分册以及合订本的修订、《中国经济史学要籍介绍》的编写和《经济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学卷》的主编。

此外，陈绍闻与他所在的教研室也参与了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他指出，这些青年教师主要是留校的研究生，留用的只是少数，输送给兄弟单位的居多，他们都能独立开课和进行研究工作。教研室还承担了举办教师进修班、助教进修班的任务，并接受外国进修生和研修生。

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身体问题，陈绍闻

难以坚持去学校，就把几位学生带到家里上课。当时陈绍闻缪景湖夫妇与大儿子陈越平一家三口住在复旦大学第四宿舍的一套房子里。因为房子不大，陈绍闻的卧室起到了“五合一”的功能，吃饭、睡觉、工作、会客和给学生教课都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陈绍闻拿着陈越平女儿的小黑板给大家上课。往往一节课就是两三个小时，每周都有一两次。除了上课，年迈的陈绍闻也在这间卧室里完成其他工作，比如编纂《辞海》，每天早上至少工作两小时，午睡之后也是两三个小时。

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处于初创阶段时，陈绍闻表示：

“愿意为建立和发展这两门学科稍尽绵薄之力。”随后几十年时间里，他一直践行着这句话，为这些学科的建设尽心尽力。■



伍丹戈： 享誉国际的明清经济史家

文 | 梁好

伍丹戈(1912—1984)，江苏常州人。1956年调至复旦经济系任教，曾教授“中国经济史专题”中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三个专题。1978年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曾发表中国经济史、财政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70多篇。著有《明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发展》《论国家财政》《经济学大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资》等10多部著作，是经济学家珀金斯著作《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的译者和校阅人。

解放前夕，一批民主人士面临疯狂扑杀。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营救之下，他们顺利抵达北京，参与筹建政协工作……

政治活动之外，他的学术底蕴跨越经济学、财政学、史学、文字学。他一生出版专著七十多册、论文数百篇，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界肯定……

转向经济史的背后

日本明清经济史家森正夫在其代表作《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的跋中写道：“1980年，我在上海很幸运地遇到了复旦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伍丹戈先生，那时候他刚开始进行江南官田的研究。”事实上，伍丹戈早年研究以当代财政学见长，直至调入复旦经济系任教后才开始转向经济史研究。

进入特殊时期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是奢望。“但是对学者来说，你不让他研究，他肯定是受不了。”伍丹戈之子伍继涛说，“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套《东华录》，对于我父亲这样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来说，手头有的资料如果能够反复阅读，掌握住里边的精神，还是可以研究出一些成果的。”

《东华录》是编纂于清代的史料长编。伍丹戈在光华大学攻读政治学时曾有幸受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教导，毕业后又是财政学界、政界专家，因此对书中涉及的赋税制度颇感兴趣。他利用晚上和休息天时间，总共撰写上万字札记、几十万张资料卡片。从此，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明清经济史。

7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组织了一批学者译介国外研究中国的著作，并面向内部发行。伍丹戈在那时接触到了德怀特·珀金斯教授的学

说，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无法组织公开翻译出版活动。

数年后，伍丹戈召集当年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事，于1984年推出中文版《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虽然译者序由他牵头撰写，但是在译本封面上，伍丹戈的名字却被列为校对。伍继涛说，父亲看着翻译团队中很多老先生岁数很大了却还只是副教授职称，希望把学术成果“让贤”，所以主动提出署名校对。

在译者序中，伍丹戈自言：“我们不但欢迎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增进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而且愿意听到外国学者的见解，吸收他们研究的成果和学习他们研究工作的长处。”

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森正夫又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长期派遣研究员，在中国滞留十月，在复旦大学与伍丹戈、历史系樊树志展开六个月的共同研究，每周开一次会集中探讨关于江南官田及其相关课题。

据伍继涛回忆，森正夫与伍丹戈原约定待前者归国后分别发表成果。只不过，1984年夏天，尚未完成研究的伍丹戈便溘然离世。在悼文中，森正夫写道：“伍丹戈先生的论著每本都是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内容，具备着明晰的理论和有关历史进程的展望，在中国形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基础。”

不仅如此，伍丹戈也是国内最早将定量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史学科的学者之一。1985年，《复旦学报》第五、第六期，分上下两篇刊发伍丹戈遗稿“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直至弥留之际，他仍在推进这一改革。

目前国内许多史学研究者都深受伍丹戈先生的影响。华南研究代表人物刘志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言其有关明清赋役制度

伍丹戈先生的论著每本都是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内容，
具备着明晰的理论和有关历史进程的展望，
在中国形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基础。

中的“均平”概念实际上来自伍丹戈先生的影响：“他谈的时候，我也是半懂不懂，只是努力去想，后来自己读史料，再做思考的时候，肯定有受到他的影响，一再思考他的问题。”

中山大学陈春生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杰出范例，也是来自伍丹戈先生的影响，“1983年底，我在上海见到了复旦大学伍丹戈教授，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指点我如何在物价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以后半年里又多次来信指导并惠赠统计学著作，正是由于他的教诲，我才注意到历史学的计量研究问题。”

年过六旬再出发

北风呼啸下震动的小玻璃窗里侧沾满了煤气燃烧产生的白雾，角落里的负离子发生器吞吐着温热的空气，静谧的房间里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改革开放后，正常研究中断十多年的伍丹戈焚膏继晷地工作，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只有三两个学生的研究生专业课便在溧阳路斑斑驳驳梧桐树影下的小洋房里开设。

“伍老师身材高大，面容严肃，气质非常好。”几十年后，施正康教授依然记得他鲜活的

形象。在他的三位导师中，朱伯康和葛慈祥，李民立年轻时便身体抱恙，伍丹戈最为硬朗。

伍丹戈负责“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授课，课程讲义基本沿袭他在五十年代撰写的《论国家财政》一书，内容涵盖上启亚当·斯密、下至二十世纪中期凡三百余年财政学学科建设与财政活动迁演的历史，并比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学理论，在当时可谓创举。

施正康至今也只记得斯密等寥寥几个名字，至于各家学说，“那个时候就没听懂，现在早就忘光了！”

课堂之外，在摇曳闪烁的灯光下，伍丹戈伏案在故纸堆中搜集史料、制作卡片，其手写遗稿《中国经济史研究法》篇幅达到十几万字，字字工整。

尽管每周定期前往医院接受雾化治疗，家中的负离子发生器常年开动，伍丹戈的身体却依旧日益衰弱。

1984年6月，酷暑天簌簌的风声夹杂着蝉吟，送进敞开的窗门，吹动台灯下的光影——对着铺满桌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年逾古稀的伍丹戈连续几天挑灯夜战，拿着一支铅笔，逐字逐句、逐个标点符号地修改。夫人劝他勿再



伍丹戈与妻子的合影

操劳，伍继涛主动提出帮助父亲抄写，可他只是拒绝道，学生的论文必须一边改一边抄，别人代替不了。

16日，发病入院。

26日，病情恶化，猝然离世。

回想至此，伍继涛长叹一声：“后来我们才觉得那时情况反常。大概我父亲也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

第

三

阶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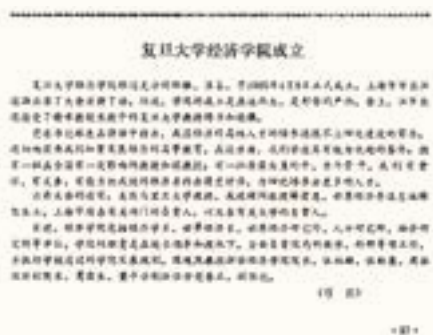
继往开来，踔厉奋发： 改革发展时期(1985年-2015年)

邓小平在1985年提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在中国大地上，春风化雨万物峥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面对时代提出的学科包括系、专业以及研究机构的重组创新的新要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应运而生。

早在1977年，经济学院框架已开始搭建，其筹备组组长为张薰华。1981年复旦大学成立了经济科学“联合体”，这成为成立经济学院的前奏。1984年5月，复旦大学向国家教育部提交(84)校字第4号《关于在复旦大学建立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申请报告》，11月11日国家教育部向复旦大学作了《关于设立经济学院问题的批复》，同意成立经济学院。

经过充分的酝酿与准备，1985年4月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宣布成立。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接受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授予的复旦大学教授聘书和

校徽。新生的经济学院由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物价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组成。在成立大会上，谢希德宣布：陈观烈任经济学院院长，伍柏麟、伍贻康任副院长，周振汉任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葛霖生任分党委书记，董平任副书记。这一年，陈观烈还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年后，因中文系迁入新建成的文科大楼，



198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立新闻



1959年，仙舟图书馆

曾叫仙舟馆的复旦700号楼全部为经济学院办公所用。

“经济学院的成立，是改革开放形势下学校为适应教学科研发展需要而采取的步骤。”伍柏麟在自己的工作随笔中如此写道。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新与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创新，也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变革创新，学院成立后，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院开始探索实体化发展。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决定建立中共经济学院党总支，撤销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总

支。学院建立学术资料室、学生工作组和开发培训部等机构。教学科研机构再次调整，比如设立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和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研室。198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在这次评选中复旦共有16个重点学科。第二年，以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教授领衔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获得国家级特等奖。

经济学院的课堂不限于教室，伍柏麟教授会参与复旦学生晚上在宿舍走道的辩论，身体病弱的陈绍闻教授坚持在家里为学生授课，陈观烈在给博士生罗列书单之后，每周二来学校



1987年江泽民同志与弗里德曼(右二)、陈观烈教授(左二)(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留影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与原世界经济研究所教师、时任深圳市长郑良玉握手

与他们交流讨论。宋承先教授编写的教科书《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于1988年出版，他自道：“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同年，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推出第5版；漆琪生教授的《〈资本论〉大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79—1985年）著作奖。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济学者们在做时代的探索者。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张薰华持此主张，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土地批租理论，为建立中国土地批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1987年深圳特区率先试行土地批租，然后逐步推向全国，他的级差地租理论体现在1988宪法相关条文的修改中。同一时期，叶世昌等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近代货币理论史专著。

1989年，由郑勵志率领，蒋家俊和洪远朋、张薰华、葛

霖生、叶世昌组成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访日团，访问日本10余所高等学校，在三周的时间里讨论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情况。之后蒋家俊撰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文章，提出新的价格体制。时任世界经济系系主任、兼任经济学院院长洪文达便非常重视交流合作，“洪先生每到一所大学都积极热情地和学者交流，关心新鲜事物……”郑勵志教授还记得他们一同在日本参加研讨会的情形。20世纪90年代初，复旦世界经济系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亚非学院就合作研究进行商谈。1990年，洪文达举荐张军到伦敦经济学院参与短期学习项目，学生朱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道：“他（洪文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的方兴未艾，像你这样的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回去，加入这个大潮，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中国做一点事。你死而无憾。”

这一时期，经济学院还建立了一批新的系、专业和研究中心。

1992年，世界经济系的国际金融专业分离出来，在国际金融专业基础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系，下设有金融与保险、国际金融与投资、国际财税与会计三个教研室和金融研究所，首任系主任和金融研究所所长为陈伟恕，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金融学系之一。同一年，学院把经济学系的人口学专业和人口研究所分离出来，创立了人口学系。为适应人口学的教学、研究、宣传普及和培养多层次人才的需要，实行系所合一体制。该系是我国第一批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的单位之一，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华东地区人口研究中心。首任系主任徐桂华。

复旦经济学院是在全国高校文科中被首



1989年访问日本

批批准为设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也是复旦大学文科中第一个被批准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1992年，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首任站长为伍柏麟教授。1999年，随着学科的调整和发展，复旦经院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被批准一分为二：一是设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二是设立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该站由复旦经院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合作）。

1994年，经济学系设立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同年，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国际金融为博士学位学科专业点。1996年，学院设立保险学专业。1998年，全国专业目录调整后，原国际金融、投资经济和保险学本科专业合并为金融学专业。



复旦·安盛保险研究中心成立



2004年10月24日，泛海书院成立会上留影



金融研究院

1998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科被国家教育部首批批准成立为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获全国第七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此外，面向全球科技与经济的新环境、面向国家与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经济学院成立了一批研究中心，通过学科交融、人才汇聚的思想碰撞，形成重要的学术交流基地和宝贵的智库。

1989年，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成立，所长为总支书记陈文灿兼任。1993年，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主任为上海市高教局常务副局长伍贻康教授；环境经济研究所成立，2000年改组为复旦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中心名誉主

任为张薰华教授，主任为朱国宏教授；老年经济研究所成立。该所首任所长为王爱珠教授。

1994年，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成立，首任主任为尹伯成教授。1996年，复旦·安盛保险研究中心成立，所长为徐文虎。1999年，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成立，主任为袁志刚教授。

进入21世纪，学院管理实体化进一步完善。学院把所属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和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及欧洲研究中心等6个单位的人、财、物整合重组。教师、科研人员则按学科发展需要和个人特长及研究领域进行调整充实，在重组发展现有系、所、中心的同时，加强了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



2005年，恢复建院20周年

产业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经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千禧年之际，经济学院金融学科被学校列为校“985工程”的“重中之重”学科。两个实体机构入选“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其中，前身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于2000年2月重建，同年10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早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时期，中心便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关节点组织校内外各路专家座谈讨论，比如当国家体改委组织《1988—199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时，校内老、中、青专家30余人立

项研究，提出了“通过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的方案，在当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被认为是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企业改革论”或“价格改革论”的第三条思路。2010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重点研究基地。原成立于1964年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FDIWE）在2000年9月重组后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之一，主任为华民教授。重组后的世界经济研究所重点研究世界经济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2002年，金融学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较早获得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同年4月，国内高校中第一家跨学科综合性金融研究教育机构——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成立，相对独立运作，挂靠经济学院，2009年该院并入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整合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等院系的金融研究队伍。金融研究院名誉院长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首任院长为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教授，首任常务副院长姜波克教授。同年，经济学院在国际金融系保险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上设立保险学系，首次招收本科生，系主任为徐文虎；复旦大学公共经济学系筹建，并首次招收本科生，后于2007年成立，首任主任蔡江南教授。

2004年，国内首个以书院形式存在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泛海书院成立，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为书院揭牌并致辞，蒋学模、张薰华、洪远朋、华民、袁志刚等参加了会议，洪远朋教授任书院院长。

经济学院紧扣师生们需求的国内外经济最

新动态和经济热点问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日本京都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等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受聘担任经济学院的兼职或客座教授，“汇丰经济论坛”“哈佛—京都—复旦三方圆桌会议”等国际学术论坛和国际学术会议定期举行。仅2001—2004年4年间，经济学院就承担了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超过40项，经费总额超过1200万元。

学科建设之外，经济学院的办公地点也在这一时期几经变更。2001年时，700号办公楼因电线故障发生火灾，此后经济学院先后迁入800号楼和11号楼办公。

2005年，正逢经济学院建院20周年，3月6日，经济学院新大楼开工仪式举行。9月16日，学院在浦江游船上举行“学院校友联谊会”，并



2010年12月1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校友高峰论坛暨各界校友联谊会



2012年，经济学系成立90周年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召开“建院20周年音乐会”；24日还举行了“庆祝建院二十周年招待晚宴”。12月20日，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成立。

2007年1月18日，复旦经济学院楼竣工交付使用。此后，经济学院的办公地点更改至这座位于国权路600号的新大楼。新的大楼设有报告厅、阅览室、教师办公用房、多功能厅等。如今，经济学院设有图书学术资料室，拥有中英文图书资料18万册，其中外文书刊7万余册，是复旦大学最大的二级藏书机构之一。学院刊物《世界经济文汇》是国家级甲类核心期刊。学院刊物《世界经济情况》则是国家世界经济类核心期刊。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学院还在2002年成立了复旦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成立了公共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联合发起成立复旦大学荷兰研究中心，同年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成立；2006年，成立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反洗钱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成立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论坛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成立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杜伦大学联合金融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复旦大学国际矿业权交易与国家资源安全研究中心，隶属于

经济学院。

2010年，蒋学模经济学讲座创立，每年邀请7位世界大师级经济学家前来复旦授课，每位受邀教授在复旦的授课时间为两周至一个月不等，成为面向复旦师生的高级经济学短期课程，截至2014年底，经济学院已举办了40场蒋学模经济学讲座。

回首30年，经济学院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发展30多年可谓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学院的发展跟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是同步的，在经济转型的同时，经济学院也在不断地实现机构的转型。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院已建立了一个层次完整、专业众多、国内领先的经济学学科群。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有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重点学科包括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和应用经济学科中的金融学、产业经济学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专



经济学院现在办公大楼——复星泛海楼

业12个，硕士授予专业15个，专业硕士学位项目有5个，学士学位授予专业5个。

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经济学院一直秉承“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的治学传统。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30年春风化雨，30年春华秋实，经济学院一直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学科建设，培养卓越人才。■



2019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影



蒋学模(1918—2008)，浙江慈溪人。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编辑，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评议组成员，《辞海》政治经济学分册主编。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部、论文200余篇，累计近2000万字。其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再版12次，四十年来发行量突破1800万册，创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

蒋学模： 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文 | 牛林峰 梁好

“至少到90年代中期，”81级本科、现任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回忆，“所有(学经济学的)同学听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字是蒋学模。”

那时，蒋学模出访国外回来，在大礼堂作报告，讲当时最前沿的讯息，学生们蜂拥过去，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去赶明星演唱会。

学生们认识他，大抵是通过初版于1980年，再版12次，四十年来发行量突破1800万册，创下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毛主席接见过的业务骨干

年过八旬的蒋学模在谈起治学初衷时，仍能清晰忆起当年，身为银行职员父亲因险些算错几分钱的账而受到警告处分。大人怕失业，蒋家兄弟姊妹3人则因失学危机而陷入一阵恐慌。从此，蒋学模孜孜不倦地找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阅读。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就派工作组进驻各高校领导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首先是课

程改革。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系的基础理论课，也是全校所有系科的一门政治理论课。

不过，“很明显地有两个跟不上。一个是教材跟不上，另一个是教师跟不上”。

为此，1950年，中央在北京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并要求各地高教局选派青年教师到人大向苏联专家学习。

同期进修的苏绍智一年后即被学校召回，而他则是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批延期一年返岗。苏联专家上课的时候照着讲稿逐字照念，即使是蒋学模也感到无聊。

不过，作为世界上唯一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基于苏联经验总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倒是令他眼前一新。



2000年9月15日，复旦大学经济系60届毕业40周年聚会

正如蒋学模自己所说：
“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再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1952年夏天，蒋学模甫回到复旦，便迫不及待地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一道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这是国内第一本包括有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

他的科普读物则是让领袖读罢也不禁称赞。1957年7-8月间，蒋学模与漆琪生等人受到毛主席接见。

好景不长。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一经付梓，次年就由人民出版社出中文版。苏联教科书一经出版，高教部就通令全国高校一律采用，蒋学模等编写的讲义便暂停印行。

他倒是没有太挂在心上：“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苏联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无匹威望，“苏联教科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威著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普遍采用的国际教科书”。

就在他受到领袖接见的同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大受冲击。经济系全体师生所幸到江苏吴县望亭公社里参加劳动锻炼，在“社会大工厂”里学习经济学。

1958年冬天，正在公社为学生授课的蒋学模却忽然被召回上海参与自编教材。这本教材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政

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

后来，蒋学模看到了一份内部白头文件，才知道苏联教科书被批了，几个“党的秀才”写出了一份关于苏联教科书的谈话记录，对之大加挞伐。

大跃进结束后，某领导要求停用自编教材，恢复苏联教科书。蒋学模等人再次陷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迷雾之中。

各种运动中，“文革”也迈着气势汹汹的步伐来了，苏联教科书被大批特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越发跟不上最新最高指示了……

“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动荡岁月结束了。

编写新教材的事又提上日程。1979年夏，蒋学模进京担任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组长。随着经济建设成为中心，过去没有的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过去不谈的问题也重新提上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议程。198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全国同类教材中第一次不再提现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

蒋学模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也要受到价值规律制约。

“人家说他风派，实际上呢，他是比较紧



2006年10月28日，蒋学模（左）与学生洪远朋摄于学术研讨会上

跟党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的老搭档伍柏麟说。

根据那个年代党代会和新政策的诞生频率，《政治经济学教材》几乎每隔两年就要大幅修订一次。

90年代，张晖明读在职博士，选现代企业产权理论做题目，蒋学模态度开放，要张和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对接好。当时他在编一本书，常打电话给张晖明，询问“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张引经据典，蒋便嘱咐他“把这本书给我带来”。

正如蒋学模自己所说：“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再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1993年，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张军筹办新政治经济学年会，北京的于光远谈起自己坚持当初的信念，自称“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蒋随即插话，“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笑声四起、

掌声不断。

走到人生边上的蒋学模，对于曾经几次让他参编教材的努力付诸东流的苏联教科书，比年轻学者更加豁达：“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能苛求于苏联教科书的作者们的。”

见证了儿时两大心愿依次实现的他感叹道：“在我80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深信马克思主义是能够阐明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惟一真理，深信社会主义是惟一能导致中国繁荣富强和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辈子要我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是不可能的。”

本文系在牛林峰所撰文字基础上删补，主要参考《复旦大学教授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志》、《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张薰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62年至1984年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曾兼任校工会主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荣誉主任等职位。其最早提出了“土地批租理论”，为中国土地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潜心钻研《资本论》，为该领域研教的权威及领军人物。

张薰华： 贱尺璧而重寸阴，以“经世”之传统助学科之蕃昌

文 | 何思妍

1942年，刚升入大学二年级的张薰华满怀“经世济国”之志，决定从复旦大学农学院转至经济学系，一边参与学生运动，一边学习。由于表现优异，抗战胜利后，张薰华便水到渠成地留系任教。50余年的任教生涯里，张薰华披肝沥胆、孜孜不倦，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和复旦大学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任之中。

1962年，结束了三年中央党校“秀才班”培训的张薰华回到复旦，开始接任经济学系系主任一职。在任22年间，张薰华坚决贯彻中央“高校六十条”精神，对教材建设给予充分重视，组织教师修改了自编的《资本论》讲授大纲、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多门课程讲义，并成立两个专门组与外文系合作编写俄文与英文的经济文选，作为高年级学生的自学用书。在系主任张薰华的带领下，1984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跃升为全国最早的重

点学科与博士点之一。

也是在接任系主任职位的同一年，张薰华开始在复旦大学系统教授《资本论》。在课堂上，他创造性地用“圆圈的圆圈”方法，生动形象地把三卷《资本论》的内容剖析归纳为六个圈层，形象且创新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展示了《资本论》的逻辑美。他的学生，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回忆道：“张薰华老师教《资本论》时运用的‘圆圈论’方法，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还在使用。”

在张薰华看来，教学工作应与研究、应用《资本论》紧密结合。“文革”前，他就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7年间，张薰华又相继出版了《资本论提要》和《〈资本论〉脉络》两本知名著作，它们至



—
50余年的任教生涯里，
张薰华披肝沥胆、孜孜不倦，
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和复旦大学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任之中。
—

今仍是复旦乃至全国经济学院研究生的重要教材。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但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却始终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凭借扎实的《资本论》基础，张薰华的研究对象开始深入到了“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和环境。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从源头到本身再到结果，循环运转”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范式。基于此，1989年，张薰华出版专著《生产力与经

济规律》，深入浅出地探索了环境经济规律，也为日后成立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

张薰华还是最早提出中国土地批租理论的学者。当时，中国虽已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尝试土地出租，但由于土地公有制存在时间过长，地租总被污名化为私有权的产物。而张薰华敏锐注意到了地租存在的合理性，于1984年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经济下地租的必然性》



论文，提出“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的新观点，开始在学术领域向土地批租的国家法律禁区发起挑战。这篇论文为建立中国土地批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极大程度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高速发展。张薰华也借此荣获了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1980年，长期潜心《资本论》研究的张薰华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

一文，试图对《资本论》中的计算错误提出校正。这是中国经济学界首次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错误。面对国内学者铺天盖地的反对质疑，张薰华照盘皆收，对各方意见一一研究思考，并给出答复，在坚持正确论点的同时，也对个别不妥之处虚心校正。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也因此形塑了一代代复旦经济学子的灵魂。他的学生朱民曾撰文表示：“张老师身上代表的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独立精神，开放自由，追求知识，追求真理……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除去学者身份，学生们眼中的张薰华，既是严师，又是益友。任教50余年，张薰华在复旦大学先后承担了统计学、经济数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环境经济学的多项教学工作。在张薰华的教诲下，洪远朋、王战、朱民、程恩富、朱国宏……一批批卓越的复旦学子从经济学系走出，在社会各界大放异彩，桃李满园。也正因张薰华以身作则、在育人上的杰出贡献，1989年，他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张薰华一生坚持学术研究，离休进入垂暮之年后仍不离国家大事，继续苦心钻研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为经济学界与社会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

2021年，这位有着经世致用之才、学富五车的复旦教授不幸逝世，但他与老一辈复旦学者们共同开辟的“复旦方案”，以及为复旦经济学院，乃至中国社会作出的卓越贡献却将永垂史册、熠熠生辉。■



宋承先，1951—1987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近四十年的执教生涯间，宋承先先后出版《论重农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资本论〉提要(4)》《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著作，著有《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初探》《需求和社会必要劳动与市场价值》《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宏观控制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多篇论文，为新中国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承先： 不倦历历，皓首穷经，博古今，通中西， 绘就学科璀璨

文 | 林珺瑶

宋承先在四川省眉山市的青神县长大。1941年，他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1944年毕业后，又前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从事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本科阶段起扎实的学术训练为宋承先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几年的磨练与探索后，1951年，宋承先因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契机，来到复旦大学任教。

作为既通晓西方经济思想史，又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双通”学者，宋承先不仅熟谙西方从古到今重要学者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对“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有着深刻的洞见。进入复旦后的五六十年代成为他集中性学术产出的第一段高峰期。彼时，为推进全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了解，宋承先完成了数部评介西方经济学的著作。这其中，就包括《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论重农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等书籍，至今影响甚广。

1978年，宋承先和吴斐丹教授等合作，主持创建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硕士点。这一硕士点的设立应时代需求而起，为80年代国内风起云涌的经济体制改革输送了大批优质人才。陈鸿仪是宋承先指导的1979级硕士，现执教于美国创价大学。据他回忆，当时自己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开始从事国际贸易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后，宋承先立即恢复了对西方经典、前沿经济学理论学说的系统性引介。这之中，宋承先尤其关注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说和方法。几年间，宋承先先后出版了《增长经济学》《当代

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等作品。1983年，宋承先撰写的《资本论提要》第4卷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讨论“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内容，直接填补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中对应的空白。

学术上的求索也反馈于现实之中。以理论为抓手，宋承先对彼时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出了不少针对性的回应。1980年代，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与政策。宋承先发表了《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初探》《需求和社会必要劳动与市场价值》《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宏观控制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大量论文。这一批论文集中性地回应了投资、储蓄与消费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及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等重要现实问题，并提



90年代，宋承先开会时发言

“经世致用”的同时，
作为“师者”，
宋承先也为经济学系的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出了独到性的见解与对策建议。其中，有28篇论文后被合编为一本专著：《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经世致用”的同时，作为“师者”，宋承先也为经济学系的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七五”期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规划》的指导下，宋承先领任了复旦大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同时主导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展。



90年代，宋承先与学生交谈

1988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卷出版。这一册新编教材倾注了宋承先极大的心血，真正做到了“予多样理论以切实同情之理解，兼具批判之思考”。6年后，在宋承先日复一日伏案的努力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出版，比上册更添10万字。1995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卷本）作为优秀教材获得国家教委一等奖，也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典范。1997年，跟进学界最新的变动，77岁的宋承先亲自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作出修订，添加了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前沿内容。1998年，复旦大学获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正式单列西方经济学专业招收博士生。这一学科立身的成就背后，恰是宋承先数十年如一日耕耘，作为师者兢兢业业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身影。

在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近40年的岁月里，宋承先曾在院内开设包括“外国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多门专业课程，以洞见锐利，话藏机锋广受学生好评。1985年起，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成立博士点，开始招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宋承先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不过，对宋承先而言，无论面向本科生还是博士生的课，都是一样认



1990年，宋承先与妻子在美国合照

真对待，“往往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看各种文献资料备课，绝不马虎”。史晋川是宋承先指导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1981级硕士。在回忆起宋承先的课堂时，他说，“老先生是很有深度的，听他上课要课外多读书，保证知识的存量，才能自己思考（清楚）宋先生为什么会从这一点跳到另一点……”

除了讲授的课程，根据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和中国经济现状，宋承先还给研究生开出多门专题讨论课，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等等。开放、前沿、尖锐的讨论大大推动了学院青年学子研究视野的拓展，也直接推动了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宋承先亲自指导的研究生中，先后有近十位学

生成为国内各高校的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其中就包括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现任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等。此外，宋承先的学生蔡江南、符钢战、袁志刚等人先后获得孙冶方奖，史晋川、张军先后获得张培刚奖……

回首往事，宋承先毕生耕耘，以一人之力，为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的引介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了国内西方经济学的引路人。与此同时，也正是得益于宋承先数十年如一日对学生的关切培养，复旦大学西方经济学学科才得以不断成长，在为社会提供更多“它山之石”的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输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卓越人才。■



陈观烈(1920-2000)：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硕士学位。1948年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世界经济系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专于货币银行学、世界经济。全编有《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概论》《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陈观烈： 奠基复旦金融学，济世师亦百代师

文 | 马雪迎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至今仍有这样一项奖学金的颁奖典礼年年举办，它便是陈观烈奖学金。这一奖学金的背后，便是复旦大学第一

届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首任校长陈观烈先生的故事。

哈佛学成，陈观烈先生心系祖国，毅然

归国；扎根复旦，陈观烈执教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被许多学子回忆赞叹；深耕经济学、金融学研究，陈观烈先生开辟了中国金融学研究新篇章，亦带着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

学成归国，人称“哈佛三剑客”

人们常说的“哈佛三剑客”是指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哈佛大学里，三位优秀的中国留学生韩德培、吴于廑和张培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这三人先后都接受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的邀请，回国到武大任教，成为武大三剑客。以三剑客为代表的海归派的充实，使得武大形成了真正意义的自由之风。

但事实上，获得“哈佛三剑客”一称的还有三个人，其中便有陈观烈。

陈观烈先生于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河浦街道，1938年入重庆中央大学

攻读货币学和财政学，1942年毕业于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国立中央大学于1921年始建于民国首府南京，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学校。1949年被中共接管后，改名为南京大学。

1944年，陈观烈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求学。在哈佛，他主攻货币金融学，师从熊彼得、汉森、列昂惕夫、哈勃勒等名家。这一年，对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同样有着重要意义，陈观烈的留学意味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开始走向世界舞台。

在哈佛求学期间，陈观烈和后来同样成为经济学大家的谭崇台、陈文蔚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三人成绩优异，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



陈观烈先生(右)与谢希德校长

深耕经济学、金融学研究，
陈观烈先生开辟了中国金融学研究新篇章，
亦带着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

虽然身在海外，但是陈观烈却一直心系国家发展。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硕士学位后，陈观烈未作停留，马上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投入祖国的经济学、金融学建设中。

呕心沥血，奠基复旦金融学

回国后，陈观烈先在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作对日索赔的研究，次年受复旦大学之聘，任经济学教授。从此陈观烈扎根复旦校园，执教时间超过半个世纪。

1948年到1952年期间，陈观烈主要讲授货中银行、经济循环和商情预测等课程。“文



陈观烈(右)参加学术会议

化大革命”之后，陈观烈在复旦大学重开货币银行学，先是进行本科生教学，后来又兼带硕士研究生。1986年，陈观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为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为了反映世界上货币银行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陈观烈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研究和备课上，每一堂课都呕心沥血，精雕细刻，教学效果特佳。

2017年，在恢复高考四十年暨复旦大学77/78级返校大会上，他的学生朱民回忆起陈观烈教学的样子，依旧心潮澎湃。据朱民回忆，彼时陈观烈教一门新颖的课程《货币银行学》，自己编讲义，课上提出的观点也往往对学生冲击力极大。学生们时时在课堂提出疑问，陈观烈也总是细细地给我们解释。“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些观点，仍然是真知灼见。”朱民这样说。

陈先生在坚持“教师以教学为本”的原则同时，还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到1998年，陈观烈任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研究员，1989年任美国俄亥俄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陈观烈也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经常结合教学进行科学研究，曾率领学生承担国家“七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货



陈观烈(右3)与部分研究生合影

币需求研究”。

对于科学研究，陈观烈总是首先把成果输入教材，而不急于对外发表。而这些独到新颖的见解和热情治学的态度一直感染着他的学生。朱民表示，陈老师当时强调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非常超前的，即使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传导机制仍然是重要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陈老师在思维上给我点出了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实践约束，以及政策假设中实际基础的重要性，这对我在以后的无论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工作中都有深刻的帮助。”朱民这样说。

薪火相传，济世师亦百代师

2000年，陈观烈因病去世。蓝青曾为陈观烈现身的追思会写下侧记。文末他这样写：“做人，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做事，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是陈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陈先生对所有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如蓝青所言，陈观烈为众多学子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也对复旦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观烈先生于2000年去世后，他的门下诸位学生秉承陈老先生“治学严谨，淡泊明志”的学术信条，一同发起设立了陈观烈教育基金，继续关注和支持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生发展。

斯人已逝，他的影响却从未停止，并被代代传承。■

参考资料：《博士生导师陈观烈教授》；《济世师亦百代之师——陈观烈先生追思会侧记》；《校友之声|朱民：感恩复旦40年——在恢复高考40周年暨复旦77/78级返校大会上的发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官网



洪文达，1923年8月生，江苏南京人，2014年2月于上海逝世。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1956年到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在职期间创建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曾担任世界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洪文达： 世界经济研究，栽下一棵树终成一片林

文 | 林苗

洪文达，一位声如洪钟、乐观豁达、豪爽健谈的经济学家，在60余载的学术岁月里，他乐此不疲、专心致志、辛勤耕耘在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两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做好本职的科研工作，洪先生也承担起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平台、组队伍的责任，开拓性地搭建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为发展和繁荣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借由此文，让我们再次回到洪先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奋斗岁月里，共感其人文载道的通达一生。

洪先生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缘分从1950年始，彼时的洪文达刚建立了弃理从文，经济救国的理念，放弃了中央大学化工学科这一热门专业，专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浪潮中。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班就读的过程中，洪文达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演习更



1956年，洪文达与妻子陆杨结婚照



1990年，访美期间洪文达（右）与汪道涵一起合影

为深入，同时在《反杜林论》《资本论》的启发下，他更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热爱。毕业后，洪文达成功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教师中的一员，从华东纺织工学院到复旦大学，讲台虽变，但洪文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热忱不变。

他不断在课堂上告诉大家要关心新鲜事物，解放思想，睁大眼睛去看世界，重新去认识西方经济。在中美建交以前，在课堂上提出研究经济就要有全球眼光，这样的观点在整个理论界都是罕见且先进的。正因为如此，洪文达身后才会不乏“当时经济系，思想最解放的是洪老师”“洪先生对待学术严谨认真，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眼光”的评价。而洪文达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探

如果说真要把洪文达比喻成什么，
世经系学子的答案是一棵树，
一棵笔直向上苍翠挺拔的大树。

索绝不止步于课堂的讨论，1979年，由洪文达主动推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建成，成为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立并首次倡导以国际化视角培养经济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的系科，也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世经系先后培养了大批在世界范围有卓越贡献的经济学者，他们都笑称自己是“洪门弟子”。

如果说真要把洪先生比喻成什么，世经系

学子的答案是一棵树，一棵笔直向上苍翠挺拔的大树，在世经系学子的眼中洪文达不止是学术严谨的学者，更是亲切热心的长辈。他始终认为一棵树的成长，应有来日森林繁茂的模样，他在心中不断勾画世界经济教育的蓝图，始终将培养优秀的世界经济学子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经济系的建设带来更多可能。洪文达的努力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和先生在一起完全没有束缚或隔阂，他经常邀请学生在他家书房探讨问题，精力充沛热情开朗，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也不愿意停下来休息”。和蔼、亲切、没有架子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形容词，洪先生用真挚的心浇灌出一片树林，所有学子都跟着他这棵大树蓬勃向上，笔直生长。

洪文达除了在系别创立与学生培养上的前沿性洞见，他也在学术写作中默默耕耘。“洪老师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很严，从不轻易发表文章。”洪远朋教授回忆。“洪先生留下来的文章和著作是不多的，但接触以后就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很扎实，经济思想很开阔。”伍贻康教授评价。学术同侪的认可足见洪文达在学术上的勤勉付出。

20世纪50年代开始，洪文达就在政治经



2012年，洪文达夫妇与学生一起庆祝90大寿



1997年3月，洪文达在日本大阪经济与法科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研究所

济学的学术圈活跃，出版了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的学术成果，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其代表作《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若干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90年代初，洪文达依旧奋斗在学术生产第一线，笔耕不辍，和卫兴华等担任联合主编，编写了国家教委版《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本教材是洪文达半辈子心血的凝结，洪文达阐述论点时附带的论述非常犀利，文字读起来也酣畅淋漓。

20世纪60年代以后，洪文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转入世界经济这一新学科。在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建设中，洪文达带领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和基础性

的工作。着眼于世界经济中的全球性问题，洪文达参与了中国第一套《世界经济》三卷本教材的编写工作，为当时国内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视角，同时也为一般读者了解世界经济提供了一扇窗口，对世界经济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皆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洪先生虽已离开八年有余，但他的进取和纯粹却永远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子的心间。洪文达先生一生重情轻金、爱生如子、热心公益，纯粹得近乎天真，但却永葆对教育事业那份不变的爱，即便半个世纪走过，我们仍感动于洪文达这个名字背后的付出与虔诚。■



蒋家俊与妻子尹协美合影

蒋家俊，1924年11月生，江苏镇江人，2011年6月于上海逝世。1949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1950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50年至1954年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财政与经济》编辑、统计局综合组组长。1954年年末到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讲师，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曾担任经济学系副主任、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价格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蒋家俊： 振奋神州研经济，培栽桃李诵诗文

文 | 李大武 卢洁

“蒋老师总是戴着一副上黑下透明方框眼镜，伟岸的身躯站在讲台，一看就是学问很深的大家。”这是蒋家俊先生的学生、1983年入复旦经济系的吴先满对蒋先生的描述。至今他都记得，在夏天没有空调的教室里，讲台上蒋老师背过身板书时露出的那汗涔涔的衣衫。而这，只是蒋家俊在复旦任教近50年里的一个定格瞬间。

年少的他经历抗战时代的动荡，在不断的辗转中努力求学；而立之年时，他回到母校复旦经济系任教，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近五十年，兢兢业业，毫不松懈。为生，他积极汲取新知识，是身边人的榜样；为师，他学识渊博、精益求精，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奉献，投注心血栽培桃李，是学生们爱戴的良师；为人，他平易谦和，求真务实，不追求利禄功名，并以身作则将为人之道融入家庭教育之中……

求学似渴，做永不懈怠的读书人

1946年9月，蒋家俊入学复旦大学经济系，深入学习经济学知识。蒋家俊在经济系期间，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经济的课程，有些课程直接采用外国原版教材，他自修的英语派上了大用场。时任校长为章益任，经济系主任是漆琪生先生，教授货币银行学。

蒋家俊十分珍惜自己在校的日子，不仅认真学习经济系的课程，还汲取各方面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常去旁听外系一些有兴趣的课程，如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萧乾先生的英文新闻等；听讲马寅初、林同济、章靳以、文幼章等名人学者的报告、讲座；更是常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遨游书海之中。

当时的经济学院办公楼兼图书室，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921年，学生们总是会在建筑前边的大草坪上或学习，或休憩。这栋楼在1929年添建两翼，为纪念复旦大学前教务长、经济学家薛仙舟而改名为“仙舟图书馆”。

据说该馆名由复旦老校长于右任所写，但因篆书繁体字“仙舟”不易辨认，有些类似“傻瓜”，加之新同学中许多人不知薛仙舟其人，以讹传讹之下“仙舟馆”便被传为“傻瓜馆”，而那些常到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同学，也就乐意当“傻瓜”了，薛家俊也是乐在其中的学生之一。

当时抗战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复旦大学的住宿条件也很艰苦，学生有数千名，住的宿舍是接收过来的原为日本人造的住房和兵营。不



蒋家俊先生毕业照

过，因“以中有足乐者”，蒋家俊也甘之如饴。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横征暴敛，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军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种种暴行，更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蒋家俊和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了反美暴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蒋家俊深受爱国主义教育。

上海解放不久，蒋家俊从复旦经济系毕业。同年9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登报招考研究生。蒋家俊觉得很适合自己，也想继续深入研究学问，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于是欣然报名。虽然所考科目有国文、外国文、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财政金融问题、社会发展史六门，并不容易，但本科刚毕业的蒋家俊学业尚未荒疏，加之上海解放后的几个月内又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因而笔试成绩很好。周有光是蒋家俊的口试考官，对他的口试很满意。确认录取后，蒋家俊又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开始他作为研究生的新征途。

研究生期间，蒋家俊得到了更加系统化、专门化的经济学知识学习，例如“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经济”“新哲学”等课程，许涤新先生还亲自主讲政治经济学课程，并聘请许多专家学者、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来讲课或

作专题报告。通过学习，蒋家俊不仅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了解党的经济政策，而且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经过一年的学习，研究所的学生即毕业分配工作，蒋家俊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于1950年7月分配到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参加革命工作，按当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待遇。

重回母校，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1954年，中央决定全国大区机构全部撤销，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此时复旦大学急需教师，蒋家俊便由组织决定调到复旦经济系工作。同年12月，蒋家俊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正式报到，任经济系系主任秘书，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这一年，他三十岁。

1959年开始蒋家俊主讲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1960年起担任系副主任。同时，由于蒋家俊分工专讲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为充实教学内容与提高教学质量，从此之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就成为他以后科研的主要方向。

入校工作后，教学之外，蒋家俊仍积极参与探索新中国建设的各项任务，1956年入党的决定更是为其增添新动力。随后三年，通过不断学习，蒋家俊还陆续发表了《怎样认识



1986届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向硕士生与导师组合影（前排左三为蒋家俊）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供需关系》《略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文章，以及与孙怀仁、汪旭庄两位先生合作编写了《资本、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作为政治经济学丛书之一。

60年代初，在“大跃进”严重后果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发酵下，国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也愈益被人们重视。蒋家俊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探讨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多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

1977年下半年高考恢复，复旦重新开始招收四年制的本科生，教学秩序逐渐走向正常，蒋家俊也继续担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

工作。

1978年6月，当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会议，讨论和编制各系新的专业教学计划，确定编写各门课程新的教材。此时已恢复经济系副主任职务的蒋家俊，和复旦大学文科各系10多位教师一起乘轮船赴武汉参加。

近30所大学要求参加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最后商定：北方13所大学与南方16所大学分别编写一套，也就有了后来国内的北方本和南方本两套政治经济学教材。而后经南方16所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各编写一本，其中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由复旦大学蒋家俊和厦门大学吴宣恭担任主

蒋家俊的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实况保持一致。
直至暮年，
他都在努力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编，以及来自其他大学的教师参与编写。这本教材第一版于1979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欢迎，为许多高校采用，先后印刷5次，发行44万册。

蒋家俊的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实况保持一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价格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引起人们重视，上海市也专门成立物价研究所，时任经济系主任的蒋家俊，兼任物价研究所副所长，后又选为上海市价格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价格学会理事。因此，蒋家俊在继续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之外，也较多地研究了价格体制问题，开设了价格学方面的课程，招收价格学专业的研究生。

党的十四大后，蒋家俊又撰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文章，提出新的价格体制。直至暮年，他都在努力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简朴务实，做平易谦和的大家

“蒋老师面带笑容，和我们谈话的声音很和蔼，让我一下子打消了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下来。”吴先满第一次见到蒋家俊，是在他1983年考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蒋家俊是主考官。

在他的眼里，蒋家俊自身学识严谨，为人和善，关心关爱年轻同志。在尚未入学复旦前，吴先满便读过蒋学模、蒋家俊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他们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粉丝”。

而在他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后，在课堂上又更加直观地领略到蒋家俊的大家风范和平易亲切。他回忆讲课时的蒋家俊，“蒋

老师长得很伟岸，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是学问很深的大家，他的字写得也如其人，带有一种气派在其中，讲课的时候很流畅，也会有一些风趣的语言。”据吴先满回忆，蒋家俊在课上经常给学生们介绍学术界的新兴观点，也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独到创新的见解，“让我们都受益匪浅”。

吴先满表示，蒋家俊老师是第二年给研究室的学生们作指导的，他每次阐述自己要作的主题时都十分认真准备，纸张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标注，也力求有新意，对学生们写的一些东西都会非常认真地作批改，既肯定好的地方，也指出需要改善和深化的地方。吴先满对此充满感激：“当时蒋老师非常忙，又担任系主任，又要参加很多的科研交流活动，还要编写教材，但他对于我们的指导任务，非常认真负责，从不松懈，我们都十分感动。”

当时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在校学习期间，逢年过节或学期伊始，吴先满都会和几个同学到老师们家里看望他们。吴先满回忆起到蒋家俊家中的场景，表示“当时我们也是不懂事、考虑不周，去看望老师时几乎都空着手，但蒋老师和师母完全不介意，一样热情招待我们，夏天的时候请我们吃西瓜，冬天的时候泡茶给我们喝。我还记得一个细节，蒋老师总是会把泡的茶直接端过来，甚至端到我们手边”。蒋家俊家中简朴的装修风格也让吴先满记忆犹新，“简约而不简单”，家里每个角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净舒服。

吴先满想，之所以过着简约的生活，也是蒋家俊想更加一门心思专心致志投入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中的原因吧。直到今天，吴先满都时常会回想起蒋家俊的大家风范，为人、为



蒋家俊在书房里工作

师的优良品行，并一直以他为榜样。

对蒋家俊的简朴，他的家人也深有体会。“父亲总是过得很简朴，尽管后来生活好了些，也保持着以往的简朴习惯。他常常睡在沙发上，退休后也是这样，我们总是劝他回房睡也不肯，也不让我们换新沙发。”蒋家俊的小女儿蒋以琤回忆道，“我们一家的生活过得算颇为拮据，但父亲还总是会资助需要帮助的亲朋好友。”

蒋以琤记得，有一年复旦大学举行第一届家庭演唱会，蒋家俊一家进入了前六名。参加决赛时，当主持人介绍到蒋家俊为经济系系主任时，由于当时蒋以琳没有上台参加，就听到坐在她旁边的人说，什么系主任，像扫大街的，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蒋家俊艰苦朴素的一面。

蒋家俊是1983年搬到复旦大学第二宿舍住的，一家人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蒋家俊还辟出了八九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作为书房，自称“三径荒斋”。“不过父亲特意挑了背阳的方向，把向阳的空间留给我们，所以父亲的书屋没有阳光，冬天尤其冷。”

八十岁之际，蒋家俊在他的三径荒斋写下这样一首表露心迹的诗：

江南碌碌一书生，虚度韶华八十春。

振奋神州研经济，栽培桃李诵诗文。

德行学业唯求己，利禄功名可让人。

三径荒斋凭栏望，光华日月满乾坤。

蒋家俊书于复旦园三径荒斋

2004年7月



郑励志，1924年9月生，台湾省台北人。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台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专长世界经济理论、亚太地区经济等方向研究。发表论文《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等30余篇，出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战后日本经济》等著作。

郑励志： 以大家之洞见，开时代之先声

文 | 李大武

为学之路从不懈怠

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时，郑励志已32岁。1924年，他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的一户贫困

家庭，自幼在日语环境中成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经由香港来到祖国大陆，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1956年，已经成家

的郑励志，响应中国共产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此时经济学系刊物《世界经济文汇》创刊，订了上百种外国经济刊物。按当时规定，学生不能借阅相关刊物。但曾于日本留学的主编吴斐丹教授十分宽厚，看重他能读懂日文，特别允许他借阅刊物。在复旦浓郁的治学氛围里，他像海绵一样尽可能地汲取各类养分。

毕业后，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任助教，开始了世界经济尤其日本经济的研究、教学生活。1964年2月，复旦大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示在全国率先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郑励志从经济学系调入该研究所。“文革”结束后，该所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

他曾担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

经济研究室主任。80年代以来，他20余次访问日本参与研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去过60余所大学，足迹踏遍日本各都道府县，在日本学界知己甚多。

80年代中期，郑励志受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嘱托，在多次访日期间筹备日本研究中心的建设。1990年7月2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创始人郑励志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在郑励志看来，复旦大学建立日本研究中心的宗旨，首先是学习当时快速发展的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推进经济现代化立一面镜子，同时也兼顾研究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中日关系及其演变。历经32载时节更替，日本研究中心以中日关系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全面开展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



2001年2月6日，郑励志（左一）与上海领导在一起

直至郑励志以80岁的高龄光荣退休，
他始终在第一线关心、指导着学术研究工作，
奋战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

的研究和交流，已成为中国领先、国际知名的日本研究机构。

在长期的教研经历中，郑励志还培养了一批从事日本研究、中日交流的高级人才，为增进中日友好、促进相互理解、密切中日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因其中日交流中的卓绝成就，2004年和2015年，郑励志分别荣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和“日本国政府旭日中受章”。

直至郑励志以80岁的高龄光荣退休，他始终在第一线关心、指导着学术研究工作，奋战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然而，他始终低



2003年1月23日，郑励志（左）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钓鱼台国宾馆

调谦逊地看待自己的巨大贡献。郑励志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成就，唯一我认为可以称作为我们国家做的贡献，便是我的股份制研究与在1977年影响了全国的讲话。”

“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1977年夏，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计划在北京发起“全国世界经济研讨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受邀参加。时任研究所所长余开祥教授指定郑励志同去。郑励志在自述中回忆道：“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快的情况告诉国人，以澄清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及其对国家的误导。”

在会前筹备的3个月里，他想尽办法找来世界各国出版的历史统计文献，依据美、英、德、法、日、意、荷等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871年以来100余年的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统计资料，靠着仅有一台破旧的手摇计算机，整理计算了上万个数据。这3个月里，他常常通宵达旦，在“嗡嗡”成群的蚊子里，只有一架“咕隆”“咕隆”的手摇计算机陪着他。艰苦付出之下，他最终得出一个笃定无疑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



2004年9月，郑励志夫妇与复旦大学领导在一起

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结论在当时的政治、舆论环境中是破天荒的。有同事看到他得出的“吓人”结论，好心劝告他不要贸然在会议上发表。但他始终觉得，“面对2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折腾，我不能昧着职业良心，不发表可能有益于国家的研究成果。”

1977年11月，“全国经济研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面对4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经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郑励志如实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战后近30年的发展速度之高，实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所罕见。”在这篇报告中，他强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各国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

率，促进资本积累，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并扩大了生产资料 and 消费市场。

郑励志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全体与会者都静静地听着他的报告，并在结束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有好几位学术界的老领导、老前辈握着他的手感慨：“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了不起。”

此文后续改写为《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刊登在《复旦学报》上，受日本主流刊物《世界经济评论》全文译载，编者说郑励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而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评价，郑励志仅凭这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

翌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郑励志倍感



桃李满天下——郑励志与学生们在一起



郑励志全家福

鼓舞。同年6月，他于上海各区、县、大专院校等单位作《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报告，为广大干部、群众介绍国外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至同年11月，郑励志共完成30场报告，听众超过10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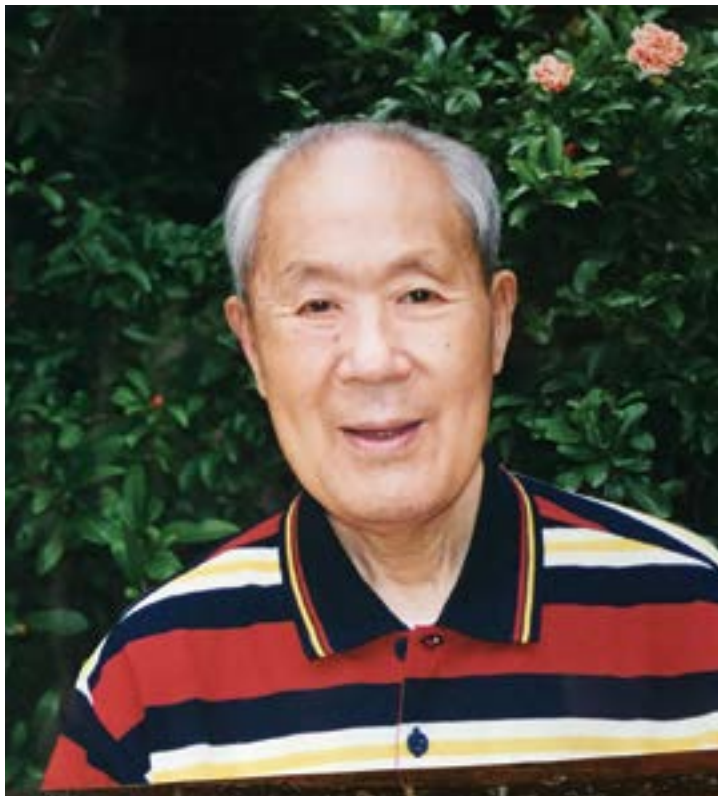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最后一场讲座由解放日报社组织，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召开。三层楼、2000人的大场子，挤得满满当当的。在郑励志3小时不间断的讲话中，直到华灯初上，也没有人提前离场。“闭关自守太久了，大家脑子空空的，好像‘久旱逢甘霖’。”这动

人的情景，至今仍常常浮现在郑励志眼前。这连续30场报告，被学者称为“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1979年10月，郑励志再次受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邀请到厦门参加“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讨论会”。这一会议的目的是组织全国专家、学者，讨论“亚洲四小龙”可供我国经济发展借鉴之处。郑励志回忆，会议开展并不顺利，不少学者收到“注意言辞”的告诫，纷纷改变了准备好的发言，“一个个言不由衷起来”。

当计委同志焦急地问向郑励志时，他当即回应：“我有不同意见！”一上讲台，他直抒胸臆：对20余年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应该基本上予以肯定。引进外资和技术、大力开展加工出口贸易、开辟加工出口区等具体做法值得我国参考。原先发言时间限制在半小时，但主持人力邀郑励志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发言。现场400余名听众鸦雀无声，一至发言完毕，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经此一事，与会专家、学者顿时鼓起勇气，讲起“真话”。后续，郑励志被告知，计委以其讲话为主向中央做了汇报。再往后，我国设立四大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激昂向前。

郑励志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只是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在国家需要时贡献出来，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让闭关自守了几十年的国人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可贵的，就是敢于讲出来。”这位学术大家，始终热忱治学，以赤诚之报国信念、正直之浩然气魄，在我国改革开放路上，引领时代思潮，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先声。■



余开祥： 以毕生之功力开拓世界经济之研究

文 | 林苗

1941年，余开祥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这是一所以“党化教育”闻名的国民党高校。彼时，中央政治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十分严格，余开祥不满于学校严格的“思想专治”，想要寻求更

民主自由的求学环境。1943年，顺利通过转学考试的余开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自此，余开祥开始了和复旦的缘分。两年后，他顺利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解放初期，余开祥则协

余开祥，1922年7月生，浙江江山石门镇人，1943年转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194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民主同盟”，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余先生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64年起，主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常工作，先后任该所德法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为世界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除了在组织框架搭建上不可磨灭的推动性作用，余开祥在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上也维持着极高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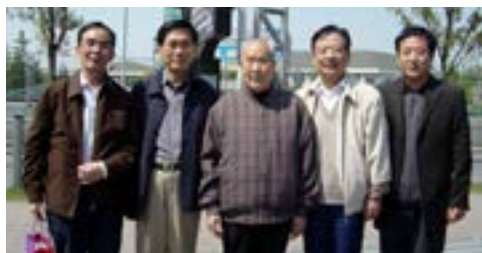
助筹办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中，并于1956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



1983年，余开祥与英国组教师商讨科研工作



1984年10月，欧洲共同体国际讨论会



2008年4月18日，余开祥（中）与64级世经所研究生合影

1964年，复旦大学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成立初期，经研所的主要领导由校领导层挂名，但实际工作则落在余开祥等人身上。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安排，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研究对象为西欧北美，研究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同时也研究政治。

建所初期，一切从零探索，任务繁重，人才缺口很大，余开祥主动担当起招揽人才的任务，到每一位进所工作的教师家里访问、做工作，把各研究室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又从1964年、1965年应届毕业生挑选14名年轻人进所，真正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基础。1978年底，为扩展研究领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经国家教委批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改名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并一直沿用至今。余开祥教授担任所长多年，给予经济学院和世经所的老师与同学很多的关心和教诲，对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初期成功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在组织框架搭建上不可磨灭的推动性作用，余开祥先生在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上也维持着极高的影响力。过去的积累和沉淀也让他决心扎根西欧经济和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为真正做出学术意义、经济效益、社会



2010年10月世经所部分老师聚会，左起：罗秀妹、史家定、甘当善、伍貽康、董平、余开祥、刘同舜、郑励志、邹根宝、葛霖生

价值三位一体的前沿成果而努力。

1972年，余开祥参与主编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与肯定，也提高了世经所的地位。1973年，在余开祥主持下出版的《西欧共同市场》，是我国最早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著作。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研究要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紧密结合的研究主张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其“洋为中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严谨笃实的学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他到了晚年，还一再告诫后辈不要放弃国别地区的研究，世经研究要以国别地区为基础，重点抓国际关系研究，研究世界经济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余开祥带领世经所同仁坚持这个方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确立了世经研究的领先地位。

把中国观点带出国门同样也是余开祥教授毕生的学术追求，他也为此付出诸多心力。

余开祥教授前后赴墨西哥城、联邦德国波恩、布鲁塞尔等地展开学术交流，开启了欧共体与中国学术交往的大门。余先生始终认为携带学术观点出国门无关国别，无关地点，走出去的是学术交流，带进来的则是世界对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的认可。以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为窗口，余开祥积累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广泛影响，并成立了中国西欧学会和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为推动中国经济研究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打开了又一个全新窗口。

纵观余开祥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世界经济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世界经济研究的演变线索。余开祥不断适应着国家各个时期对于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代需要，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滚滚的学术后浪奔涌而来，但却忘不了余老先生这位经济学家求真务实的学术公心。■



叶世昌(1929—2022)，浙江台州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系，留校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至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72年调回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七十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叶世昌潜心于中国货币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金融史研究，挖掘史料，辛勤著述，逐步形成了货币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和金融史学研究相结合、重点问题探讨和系统教材撰写相协调、理论抽象和历史描述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园。他出版著作(包括独著、主编、合著)2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荣获省部级奖项10余项。他被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018年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叶世昌： 求真求实，无问得失， 冷板凳上写就中国经济史学新篇章

文 | 万嘉茵

为人先亦为人师，
在复旦大学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承续和发展中，
叶世昌为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在上中学时，叶世昌就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看了很多历史小说，了解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得到周伯棣、朱伯康、夏炎德、陈观烈诸位师长的教诲。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时，他看到彭信威先生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货币史》，萌发了从事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念头。当时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恰巧有一批古钱，经他研究整理后布置了一个钱币陈列室，获得成功，坚定了他的专业方向和科研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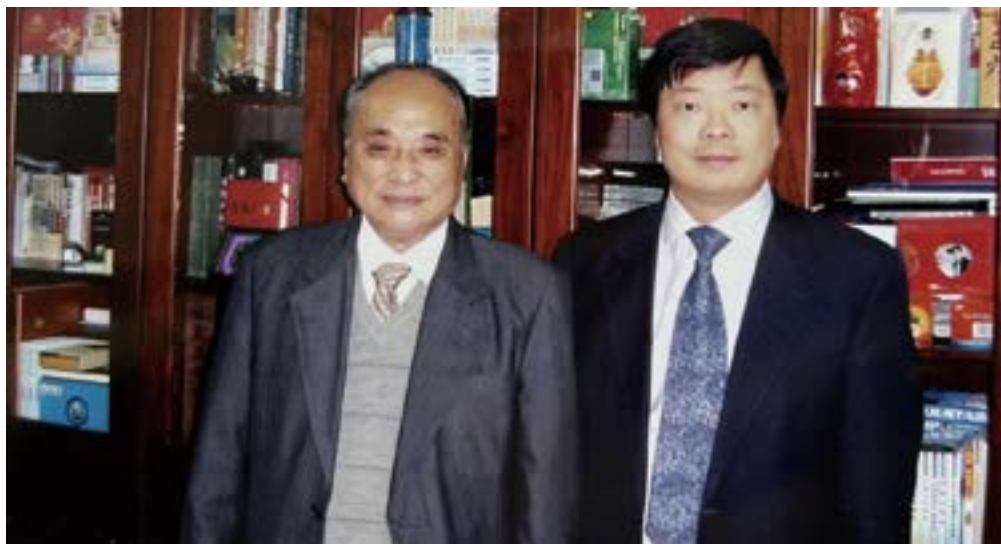
1953年，叶世昌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训练，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他结合教学工作，认真阅读经典原著，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用功尤深。1960年，他读到了由巫宝三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内涵丰富的货币思想史料让他如获至宝。在理论方法和史料齐备的基础上，他用货币理论史上的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两个学派作为参照，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学说进行探讨，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于196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八万字小册子，既给予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以莫大的鼓舞，也奠定了他未来研究的基础功底。此后，他

连续在《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解放日报》《文汇报》《江海学刊》等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引起关注。

1972年回到复旦大学后，叶世昌为经济学系学生开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着手编写教材，其研究方向也由货币



叶世昌1947年至1951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拍摄



叶世昌与学生欧阳卫民（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合影

史扩展到经济思想史。从1978年至1983年，由他作为统稿人之一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由他独立撰写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文字简练，史料准确，历史跨度长，观点得当，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被一些大专院校用作教材。上世纪90年代，他将下册扩充改写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于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对上、中册进行修改，其中上册增加内容较多，两册合为一册，作为《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于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与此同时，叶世昌继续耕耘于中国货币史、金融史的园地。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他修订彭信威先生的1965年版《中国货币史》。经过翻检史料，完善论述，得以完成。虽然修订版最后因版权问题未能付梓，但叶

世昌通过对《中国货币史》征引资料的逐条核校，掌握了很多可靠史料，“这些比修订版报废更加重要得多”，“学问不怕没有地方用”。他一方面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对〈中国货币史〉的若干订正》一文公开发表，同时干脆把中国货币史也列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6年和1993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和下册，作为自己在此领域耕耘数十年的成果集结，这套著作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赞誉，在1995年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此书于2003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再版，获得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第三版。

后来，中国金融出版社要编写多卷本《中国金融通史》，由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诸先生主编，商定由叶世昌负责撰写中国古代金融部分。于是，他又将中国货币史的研

究扩展为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交稿多年后于2002年出版。在此以前，叶世昌还和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也是其学生——潘连贵合作，写了一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叶世昌治学严谨，求真求实，1963年，他在《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人现代化问题》，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时新观点提出商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讨论。对《管子》的“轻重”理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王夫之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说，他都不厌其烦，正本清源，做出了细致的考据和合理的解释。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在叶世昌身上有生动的体现。他家中的资料手抄本、剪贴本有厚厚的几摞。《明实录》、《清实录》共7000余卷，他花数年时间从头翻到底，抄录对自己研究有关的史料，还有笔记、小说等也都在他搜集资料的范围以内。2005年，他被聘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典志·财政金融志（下）·金融篇》项目的主持人。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年届75岁的他逐日查阅《申报》《上海新报》等原始资料，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掌握的货币金融史料。这些第一手史料在他撰写的多篇论文中被大量引用和首次分析，显著提升了《金融篇》研究的原创性和科学性，项目等级被评定为优秀。

叶世昌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2017年，出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下册），该书下册系统论述了1919—1949年的经济思想，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2020年，以91岁高龄，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为人先亦为人师，在复旦大学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学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中，叶世昌为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他长期给本科生开课，为20余届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课程或指导论文。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主持开办过两期中国经济史学助教进修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几十名急需人才。他招收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36人获得了学位，还有多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学生中有的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如欧阳卫民（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有的成为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大部分学生已成长为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



伍柏麟，1951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52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三年。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代院长、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首席教授。开设“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1988-199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设想”课题组研究主持人。

伍柏麟： 言之求是，为之力实，接力铸造学科“黄金时代”

文 | 万晓强

1947年，伍柏麟进入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的大门，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1949年初，暨南大学经济系率先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他在复

旦毕业后，经国家统一分配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年后，又因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又调回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并在蒋学模

教授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课担任助教。

任教不久，伍柏麟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再次学习的机会，他前往人大学习三年，最终抱得全优成绩而归。回校后，伍柏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学研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广受学生赞誉。而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授课和严谨治学”精神，伍柏麟后来曾两度获得学院教学一等奖。

在教学同时，伍柏麟又主编了复旦大学另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主编任务。在1986年，《政治经济学教程》顺利出版。而在这本新编教材中，伍柏麟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作了探索性的安排，按照逻辑顺序和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叙述原则来排布，打破了在我国沿用数十年的前苏联教学



体系，引发学界一阵赞誉和热烈讨论。

1980年代，党中央正式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路线。如何保障中央关于中期改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当时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适应当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形势，198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又成立了经济学院。而伍柏麟同时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老、中、青二十几位专家组成的“1988-199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设想”课题组，研究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简称“复旦方案”，因不同于当时依旧盛行的“价格改革为中心”思路 and “企业改革为中心”思路，也被视作有创新意义的“第三条道路”。

但由于“复旦方案”中部分观点不符合上



1961年，伍柏麟结婚照

学界对伍柏麟高度评价，
“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最大特点，
就是富有创新精神”。

级领导设想，和当时的主流意见有所不同。校领导找伍柏麟谈话要求修改，伍柏麟态度鲜明，始终忠实于自己团队的思考，说“基本观点不能修改，个别字句可以斟酌”。他又对课题组成员说，“出什么事一切由我负责”。后来，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

搞市场经济，社会形势迅速明朗，“复旦方案”的观点也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最终未作任何修改得以发表。学界对伍柏麟高度评价，“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富有创新精神”。

由于伍柏麟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



1980年代，伍柏麟在复旦教室给学生们上课

综合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满腔热情，1996年，他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获此荣誉称号的伍柏麟仍然笔耕不辍，先后领衔主编《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等多套经济学丛书，尤其是他带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青年教授合写的10卷本《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已然是复旦“学院派”的成名之作。其中《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一书更是该学科领域的领衔之作。该书不仅全面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更深刻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理论思潮的演化轨迹和演进动力。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伍柏麟以其实际行动塑造着经济学院的学风，直至今日，很多复旦的毕业生还对伍柏麟念念不忘。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依然难忘在复旦的求学生涯，“记得当年名师授课，风采各异，精彩纷呈，常令我辈青年学子激励不已”。

在伍柏麟和其他教授的悉心教育下，经济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卓越学生。“史正富、朱民、华民、周伟林、罗首初……”列举起名字来如数家珍，他们都已成了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伍柏麟十分欣赏这批学生，常常称赞他们勤奋、好学、思想独立、解放。

2014年，《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在二十八年后再版发行，其中新增了全球化的知识，全书以“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收尾。伍柏麟说，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并存的、共荣的”。正因这本反复改编、更新过的著作，他成为了“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得主。

伍柏麟和许多经济学院老师一起，铸造了



伍柏麟教授（左）与蒋学模教授

经济学院的“黄金时代”，推动学科建设和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复旦的闪烁印记。📖



洪远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

洪远朋： 立足中国，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命题

文 | 朱怡

“学科建设有了较大进展，教学改革前进了一大步，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教书育人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师资队伍老、中、青相结合，社会服务带来社会效益。”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洪远朋教授在庆祝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十周年的典礼上这样总结建院十年来的成就。彼时，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稳步推进，经济科学青春正盛，经济学院搭乘时代的快车，向“办成一流学院”的目标进发。

将知识性、理论性成果加以社会化的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大众化的过程，
而这正是洪远朋穷尽大半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学院迈入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洪远朋个人进入学术爆发阶段的重要时期。仅1983年一年，洪远朋便独



立发表了8篇论文。同年，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在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次年，他成为全国百名50岁以下的特批教授之一。洪远朋的硕士生、曾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现在的科研最早受他启发。他很刻苦，中年的时候在复旦成果他第一。”

洪远朋潜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至今已一甲子有余——自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向科学进军号召，作为调干生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到1961年大学毕业后师从蒋学模先生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再到1964年学成留校任教——迄今发表相关著作60余本，学术论文360多篇，被誉为“既能坚持又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洪远朋确信《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确信马克思主义万古长青。尽管一生嗜读《资本论》，一生研究《资本论》，洪远朋仍评价自己“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洪远朋教授谦称其“贡献不大，荣誉却不少。”2008年，洪远朋所著《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一等奖。2012年，被公认为



“最早建立社会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洪远朋，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奖状书其主要学术贡献为“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教学和普及，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问题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提出了富有创建的观点，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九届论坛授予洪远朋教授“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奖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然而作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洪远朋从未将自己定义为象牙塔里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是立足中国现实思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观察者。“理论家应该走出书斋，密切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改革，尤其是越来越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经济。”从事学术研究，洪远朋始终坚持

知识性、理论性、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联系实际，才能掌握真理，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现实意义所在。”将知识性、理论性成果加以社会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大众化的过程，而这正是洪远朋穷尽大半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在毕生学术著作中，洪远朋最看重的是《通俗〈资本论〉》。1985年，洪远朋编写了《通俗〈资本论〉》一书，该书忠于原著，体系完整，重点突出，结构严谨，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在《资本论》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尝试。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世界再现“马克思热”“《资本论》热”，中国也不例外。应出版社之约修订后再版的《通俗〈资本论〉》，不但成为理论读物中的畅销书，还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

读物的推荐图书。

自律自励，言出必行——这是提及洪远朋性格时最常见到的评价。时至今日，夫人周建平仍对丈夫当年的刻苦治学感佩不已：“他是很勤奋、很艰苦的。女儿出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大早又赶去给家人排队买菜。”1991年至1996年任经济学院院长时，他每日必到办公室，每天接送教师的第一趟班车上总有他的身影。洪远朋自我要求高，做事雷厉风行，刻苦实干、说一不二的性格几乎贯穿了洪远朋的一生。“经院都知道我是急性子。交给我的任务，我只有提前。上课总是提前一刻钟到课堂，从来没有迟到”。

与复旦经院结缘六十载，在洪远朋眼中，

这里不仅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才高地，更是一个师生教学相长、互促提升的好地方。他认为年轻时的进步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打下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有所成就则离不开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诸多研究课题“得到认可并不单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团队共同成果。学生们不仅提供了他们的才能、知识，也无偿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2015年，耄耋之年的洪远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典上用“回顾过去奉献巨大，展望未来前途光明”致辞祝福，提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不仅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学院的一流，而且是第一名”的真切希冀。这不是一位老院长的殷殷嘱托，更是一个经院人的拳拳期待。■



洪远朋、周建平夫妇合影



施岳群，1942年生，江苏省海门区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任教。曾任经济学系副系主任、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副校长、安盛·国卫/复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等职。1999年后，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

施岳群： 引“数”入“文”，探索实践， 谋求经济学科的改革转型

文 | 万晓强

1965年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十四年的施岳群，每当谈起复旦大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时，他总会想起1977年时，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讨论。以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引数学入文科”（以下简称：引“数”入“文”），探索实践，谋求改革、转型的道路。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康托罗维奇”，让我找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再一个出口”

1952年起，我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全盘照搬了苏联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模式，课程以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为主，并学习古典经济学、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同时取消了经济数学课程。当时经济数量分析的学习，仅仅限于会计学、统计学原理等课程。直到1977年前，我国大学经济学的学生几乎没有接受过数量分析方面的严格训练。

正是在上述办学背景下，在复旦预科文科班两年学习过程中，经历了偏重于语文、史地和社会科学训练的施岳群，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进入大学以后，看书、听课、记笔记、写文章等比同龄人学习得更顺利一些。

1965年大学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无论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还是在管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如何寻找到经济学的创新点和发展路径，是他一直留意思考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我大学毕业后十年里，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施岳群说，“我还发觉，想要持续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深度，总好像存在着隐形的‘软肋’和‘瓶颈’，难以前行。”

1975年苏联经济学家列昂尼德·康托罗维

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关部门要求院系里同事们介绍其人其事，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听说过康托罗维奇，这位苏联经济学家获得诺奖了，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施岳群既十分沮丧、又十分错愕地说回忆道。

正当我们“无从下手”地寻找康托罗维奇资料的时候，数学系谷超豪教授一语道醒。他介绍道，康托罗维奇是一位学术造诣极高的经济数学家，早在1939年就出版了《生产组织与计划的数学方法》的经济数学著作，他一身致力于线性规划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探讨了怎样最优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和编制国民经济最优计划等问题，在数学和经济学研究及应用工作方面皆有突出的贡献。

“康托罗维奇”之问，让施岳群惊醒，自己专门从事了数年的苏联经济学研究工作，但却从未了解过如此一位卓有贡献的苏联经济学家。

“这件事，令我羞愧难言！”施岳群心痛不已。

他在工作中愈发感觉到，盲区的存在，或许是传统方法和固有观念上出现了问题。在查



1960年，施岳群在复旦大学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受训英语打字收发报

探索实践， 是施岳群一生所恪守的四字箴言。

阅苏联经济文献资料的时候，他发现，难以完全读懂苏联经济学文章的真正原因，不是俄语水平不够，而是对经济问题分析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数学模型陌生。

还好，在复旦预科文科班两年学习过程中，施岳群不仅较好地接受了文科素养训练，也没有放弃数理知识的学习。他还经常翻阅《大众

科学》等科普书刊，涉猎理科知识。

特别是，当时他争取到了班里只有3个名额可以参加的“复旦大学无线电报务运动员训练班”，班主任老师给予了他热烈的支持。在近两年课余时间，施岳群学习到了不少无线电、通信和军事方面的知识，最后还成了该国防运动项目的二级运动员。在大学五年里，施岳群又尽量多听校园里的科普讲座，“虽然有些内容有些似懂非懂，但是报告者的渊博的知识面，科学的视野，研究的方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拨乱反正的1977年，讨论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中课程设置时，有一位老师说，1952年前，经济学系的学生是要学习数学的。也有老师指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数学还是要学习的。

回忆起上述讨论，施岳群说：“或许因为我有过被数学‘将军’的挫折，又或许因为我还有一些数理基础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就欣然吸收了开设数学课程的意见。”

之后，施岳群参与制定了1977和1978级经济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增设了高等数学课程。这两届同学，是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了大学，迎接他们的



1996年，施岳群在安盛/国卫-复旦保险培训中心开幕式上致辞



2007年，摄于复旦光华楼前

培养方案已经开始有了变革。

数学是一种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规范语言

当时我国经济学的观点论证非常考验言语推演和逻辑描述，业内学术交流讨论往往会以新闻文章和论坛辩论的方式开展，施岳群遗憾地说：“正是由于缺少了长期的数学训练，经济学者的数理素养和敏感度都不太强。”

“所以之后，我和一批教授和学者们就开始呼吁经济学数理化的重要性，希望在本科阶

段重新开设数学基础课，拾起经济学所必需的理科素养。”施岳群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老师持不同意见，但凡事需要沟通嘛，国外经济学者能做到的，中国经济学者也肯定能做到。”

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春风，新一代大学生重新入学，一切有了很大转机。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中外密切地往来交流，中国经济学课程体系开始“打开门来搞建设”，培养计划也迎来转型浪潮。

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志记载，当时经济学系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及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对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基本上不变的教学计划适时作了重大改革。

“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又要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既要加强基础经济学理论，又要掌握应用经济学知识；既要发挥定性分析的优势，又要学会定量分析的方法；既要改革教材与课堂教学，又要进行校外实习与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则精神。”四组“既要、又要”打开了经济学转型之门。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本科生重新要开始学微积分，之后又要学概率论等课程，”施岳群开了个玩笑，“微积分可真难啊，教授们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经常坐在最后一排来旁听，抓头挠耳听不懂那是常有之事。”

按照施岳群的话来讲，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学生，不仅要对政治经济学烂熟于心，也要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了如指掌。“什么是边际效应？什么是乘数效应？税收效果如何准确地衡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国民经济体系中



2021年，参观上海花博园

极为关键，想要对中国经济本身了解认识得更清楚，就得用好数学这个工具。”施岳群语重心长地说。

转型之后，经济学释放发展引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当时打响了全国高校的第一炮。“高考文理兼招，必修数理课程，国际化课程教学培养，与当代实际问题相结合的

专题课等等”都是出现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毕业生中，现已有近二十位海外顶尖大学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取得了教职，且不少是终身教授的职称。”施岳群说，“这说明我们当时所坚定的引‘数’入‘文’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施岳群说，“我始终记得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他在回忆录里也写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需求的变化，生产知识人的知识结构需要不断调整、更新，才具有应对新挑战的后劲。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样的未来趋势有增无减”。

而经济学院一路创新脚步定然新世纪之初愈发有力。世纪之交时，经济学院继续坚定“比较分析、实事求是、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培养深刻思考意识。2006年，经济学院独创了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次年数理经济方向就成为了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并在之后获得了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学科交叉的新尝试，进一步融合了数学活力和经济学魅力。

探索实践，是施岳群一生所恪守的四字箴言。从1960年到新世纪，施岳群始终与中国经济同行，他一代的经济学者身上凝结着中国发展的缩影。回望在校经历，施岳群说，“我很荣幸，我当时能够和学院里的一批中国最具远见同仁学者们一起，致力于‘引数入文’的新转型。”转型之后，经济学院的“发展引擎”已经燃起，施岳群期待，未来的学科建设能永葆创新活力，助力时代大步前进。■



尹伯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等。1961年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长期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证券投资、保险以及房地产金融也有一定研究，著作丰富，曾多次获省部级教学和研究成果的奖励。

尹伯成： 做一生“求学”与“耕耘”的复旦人

文 | 张淑凡

尹伯成曾经“三进复旦”，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他与复旦的交集多了些传奇色彩。

1956年，21岁的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

学系，这是他“初进复旦”。五年后本科毕业，分配到苏州丝绸工业学院任教。一年后学院调整下马，他调到苏州市五中。1963年春，高校恢

无论在当初经济学系还是后来的经济学院，尹伯成始终坚持“求学”和“耕耘”。

复研究生制度，尹伯成一考不中，次年再考，终于进了复旦，师从吴斐丹教授读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这是他“二进复旦”；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尹伯成重回苏州市五中工作。1978年春，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尹伯成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他“通风报信”，时任系主任的张薰华教授也鼎力支持，已经虚龄43的尹伯成因此“三进复旦”，再次回到经济系学习，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1980年，尹伯成研究生提前毕业，正式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作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这一消息还登上了当时的



《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尹伯成说。

1985年，尹伯成任副教授，同年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成立博士点，开始招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1991年，为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经济学院对教学和科研机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尹伯成担任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93年起，他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为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同年5月，任经济系系主任。

无论在当初经济学系还是后来的经济学院，尹伯成始终坚持“求学”和“耕耘”。在复旦经济学院读书与工作期间，复旦的老教授们为人处世、治学教学的谦逊和认真深深影响了他。他记得，经济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蒋学模教授指导他修改文章时叮嘱他，写文章要深入浅出，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写，自己弄懂的东西也要用别人能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记得蒋老师的话。”尹伯成在之后编写教材以及给学生上课时，都要求先自己理解，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我达不到这些老先生们的高度。”尹伯成诚恳地说，“我学问没有他们高，做人也够不上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但我始终想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有一次，杨福家校长要他代表博士生老师讲几句话。讲了后杨校长说，“刚才尹老师说做人做事



1984年4月，尹伯成教授在日本关西大学演讲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句话很对”。

尹伯成将精力倾注在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上，出版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教材，其中《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两本书，被国内许多高校财经管理类专业师生所欢迎，广为流传，每年发行数万册，从而为我国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做出了一定贡献。

他也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早在1985年，尹伯成与人一起公开著文提出应率先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见《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上《我国现阶段建立证券交易所问题初探》），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港报也及时加以报道。后来，他又在肯定股市作用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投机，多次发文揭示过度投机的

危害，主张监管和规范市场。

“我记得当时经常在尹老师的家里讨论学术问题，尹老师谈起学术问题时严肃认真。但在学术问题之余，又非常开朗健谈，跟学生打成一片。”尹伯成的学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康宁回忆道。学生眼里的尹教授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我做事情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与尹伯成老师交谈，能够感受到先生身上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有自己的态度和坚持。”

1994年，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成立，尹伯成担任该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虽非他主业，也是心血不减，撰写了大量研究房地产经济的文章，指出我国楼市目前供给计划性和需求市场性的严重不对称，提出需建立长效机制、减少反反复复的临时调控。“我一直是坚决反对炒房的！”谈及国家社会的发展，尹伯

成不自觉又带上了那股年轻人的冲劲儿。

2001年，尹伯成正式退休，但学院返聘他继续工作，直到2008年最后一批博士生毕业为止。

退休后，尹伯成继续在教学岗位上发挥余热多年，在其他岗位也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他继续担任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多次参加研究会的年会，并到一些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做学术报告，并继续从事科研活动，包括完成一些课题，编写出版教材，发表一些论文等。2005年他步入70高龄后，修改出版的教材和著作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六、七、八、九、十版，《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第六、七、八、九、十版，《西方经济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版，《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

教程》（科学出版社）第一、二版等。此外，他还担任《辞海》第五、六版的外国经济学说史部分的分科主编。

尹伯成说自己要“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他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偶尔还给报纸杂志写点东西，同时还继续修改教材，从事些研究。他在自述中提道，“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多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2021年建党百年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年龄、容貌、身体在不断变化，但爱国、爱党、爱人民之心永远不变。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和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吴申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史学会理事。现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顾问。所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学术专著。

吴申元： 与大师同行，共铸学科“黄金时代”

文 | 朱怡

群英荟萃，学科教师在编人数达历史峰值；大师云集，朱伯康、陈绍闻、伍丹戈等学术巨擘齐聚一堂；名家辈出，前辈后学薪火相传声名远扬；著述累硕，学科发展蒸蒸日上屡创辉煌。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的“黄金时代”。彼时，在以史立本的经济学院，这一有着深厚历

史积淀的传统重点学科焕发出别样生机，取得了长足发展。

吴申元是“黄金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他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史稿》梳理了自先秦至近代的中国人口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整理了不同历史阶段具有



尹伯成教授在孜孜不倦写作

吴申元是“黄金时代”的见证者，
更是参与者——他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
正诞生于这一时期。



2015年，摄于美国亚特兰大

代表性的60多位政治家、思想家的人口观点并予以科学评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学术专著。《史稿》以清晰翔实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人口思想史的第一页应当从中国写起。

1986年，《史稿》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包括《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家报刊杂志刊发了该书的报道和书评，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87年，《史稿》获美国王安研究院1986—1987年度汉学研究奖。王安研究院强调，这一成果“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有重大



2011年，摄于新加坡环球影城

贡献”。王安研究院院长克兰奇夫妇亲临复旦大学颁奖，吴申元成为国内获此奖的第一人。

写就《史稿》前前后后花费了吴申元四年左右的时间，许多史实细节是他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首先发掘、整理出的。那期间吴申元经常去复旦图书馆借线装书，“一大堆借出来的时候上面都是灰尘，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人碰过了”。那时复印又少又贵，吴申元便将翻阅古籍时发现的相关内容都一一抄写在卡片上。正是这些数不胜数的卡片，捕捉了漫长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前人智慧的闪光瞬间。

谈及研究人口思想史的初衷，吴申元认为这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纯粹是从‘经济要发展，人口急需要控制’的思路出发”。吴申元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跟随导师陈绍闻攻读硕士学位，自硕士一年级起便在陈绍闻先生带领下参与编写经济史学类教材《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和《中国近代经济文选》，并逐渐成长为编务主力军之一。

1979年，硕士二年级的吴申元走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同时开始探索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从“冷门”的经济思想史角度着手研究“热门”的人口问题。对于吴申元的研究思路，导师陈绍闻非常支持并看好他能“冷锅

研室就叫中国经济史教研室，这个观点后来为学术界大部分人所接受”。陈绍闻先生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扩大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极具学科战略眼光。“中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所以不仅要研究汉族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要去研究其他各民族的，至少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一点到现在还没完全做到，全国还没完全做到。”吴申元回忆，陈绍闻先生为此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从事少数民族调查的老师，因此80年代复旦便已有教研人员专门进行少数民族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80年代初同当时身处青年教师梯队的叶世昌先生的共事经历也令吴申元受益良多。1980年，陈绍闻与上海财经学院的胡寄窗、北京大学的赵靖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形成了经济思想史学界三足鼎立的局面。经济思想史学界名家争鸣不断，学术氛围自由热烈。叶世昌先生曾组织学生们共同署名撰写批驳某学术观点的文章，吴申元也有幸参与其中。“叶老师做学问很严谨的，遣词造句非常考究，一字一句都要再三斟酌。”每个星期的碰头会，叶世昌先生会将逐字逐句修订过的学生们的成文进行交流。“叶老师对史料的引用慎之又慎，一定要考证精确，不完全确定的之处一定还要扫其他版本，多方印证无误才会加以使用。”吴申元坦言，在践行学术规范方面倍受叶世昌先生启发。

宽松的学术环境、自由的学术空气、包容的学术氛围、开放的学术平台——吴申元感恩这恰逢其时的相遇，在人才辈出、成果不断的学科“黄金时代”与大师同行，“为学术文化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留下一点小小的痕迹”。

蹦出热栗子”。除了导师陈绍闻，吴申元也十分感念蒋学模教授的提携和鼓励。作为《复旦学报》主编，蒋学模教授拍板同意当时还是研究生在读的吴申元先后发表了《先秦时代人口思想初探》《两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思想初探》《宋元明人口思想初探》三篇论文。三篇论文历史跨度如此之大，却均仅万字有余。受到肯定的吴申元决定以这三篇“还很粗糙”的论文为骨架，以更加详尽的史实细节为血肉编写专著。

陈绍闻先生是吴申元的学术引路人，也是复旦大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他不仅亲自操刀了教学科研组织机构的调整，还不遗余力地广揽英才组建起一支梯度完整、专业突出、实力强劲的教学科研团队。吴申元亲历了1981年经济学系教学机构的调整。彼时陈绍闻先生提出摒弃此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分家的做法，而“应该统称为中国经济史学，即包括史论与史实两部分，教



陈伟恕，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历任教师、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金融系教授、系主任。1992年起参与筹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并担任董事、副行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咨询专家、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上海沪港经济协会常任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参与领导和管理逾10多个重大金融、经济和企业发展上的经营项目和研究项目；出版《现代银行管理学》等著作和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陈伟恕： 求学求真，日进日新

文 | 李大武

1980年8月，时年34岁的陈伟恕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此前在新疆16年“屯垦戍边”的艰苦磨

砺中，他早已于基层练就一身好本领，磨砺出昂扬不屈的人格精神。

1979年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创建。这

给予陈伟恕极强的吸引力，成为他报考研究生的首选目标。同时，他也分别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发来的研究人员聘书。最终，他选择重返家乡上海，在结束了16年的边陲生活和基层银行实践后，他进入复旦校园，向理论与教学进军。

难忘求学岁月

1983年7月，陈伟恕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后续留校任教10年。“复旦改变我的人生，（我）对母校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愫。”陈伟恕说。

入校后，陈伟恕攻读西方货币银行专业方向。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此专业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曾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观烈教授。

导师给陈伟恕的第一印象不是他“想象中的严肃高冷”，而是和蔼可亲。当陈伟恕初次到导师家中拜访时，陈观烈教授笑咪咪地对风尘仆仆的陈伟恕打趣道：“你怎么连胡子也没刮呀？”得知陈伟恕离开远在新疆的妻儿、独自来沪求学时，他还特地关心问候，想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这份初印象的温煦和善，使陈伟恕深受触动。

临近毕业时，陈观烈教授因身体原因住院，却依然牵挂着他的毕业论文。陈伟恕始终记得这幅画面：“病床上的陈观烈老师面色潮红，汗珠不停从额头滴下，目光却聚焦在手中捧着的学生论文手稿上。只见他用铅笔对我文稿作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有十几条之多，包括遣词造句都一一斟酌，甚至细到咬文嚼字，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德高自为师，身正崇为范。”这是陈伟恕对恩师的由衷感叹。

在校园内，令陈伟恕难以忘怀的，还有共同求学、奋斗的同侪之情。复旦研究生宿舍四号楼是陈伟恕居住的宿舍。恢复高考招生后，复旦最早招收的两批、近百位文科研究生就集中在此居住。这批人中，走出了各大学、研究所里的著名教授、学术大家。如今，可以排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单：葛剑雄、周振鹤、李良荣、陈伟恕、程天权、丁学良、秦绍德……

陈伟恕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



80年代，陈伟恕在复旦讲演教学

“当年，这批穷学生把自己嘲作‘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他们从天南海北的穷乡僻壤来到了著名学府中读研，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抓住青春的尾巴，抓紧一切时间，在课堂、图书馆、资料室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当时复旦的食堂少，到了饭点，往往要排长队。他们嫌排队费时间，常常等到食堂将要关门时冲进去，拿上饭食匆匆离开。有时，陈伟恕早上买几只馒头，中午在图书馆里倒一杯白开水，对付过去。等到傍晚回到宿舍，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

然而，尽管腹中饥饿，晚上大家总要热情地讨论一天学习所得。更有甚者，舍友间就一个话题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深夜里，争论声不时响起，其他宿舍有人大吼“别吵了！明天再争论，先睡觉”，引来大家一片哄笑。楼里安静了一阵，新的争论声又猛地响起。这是独属于青年学子的青春之声。

陈伟恕感慨地说：“当年读研究生时，我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青春的最后几年，我们基本上就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度过的。用‘抓紧一切时间’来概括当年读书的情景绝不是夸张之词。”研究生3年时间里，陈伟恕读过多少书已记不清，但对手抄的资料印象很深。单是为了写硕士论文，他就抄了5万字左右的资料和读

书笔记。毕业后，陈伟恕留校成为教授西方金融理论的青年教师。十年教学生涯里，他时刻牢记前辈教授的殷切期望，对教学事业从不懈怠，深受学生喜爱。

擦亮创新底色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已席卷全国。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陈伟恕回忆：“当时，留校仅1年的我与1977级经济系刚毕业2年的朱民、1979级世界经济系刚毕业1年的王战，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我们想谋划和筹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教研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如今看来，这项建议不可不谓切中时弊。然而，受时代、历史发展所限，学校层面不免产生疑问：三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能成吗？学校相关部门对此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气氛热烈，但最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终无果。

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洪文达教授也参与了这场座谈会，对结果很不满。他拍案而起，坚定地说：“这是中国的大潮，我愿意给青年人站台，我来当主任，你们当副主任。”然而，这项提议最终仍未通过。缺公章、办公用地，还



复旦教师聚餐，陈观烈、洪文达教授同陈伟恕、庄起善在一桌

有各项手续都亟待完成。于是，洪文达教授决定直接向时任校党委林克书记汇报。

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的家中，洪文达教授和陈伟恕、王战在座，朱民向林克书记作了关于筹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汇报。汇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探讨中，烟头已经堆积成小山。最后，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表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青年们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大事，应该予以大力支持。”

六周后，他们得到了“关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批复”。198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个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为主题的高校经济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陈伟恕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负责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并迅速成长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世界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知名青年学者。

1987年，陈伟恕被破格提拔为世界经济系副主任。1990年8月，复旦大学决定发展金融学科，他不负众望，主持创办国际金融系并担任系主任。作为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伟恕一面从事教学，一面投身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1984年春，陈伟恕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24条建议，不久后收到加盖公章的回复：“您的建议书已在中央领导同志间传阅，谢谢您的意见”。年中，陈伟恕又接到来自北京的会议通知，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等几家媒体发起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议题的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

陈伟恕负责主持第一组综合组的讨论。会议中，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主张放开价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学者田源主张以“调”为主，“调”派与“放”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陈伟恕在小

“惟其真粹，惟其独特。”
这是陈伟恕的本色。

十余年前一位画家朋友为陈伟恕创作的即兴写生画像，题字为“万卷万里逐素愿”



组讨论基础之上，总结提出了自己对我国物价政策的观点：调放结合，以放为主。这一观点成为会议上报领导的内参主题，是中国物价政策“双轨制”最早的理论依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陈伟恕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专家教授，还提出了许多可供高层参考的新观点。

于1984年9月初召开的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

“莫干山会议”，已成为民间自发讨论国家大事的开局会议。

会后，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了解到相关情况，多次找陈伟恕等学者商议上海就业、物价、经济产业等事关上海发展全局的经济问题。陈伟恕回忆：“汪老在那次会后陆续召集我们去谈，除了我，还有孙恒之、陈申申、陈琦伟、朱小华、王战、王新奎等，都成为汪老经常召见的一批青年学者。就这样，我们通过复旦大学的智库型研究中心，通过一系列会议影响，与市委、市政府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又逐步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范围。”时至今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与专家教授“议政对话”的良好风气沿袭至今。以陈伟恕为代表的这批青年学者，在上海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惟其真粹，惟其独特。”这是陈伟恕的本色。对这位横跨学界、商界的大家而言，他既是求真务实的耕耘者、奋斗者，又是锐意创新的开拓者、先驱者。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惟“真”人、“新”人熠熠生辉。■



徐培华，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文汇》杂志（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主编、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海派文化》报主编。1974年师从叶世昌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后转至现代工商管理思想、市场营销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并发展出古今融汇、独具哲思的讲学风格，深受学生和社会各界企业家的敬佩。

徐培华： 五十年不改学术初心，以哲思学贯中西古今

文 | 万嘉茵

徐培华老师自小对中国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情有独钟，从同济附中高中毕业后则是进入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工作。1974年经由单位推荐，徐培华通过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班的面试，进入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师从叶世昌老师学习。

作为教研室始末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和推动者，他认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

的设置兼具“重要性”和“独特性”两大特点。

“重要性”是指历史本身就包含了过去许多改革名士未经提炼的自然经济思想及理论，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横向上学贯中西，纵向上发挥历史镜鉴的功用。而其不同于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独特性”则在于“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层面。关于中国经济思

想史第一部系统性的学术著作出自上海财经大学胡寄窗教授，但是阅读这本内容丰富的“大部头”需要自身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所以不适宜投入教学使用。

为此，教研室编写了适合高校教学的“文选”和“简史”，即陈绍闻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中国近代经济文选》和叶世昌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全国高校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才方面，直至90年代教改前，教研室坚持在招生考试和研究生教学中加入古文阅读训练。另外，陈绍闻老师也积极地从历史学院、外文学院招揽人才，壮大研究队伍。在教研室学习的多年时间里，陈绍闻和叶世昌老师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所付出的努力，徐培华自是耳濡目染。时至今日，他犹忆那时跟随叶师前往复旦大学老图书馆，字字摘录典籍中有关古代经济思想史料的往事。

1977年徐培华正式留校任教，先后为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企业经营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物资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市场营销学、高级经济学讲座等课程。徐培华注重教书育人，其每年的课程都增添新的内容，不断更新教学大纲及课件内容和细

节，并且，徐老师讲课风格生动活泼，善于用故事激发学生的听讲兴趣。同时，多年来他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先后涉足松江、青浦、江苏江阴、常熟、浙江温州、萧山等地，了解地方政府和企业 in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企业管理情况，以及与各地企业家就经营理念等方面深入交流。

这期间，徐培华担任了多项行政工作，包括三届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身处忙碌无暇的行政工作中，徐培华愈发思念纯粹的学术研究生活，1993年他成功申请获得美国福特基金支持，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1996年又至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结识了张光直、杜维明、史华慈、傅高义、柯文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

回国后，徐培华老师继续投入教学工作和学商联动的各项社会活动中。自1998年起，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MBA、EMBA的企业家和干部学习班讲授市场营销学、品牌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理念与战略管理等课程，并先后为几十家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和许多的省市政府部门作过培训咨询策划，进而成为了如今沟通学商两界的重要人物。



他认为从企业发展的四种层次来看，企业管理越是发展，与文化、哲学越是靠近，文化与哲学的作用就越大。就拿品牌来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是管理的竞争，其实质是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管理，是企业和产品的文化与哲学含量的竞争。在关于企业管理思想的讲授中，徐老师善于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并经其重新阐发后，这些遥远的“中国智慧”在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中再次焕发生机。例如，他多次强调“义利观”在如今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中的重要地位；又以“道”为核心，他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把握好“三道”：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经营之道，引得听者连连夸赞。

2006年，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成立，徐老师作为中心主任，利用自身丰厚的人脉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读书沙龙和面

向大众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活动，例如从2006年10月开始每隔两年举行的“复旦华商高峰论坛”；2018年由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公关协会、澳洲大洋传媒集团联合在墨尔本举办的“中澳自贸论坛”等颇具影响力的活动。由此践行中心宗旨，即——借助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运用经济学和华商经营管理理论，服务于中国国际化运作的需要，汇聚世界华商的成功经验与智力资本，打造华商经济运用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成功。

为人师表教不倦，德高学厚益求精，徐培华在学界耕耘近五十载，始终不忘对中国历史文化珍稀的深沉热爱。无论是从事史学研究、讲授管理类课程还是参加社会教学活动，徐老师的言传总是能够透出智性和哲思的光辉，让听者醍醐灌顶，收获匪浅。■

为人师表教不倦，德高学厚益求精，
徐培华在学界耕耘近五十载，
始终不忘对中国历史文化珍稀的深沉热爱。



舒元，现任中创集团董事长，中大创投董事长。1989年7月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获美国春田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1993年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1994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和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舒元： 百舸争流，追求卓越，探索经济学的新发展

文 | 万晓强

在庆祝复旦大学经济学科辉煌百年之际，舒元很高兴地接受了本刊的采访。他很欣慰，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和工作的21年间，亲身

参与、见证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的成长，并为复旦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和贡献。他衷心祝愿，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再创新的辉煌！

到复旦，认真求学

1970年，复旦大学经济系在“文革”中恢复录取大学生。1973年，中国大学在“文革”期间进行过一次高校招生考试，那时舒元已从上海去黑龙江省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上山下乡四年多了。几年插队落户的劳动生活，舒元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还因辛勤付出和出色表现获评德都县劳动模范。凭借优秀知青的推荐资格和上海位育中学高中生的学习功底，舒元在名额少、院校少、专业少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高考。虽然他爱好数理化，却入学了经济学专业。

1973年，24岁的舒元来到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当时的读书学习环境和现在的大学生很不一样，要求我们经常‘开门办学’，去工厂、农村和部队实践、调研甚至讲课，在大学上课学习的时间很有限。”舒元非常珍惜大学的学习时间，他回忆道，他在大学期间只上过一次英语课，主要靠自学。舒元说：“我

自学了好几套英语教材，经常从食堂打饭回宿舍，边吃饭、边用收音机听广播英语课程和其他英语节目，Radio Beijing和一些国际电台是我常听的。”

他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经常向张薰华教授请教和讨论在学习《资本论》原著时不理解的一些问题。舒元也非常关心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他曾和几位同学去江西、安徽等地调研农村所有制变迁的一些特例及其影响。为此，舒元受邀在相辉堂大礼堂与经济学科及学校其他学科师生交流分享农村调研报告，得到学生和教授们的好评。

在复旦，打造精品课程

1976年，舒元毕业留校，在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当助教。他自习研读西方经济学，在系资料室找到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版教材，有疑难之处就找宋承先教授请教。舒元说，“因为啃原版书，并能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让宋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了”。1977年，高考恢复，高校重新开始招生。在“文革”十年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宋承先教授安排舒元在1977级经济学同学三年级时为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复旦经济系培养了朱民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人才，1977级同学毕业后有十多位在经济系留校任教。

1980年，舒元通过了教育部出国选拔考试，于1981年公派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高校较早去国外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海外留学对舒元并非易事，在LSE经济学属于理科，研究生课程的板书基本都是数学推导，“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冲击、中外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巨大差异、自身经



舒元在研读国外经济学论著

离开了大学的象牙塔，
从教育科研转型实体经济和资本投资，
“在庐山外面看庐山”，
舒元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又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济学基础薄弱等，适应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我深刻意识到国内经济学科教育迫切需要加强建设。”

回国后，舒元借鉴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在复旦大学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课程。面对众多院系学生的学习需求，“我曾多

次在三教最大的教室，同时给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五个班级的学生一起授课。有很多在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商界做出较大成就的校友，在偶然见面时讲到受益于当年听过我的课程，我感到很欣慰。”舒元笑着说道。

舒元和其他教师一起，对经济学本科的

初级和中级课程重新进行设置，并为研究生开发中级和高级课程，引进和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对研究生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舒元还开设了《增长经济学》课程，采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锚定国际一流，打造中国经济学殿堂

20世纪80年中期，中国大地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之下，“培养国际化经济学人才，是很重要的工作。”

1984年，邹至庄教授建议由国家教委举办全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生出国统考，选拔优秀学生，由他和国外著名教授推荐去北美一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即“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为迎接全国高校选拔佼佼者的Chow Test，谢希德校长请舒元为复旦大学5位非经济学背景的申请者辅导西方经济学。考试结果这5位理科师生在第一届全国选拔考试中全部进入前十名，名列第一、二、四、六、九名。谢校长非常高兴，对舒元的工作表示感谢和祝



1973年10月，舒元（第二排右起第六位）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7315班合照



1996年4月19日 舒元（左三）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和夫人、岭南学院董事会主席黄炳礼博士合影



1997年8月24日 舒元（后右二）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佳洱院士、邹至庄教授、刘遵义教授等管理科学部专家在北京友谊宾馆合影



1998年2月3日 舒元（左）拜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原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



2010年10月20日，岭南学院接受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QUIS专家组论证



2016年5月21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7315班毕业40周年返校合影

贺。复旦数学系毕业留校、管科系青年教师周林（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以满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有很多海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出国学习经济学的。”

1986年起，舒元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协助陈观烈院长组织经济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和谢希德校长、陈观烈院长一起接待福特基金会总代表彼得·盖特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其他国外代表团和专家学者。

1987年8月，世界银行资助的中国大学发展项目II之中国大学经济和金融学科课程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针对国内改革开放对人才的长期需求，会议代表和专家向国家教委提出了中国大学经济和金融学科核心课程设置的报告。舒元全程参与了这一重要国际会议的筹备、专家接待、会议翻译、会务安排各项工作，并参加了经济学专家小组的研讨。

1985年，在邹至庄教授和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提议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1987年）举办了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每年由全国重点高校选拔约各50位研究生参加两校的培训班（以下简



2014年8月25日，MIT Sloan管理学院为舒元教授颁发感谢状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称“福特班”）。1988年舒元兼任复旦大学经济学培训中心主任，他邀请和接待国外经济学教授，组织学生的课程和活动，向中美双方委员会报告项目进展。复旦大学的“福特班”，先后培养了二百多名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舒元自豪地表示，正是通过国际化的经济学研究生专业训练，复旦和人大“福特班”很多校友现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及金融界和实业界的翘楚。

1993年，舒元担任复旦经济学系主任，为经济学科的教学改革、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打造一流的课程体系。1993年，经济学系举办了硕士研究生课程班，既为经济学教师的教学科研提供密切联系上海市社会发展实际的渠道，又为上海市政府、经济、金融、旅游和管理部门的青年干部提供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1994年3月，舒元应邀担任中山大学岭南

学院院长，离开了学习工作21年的复旦经济系。在中山大学，舒元秉持“德育发展，融合通识，国际视野”的理念，在经济学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等方面继续探索实践，做出了显著的成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岭南学院本科各专业每年理科和文科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始终在广东高校中名列前茅。舒元指导的2位经济学博士生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主导的“教学国际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4年，舒元在中山大学退休后继续创新创业、开拓进取，创办了中大创投、中创集团、广东医谷、广东材料谷和中大创新谷等企业，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离开了大学的象牙塔，从教育科研转型实体经济和资本投资，“在庐山外面看庐山”，他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又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黄亚钧，1982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5年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1992年回国，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先后兼任教育部全国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入选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主编《知识经济论》《微观经济学》等多部教学参考书，是研究世界经济、证券投资学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前沿学者。

黄亚钧： 学于复旦，教于复旦， 见证复旦经济学院的两个十年

文 | 黄璨

从求学到任教，黄亚钧见证了复旦经济学院的两个十年——1978年到1985年，黄亚钧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得世界经济系经济

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留学；1992年，黄亚钧学成归来，选择回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于1993—1996年任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1996—2000年任院长。

回国那年，中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建时期，上海证券交易所刚成立不久，证券交易市场一片繁荣。在这时期，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在国内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缺少对投资银行及其业务进行系统和全面论述的著作。在和其他学者讨论时，黄亚钧想道：“证券投资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国内怎么搞、如何搞，需要一些理论支持。”于是，黄亚钧结合中国国情对债券与债券投资、股票与股权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业务等内容进行梳理，于1995年出版了《现代投资银行的业务和经营》一书。该书是国内较早对现代投资银行及其业务进行系统和全面论述的著作，被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收录进教学参考书，也被不少投资者誉为“投资圣经”。

1995年，管理学院计划开设《微观经济学》课程，但苦于缺少合适的教材，便找到了黄亚钧。当时恰逢教育部开展“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迫切需要教材进行创新调整。在编写时，黄亚钧除了详细、系统地阐述微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外，还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如信息、福利、产权等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有感于经典的微观经济学教程中理论的陈旧，黄亚钧力图在书中加入前人没有提及的东西。在《微观经济学》的前言中，他写道：“近几十年来，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有了长足的进展，本书力图把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博弈论、不确定性分析、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等介绍给广大师生。”

《微观经济学》出版后，黄亚钧又主编了《资产重组与并购》《知识经济论》等多套经济学丛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被

共同评为“21世纪课程教材和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也是众多高校指定的经济类专业考研参考书目。教材出版后，很多读者反馈内容太深奥，于是黄亚钧便不断地再版。“就是不断地改，有些东西发现不对了，或者有人说看不懂，我把它改过来。”截止成稿前，该书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

1996年，黄亚钧继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彼时，经济系、国际金融系、世界经济系和保险系各系之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相对独立和分散，专业间交流和联系较少，不利于学科合力发展。继任后，黄亚钧着手整合各系资源，加强学院力量，将招生名额分配和教学方案等归于学院管理，逐渐使得四个专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另外，教学体系的改革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培养方案新增数学课程和外语课程，大力聘请海归教师，专业课朝国际名校接轨。在一系列努力下，1998年，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2000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黄亚钧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

谈及治学理念，
黄亚钧认为“学经济不是学投资，不是学炒股票，
不能抱着赚钱目的来学。”

在校期间，黄亚钧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资产组合投资、证券投资学、现代国际投资学、西方经济学研究、贸易与金融专题等课程。即使是在任院长期间，黄亚钧依旧坚持为一二年级的本科生授课。黄亚钧认为，复旦经济学院是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治学目标是培养出有素养有情怀的经济学家，其中本科教育是重中之重，需从本科低年级起锻炼学术能力。在上课时，黄亚钧常常会收到学生

的一些犀利提问，这种求知态度更加激励了黄亚钧要为本科生上好课的想法。“年轻人思想活跃，想法点子多，多和他们交流也能很好地开阔眼界。”

谈及治学理念，黄亚钧认为“学经济不是学投资，不是学炒股票，不能抱着赚钱目的来学。”“自由而无用”是复旦的“民间校训”，也是经院人的心之所向。“只有思想自由，且不功利主义，才能沉下心来理解经济学的奥义。”



上海立达学院立达设计奖颁奖大会



袁志刚： 时代无言，下自成书

文 | 万晓强

袁志刚，1958年生于上海，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宏观经济学》国家精品课程获得者，“西方经济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宏观经济学》主编(国家教材委立项并纳入教育部马工程重点建设教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自科重点项目等众多省部级、国家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领军人物工作室首席专家、同时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专家、福建省政府顾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策委专家等职。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5-2015)，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2003-2016)等职。

“经邦济世”的使命感深深刻在袁志刚心头。
“究学术、讲育人、重现实、拓创新”，
他赓续经济学院经济学科发展之火，薪火相传，引光聚亮。

钟情研学，聚焦中国经济问题

1977年是中国高考恢复元年，当年有570万考生踏入考场。那时，袁志刚已经在农村、工厂锻炼工作了近三年，他怀揣着热切的大学梦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次年春天，他成功拿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一名令人骄傲的“1977级”大学生。大学毕业，在一地级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两年后，袁志刚还是希望重归研学之路，放弃了“铁饭碗”，于1984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开始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

袁志刚师从宋承先教授，主研西方经济学。那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已经是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家重镇。在学习上，袁志刚自然是从不马虎，反反复复研读《资本论》



1977年，袁志刚在工厂和农村锻炼后期盼高考到来，摄于杭大入学前



1987年，袁志刚（右二）硕士毕业，与宋承先教授（左二）及同学合影。左起分别为程向前、宋承先、史晋川、袁志刚、张卫东

原著，用《资本论》的方法体悟各类社会现象。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规范经济学研究尚一片空白，为了接触国外各种经典理论和前沿思想，袁志刚穿梭于复旦的各类资料室，翻阅大量英文原版著作。茫茫海海中，袁志刚对非均衡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斯卡尔·贝纳西教授写的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情有独钟，深感于这一理论对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中国有深刻意义，袁志刚将此书翻译成了中文，后又致函向贝纳西教授请教。1988年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教授带队的代表团访问法国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接待他们的贝纳西教授和后来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教授向他们打听袁志刚的情况。代表团回来后向袁志刚转达了法国两位著名教授对他的关心。此

后，袁志刚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培养博士名额，得以赴法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学成回国后，袁志刚教授多次赴法国访学和讲授中国宏观经济，两位老师也多次应邀来复旦大学参加各类论坛和教学工作，成就了一段三十多年的中法经济学交流佳话。

早在经济学院读研期间，袁志刚就参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讲授，法国博士毕业回到复旦后，继续开展教学工作，从未中断。1994年，袁志刚升为副教授，三年后破格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后续也开设了管理经济学、中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失业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等课程。为了更好地将知识沉淀、育书教人，袁志刚主编出版了《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多本教材供教学参考。

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万物俱新，万千发展机会如雨后春笋蓬勃生发的同时，种种问题也迎面而来。对于那时的袁志刚而言，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无比真实的身临其境感。理论问题就是现实问题，他逐步把目光聚焦在失业问题理论和对策研究上，并始终在教学和研究上强调理论对现实的应用。一位选修袁志刚《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曾评论道：“袁老师始终能让我感受到审视和思考中国经济现实的魅力”。

乐于治学，相传经邦济世之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993年2月，袁志刚在法国巴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留念

1999年，袁志刚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一职。他希望，中国的新生代经济学人能抓住社会科学千载难逢的“实验机会”，提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母题，钻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潜在矛盾。

培养人才一直是袁志刚心底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2000年，袁志刚承担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科研项目。他十分鼓励教学梯队以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培养学生，使所指导的学生受到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并利用自己与法国学术研究机构长期保持交流等有利条件，每年输送研究生出国研学和交流。

除了在研究生培养上花心血，袁志刚也在重点课程工程建设上铆足全劲。他把对中国宏观问题研究的感悟运用到教学工作之中，把国外规范研究理论和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现实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2004年，其执教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因“重点突出、层次完整、中西结合、现实引领”的特点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宏观经济学系列课程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同一年，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质量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所推出的《中国大学排名》列为全国第一名。两年之后，袁志刚因其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获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多年来，袁志刚在宏观经济及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累累硕果，其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教材入选国家精品课程教材，受到广泛好评，发行累计超过50万册，并被列为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22年，他带领团队主编撰写的《中国宏观经济学》教材入选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纳入教



2000年袁志刚(中)与自己所带硕士毕业合影

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

在教学工作上，袁志刚教导学生经邦济世的理念，“经邦济世是经济学人所肩负的至高无上的使命”。他在筑牢人才培养基地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他一方面跟踪学习国外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反映到教学中；另一方面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提出理论命题和理论创新，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深化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培养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类经济学人才。其教学方法也辐射到全院，对于学院育人氛围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经过近三十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研工作，袁志刚教授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很多学生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其中有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厦门大学方颖教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葛苏勤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丁维莉教授、浙江大学何樟勇教授及复旦大学封进教授、范剑勇教授等众多目前活跃在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也

有众多学生投身于国家部委及企事业单位并担任重要职务，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他们作为复旦学子的贡献。

理论为先，引领实践创新应用

十年前，袁志刚借庄子之语“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寄语2012届经济学院毕业生。一直以来，他都始终坚持经邦济世的理念，在学术研究的现实应用和咨询决策上有所建树。

自上世纪90年代，袁志刚就将研究目光长期聚焦在就业理论和养老保险理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体制改革、房地产、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问题等领域，他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具有深刻洞见。他最先将非均衡经济理论引进国内，其专著《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因为用非均衡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转轨，对中国双轨经济的运行机理有着深刻描述，于1996年获得孙治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并被收入孙治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



2003年，汇丰论坛袁志刚教授与贝纳西教授合影

他还领导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就业问题研究机构——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使中心成为欧盟与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网络的主要成员，他同时被国家劳动保障部聘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99年袁志刚担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后，他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储蓄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效率。2000年后，面对许多新发生的现实问题，袁志刚教授研究重心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及其对国民福利的影响问题，并取得丰富成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他在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全球经济非均衡与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资源错配、结构扭曲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近三十年的理论研究，袁志刚30余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国家级奖。

在做好理论研究的同时，袁志刚还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工作，依托复旦大学经济学科为科学决策贡献一份力。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已经将近20年，并担

任福建省政府顾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决咨委特聘专家多年。在政府咨询工作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在决策咨询工作中，袁志刚也获得了大量来自实践的信息和想法，理论联系实际，也大大深化了他的研究工作。多年来，袁志刚参加了无数次政府工作咨询会议，主导并完成了多个政府咨询项目。与此同时，也完成多个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与宏观经济相关的省部级、国家级研究项目。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为表彰袁志刚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潜心多年的研究，袁志刚入选“影响新中国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而其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于2011年入选首批国家哲社成果文库。2011年以来，袁志刚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思考与研究随时代向前，从未停止，他在2022年10月又出版了新著《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挑战与机遇》。

学科建设，踔厉推进学院发展

2005年，袁志刚接过接力棒，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一职。当时，中国的经济正伴随着和国际社会紧密接轨，不断高速发展的现状，经济学院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代。

“加强学科建设，整合研究力量，着力打造复旦经济学科升级版”，袁志刚和学院众人一起尝试了许多学科发展体系新模式，包括“创建学术导向数理经济专业”“拓展国际教育项目”“开设专业学位项目”、开创师资博士后培养模式及海归轨和本土轨人才并行的双轨制队伍建设模式，为复旦经济学科从国内外网罗

了大量精英人才，这让学院在学科、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学科的综合实力及国内外的学术影响也有明显提高，学院大步迈上国际化台阶。

回首求学至今的四十年，袁志刚感慨自己是幸运的。他在“文革”中度过了葱茏岁月，中学毕业又辗转工厂农村锻炼，接触过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的落后和艰辛，从磨练中获得人生的通识教育，他说，“正是因为此，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我对于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的动力。”

从二十到六十五，一个人的四十五年的经济学研究探索恰好与中国经济的成长同行，这是多么的难得。在这四十多年里，“经邦济世”的使命感深深刻在袁志刚心头。“究学术、讲育人、重现实、拓创新”，他赓续经济学院经济学科发展之火，薪火相传，引光聚亮。

在未来，袁志刚脚步不会停止，火把依然高持，上下求索，溯流而上，他期待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之路上有更多同行者。



2013年10月，袁志刚和导师世行前副行长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



2014年11月12日，袁志刚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到复旦演讲

第



阶

段

与时俱进，笃行不怠： 创新发展时期（2016年-2022年）

当2015年向我们走来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迎来了恢复建院30周年，回望过去30年，在时代的浪潮中，经济学院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推动自身的调整与转型。30周年之际，学院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1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行政班子换届大会在大金报告厅举行，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周亚明教授宣读了许宁生校长2015年1月26日签发的新一届行政班子任命通知：任命张军教授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任命陈诗一教授、张金清教授、田素华教授、刘军梅副教授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015年1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行政班子换届大会



2015年10月10日，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金秋丹桂飘香之际，一首校友的诗歌《燕子归来》向前辈先贤和大师致敬，开启了10月11日经济学院传承、创新与发展大会。院庆期间，“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诞生，论坛以“发复旦声音、做一流学术”为目标定位，发展至今已然成为经济学界和金融领域重要的年度思想盛会。

建院30周年之后，经济学院继续在时代的浪潮中前进。2016年1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评“2015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经济建设领域第六位；3月，经济学院首次举行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仪式。近年来，经济学院不断推动各方面的事业发展。

2017年，复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入选上海市高峰学科。12月28日，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权威发布，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获A+档；应用经济学获A-档。此次参加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评估的高校共有90所，参加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评估的高校共有155所。在所有参评高校中，获评A+档表明位列前2%，A档位列前5%，A-档位列前10%。

2020年，复旦经济学院的QS排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类）达到58名，近年来，这一名次在52与64之间波动；ESI（经济学、商学）进入全球前1%。2021年，复旦应用经济学入选教育部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序列。

如今，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并连续两轮入选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应用经济学是教育部“双一流”学科、上海市IV类高峰学科，下属二级学科金融学、产业经济



2015年10月11日，传承、创新与发展大会

学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

经济学院始终坚持原创经济理论的积极探索，传承中国经济研究的特色优势。2016-2021年，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上总共发表论文119篇。其中2020年在《经济研究》发表8篇，为全国高校经济学院第一。此外，这一期间学院共在国际A类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37篇，居国内高校前列；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60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项目11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10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1项、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34项；受社会委托各类项目120项；科研经费总额超过9600万元。

近七年来，复旦经济学院的发展有目共睹。大经济学科发展势头好、进步快。比如在国际发表方面，2021年，全球最顶级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刊发了两篇经济学院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国内赢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学院的发展离不开师资结构的调整。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努力，如今经济学院师资结构多元化的态势已经形成。目前经院全职教师129人，其中获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36%。每一代的科研人才、师资力量接续奋斗，海内外人才引进留存率始终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

经济学院担当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其学问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张军教授等多次应邀参加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关于经济形势与“十四五”规划的座谈会，学院共有31篇报告获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以中国经济研究中



《经济研究》

心、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院以及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研究平台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智库机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其中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与世界经济研究所等教育部百强基地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经济学院和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推动数字经济、数字科技的研究。平台之外，经济学院大量的研究分散在教师当中。70后、80后、90后成为主体，这意味着学院科研的主力军已经高度年轻化，学院得以打造“老中青教师、海归教师+本土教师”深度融合的教学团队。

此外，学院党委贯彻意识形态专题讨论，实施中青年骨干教师轮训计划，开展教师课程思政专项培训，加强全体教职工思想政治学习，规范师德失范、学术违规、教学事故等处理流程，把师德要求内嵌到办学治校各环节，贯穿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在人才引进过程、职称评审、人才项目申报等工作中把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摆在首要位置，弘扬以张薰华先生、蒋学模先生为代表的“大师精神”。

经济学院为年轻人的自主科研创造很好的条件。学院咖啡吧是留学生们喜欢的地方。年轻的海归教师也会在那里自发组织活动，每周



2022年1月16日，新大楼结构封顶



经济学院新大楼效果图

邀请一位海归教师报告其研究。

2022年1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新大楼主体结构封顶暨经济学科百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圆满举行。很多新加入的年轻教师期待将来有机会搬进新大楼。“这对于经院百年来说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经济学院从来没有一栋独立的，超过1万方的空间。”张军院长感叹。

回顾过去30多年，复旦经济学院的学生一直是一流的。过去几年来，复旦经济学院一直希望将培育学生成长成才的工作落到实处，为学生提供共生共存、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有效有益、便捷可达的成长通道，互惠互利、教学相长的一流师资力量——学院竭尽所能服务学生的需求，不论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经济学院都在为他们的个人成长、课堂内外做很多事情，“强化价值引领，夯实经济理论，加强方法训练，扎根中国实践，紧盯学科前沿”五位一体育人。学院直升海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越来越多，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的高水平硕博论文越来越常见。

这几年，经济学院的教材



学院的咖啡吧

建设屡获突破，比如谢识予主编的《经济博弈论》（第4版）荣获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3个团队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团队；刘庆富教授团队《金融大数据分析》教材获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规划教材立项。学院还出版了全国首套专业学位案例型主干课程系列教材；专硕项目师生在全国各专业学位教指委、上海市金融教指委举办的案例大赛和优秀论文评选中斩获83项奖项，获奖质量和成果质量稳步提升。

关于本科生，经济学院现在正在进行“拔尖计划”，作为教育部第一批“拔尖计划”，经济学院自2021年获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后，推出多项举措建设基地。今年，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经济学院财政学、保险学专业成功入选。至此，经济学院经济学（2019）、金融学（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2020）、财政学（2021）、保险学（2021）5个本科专业分三批全部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实现了5个本科专业全覆盖。

学院的学生培养因时而变。因国家给了本科生更好的通道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经济学院取消了科学硕士，并加快转型，扩大专业

硕士规模。目前经济学院专硕人数从过去不到100人的招生名额增加到了370人。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培养少而精，经济学院导师约有六七十位，每年博士招生人数50人左右，5人获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培养的质量相当高。数名博士毕业生在伦敦政经学院及国内一流经济学系担任教职。博士生陈登科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4人获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

经济学院大力推动国际化。2018年10月5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上海论坛2019海外预热会上，复旦大学首个海外教学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布达佩斯教学点正式揭幕启用。该教学点的首个合作项目“复旦-考



期刊发表



经济学院的教材



匈牙利布达佩斯教学点



复旦-考文纽斯硕士双学位项目，2022年毕业典礼

文纽斯硕士双学位项目”也正式开启。于2019年2月启动首届招生的“复旦-考文纽斯硕士双学位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央行和考文纽斯大学商学院联合三方师资力量协同备课、合作授课。该项目也是拟建设的复旦大学布达佩斯海外校区的先行项目，海外校区的建设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

经济学院致力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积极提升国际化建设。为加速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学院打造了以中国经济、金融、商务为核心

的全英文课程。学院于2007年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EMA，2019年开设了国内首个英文授课的经济学本科项目UIPE。为鼓励学生面向世界走出国门，经济学院还设立了众多交流访学项目及双学位项目。目前与海外院校的交流、访学、双学位协议达59个。2016年以来，共有641人次本科生、265人次研究生申请海外访学，其中出访时长3个月及以上的达504人次。

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罗宁根大学、悉尼大学、鲁汶大学、成均馆大学、考文纽斯大学、乌尔姆大学、昂热高等商学院等校有15个本科和硕士双学位项目。与匈牙利考文纽斯大学合作的海外校区获两国外交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

为鼓励优秀本科生提升学术能力，设立了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乌尔姆大学、布兰戴斯大学的访学项目。

为实现全英文授课项目的全面发展，2007年经济学院与英国杜伦大学联合创办了复旦-杜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项目。经济学院为丰富国际化课程的多样性，相继承办和开设复旦大学暑期国际课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各类暑期、冬季短期课程等短期非学历项目，以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全球



线上暑期学校



张军院长(右四)参加总理座谈会

化需求。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在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了《复旦大学关于组织党员自愿捐款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后，经济学院各位党员响应党中央号召，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在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迫切关心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经济学院推出由学院名师担纲主讲的“疫情与经济”系列主题课程，围绕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金融、财政、环境及公共事务等方向，解读“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3月1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讲的第一课《关于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你需要知道的几个常识》正式上线。学院还积极开辟课程思政第二课堂，出版《经济战“疫”：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2022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科迎来百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代代复旦经济学院人把“经经济民，追求卓越”作为一生践行的准则，每一届学生在经济学院“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素养、追求卓越”的要求下，努力成长为拥有正确的国家意识、良好的道德素养、深厚的社会情怀、宽广的全球视野，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创新能力显著的国际化经济学专业人才。源于1917年复旦商科，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百余年来，为祖国培养了数万名优秀学子，他们正以卓越之姿遍布全球各地。



张军： 学术永远是年轻人的事

文 | 朱怡

张军，1963年生，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上海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以及复旦大学校长奖。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美国比较经济学会最佳论文奖 Bergson Prize 获得者。

“学术是这样一种事业，一旦你喜欢上它，你就难以自拔，以至于愿意付出一生的时光来追求它。”自1981年高分考人经济系至今，张军在复旦已度过了四十余年时光。启蒙、转型、奋进、走上国际舞台、超越自我，张军的学术进阶之路与其学生、学者、教师、院长的身份转变相互交叠。张军的“复旦时间”是复旦经济学科四十年来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其参与推动复旦经济学科进步实践的忠诚纪实。

学生：追随大师鸿儒，见证学科进步

听讲座是张军学术生涯的起点。他时常怀念在复旦的求学岁月，那段人生中仅有的、幸运的、与大师为伍的短暂时光，“所带来的荣耀与财富非金钱所能计量”。读书时的张军是个“追星族”，他会溜进每一场名家列席的活动，渴望着目睹著名学者的风采。谈家桢、谢希德、王福山、杨福家、周谷城、郭绍虞、谭其骧、胡曲园……说起那时见过的名家们，张军如数家珍：“成为复旦人是一生当中最值得珍视的选择。我有幸在不同场合听过他们当中多数人的讲话，这对我后来的做人和做学问都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也正是那时，张军认识到常怀学术好奇之心与学科前沿联结对话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印象很深的一次讲座中，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提到：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国门封闭，当国门再次打开后，他发现国际物理学杂志上发的文章自己基本看不懂了。年轻的张军听闻十分惊讶，不仅仅由于当时国内物理学研究和国际物理学前沿脱节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物理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工作。“类似的话苏步青校长在那个年代也讲过，他说自己



张军学生时期

已经不能跟上学科研究的发展步伐，今后不想再参加数学系博士论文的答辩。”

保持与学科前沿的积极联结与畅通对话，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正是复旦经济学院的传统特色，多元学派林立、长期共生共存的学术共同体是这一特色的突出表现。出生于1921年的宋承先教授是张军读研期间的导师，其所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被称为“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身”的经典之作。除了宋承先，张军的学术成长之路也得到了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等一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师长的帮助与提携。“他们不会因为学生最后选择了西方经济学的专业方向有任何偏见，而他们对学生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传承，更多的是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独到的学术见解以及独立的思维能力”。

保持与学科前沿的积极联结与畅通对话，也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研究环境。1980年代的校园虽然已经很开放，思想解放的氛围很浓重，但课堂内容与课程设置依然略显陈旧单薄，介绍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活动颇具吸引

启蒙、转型、奋进、走上国际舞台、超越自我， 张军的学术进阶之路 与其学生、学者、教师、院长的身份转变相互交叠。

力。1985年前后，谢希德校长积极促成了许多同美国大学的交流活动，很多英美经济学者前来访问并开展讲座。为了练习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张军喜欢在讲座上主动向讲者发问。彼时，谢希德校长向世界银行争取到的中国大学发展项目，子项目涉及经济学科的课程表改革，谢希德校长邀请很多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来复旦出席研讨会，后来该项目形成的重要成果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大学财经学科的课程体系革新，“今天回想起来这个项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学者：扎根中国大地，助力学科发展

真正使张军下定决心走上学术道路，关注中国问题始于对1988年全国抢购潮这一经济



张军学生时期

现象的观察。“那时我虽然刚刚研究生毕业，但突然觉得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现象相当有趣，念了那么久的经济学，总觉得应该做一些实际问题的研究，所以，我大概从那时起下定决心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研究方向切换的过程事实上是我思维认知转换并逐渐深化的过程。”

1992年在复旦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军先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深秋，张军转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与哈勒根(William Hallagan)博士合作，两人共同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经济发生了兴趣，从此奠定了张军一生的研究方向：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到底是什么？各种看似互不相干的元素之间，有着如何千丝万缕的联系？

利用身居热土的比较优势，近距离观测中国经济。回到复旦继续科研教学工作的张军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政府治理与经济成长的理论和经验的实证研究之上，取得了一大批贡献显著的研究成果。2003年，张军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任，他带领科研团队致力于开展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国内外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



张军与学生们在一起

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科人才。

张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的评论与观点，以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扎实研究为基础，频繁见诸国内外重要媒体，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享有较高声誉与影响力。2009年，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张军教授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张军教授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共同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张军都会被邀请出席世界很多地方的论坛和会议，“以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身份被邀请，我觉得这是复旦的光荣，也是经院的光荣，更是我个人的荣幸。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巨大转变背景所创造的巨大机会。”

除了科学研究，教书育人是张军留在复旦35年中巨大成就感的又一来源，“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用金钱度量的回报能够对冲这样一种获得感。”如今，张军培养的百余位学生遍布各

地，截至目前已有十余名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时至今日，无论多么繁杂的事务缠身，张军也尽量保持着每周一次的固定频率同学生讨论，他将这作为“一种紧跟学术前沿的重要方式”。活力四射、精力充沛、嗅觉敏锐的学生们的所见所学所想，存在客观代际隔阂的师长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与熟悉，“所以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从学生那里学到的反而更多，我觉得学术永远是年轻人的事，我希望保持着学术的好奇心，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跟上学生们的节奏。”

院长：服务多方需求，推动学科升级

2015年张军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是一份注定不会轻松的工作。彼时，刚刚走出健康危机的张军接受职务前十分矛盾，但“因为在世界各地跑了那么多年，一旦有机会可以从事管理工作，我也想把国际上一些学术机构里好的做法借鉴到我们学院来”。最终他



张军在哥本哈根与丹麦玛格丽特女王在一起交谈



张军在索菲亚与保加利亚前总理交流



张军与夫人在莫斯科合影

接受了这个职务，承担起自己的“复旦时间”中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推动学院创新发展，着力打造复旦经济学科升级版。就任伊始，张军提出将“上天入地”作为学科建设目标。“上天入地”是指，学术研究既要创一流，接轨并跻身国际前沿；又要接地气，厚植并服务中国大地。七年来，张军率领经济学院的行政、教学团队持续不断地优化制度、改革政策、增大投入，兢兢业业地朝这一目标推进具体工作。

“学术永远是年轻人的事”，意味着包括人才培养、梯队储备、学科建设在内的一切工作的开展都要以“服务需求”为核心。人才培养方面，注重服务学生需求，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我们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入经院，我们要不断地改革自己来更好地服务学生的需求。”学院通过革新课程设计、设立成长通道、丰富培养模式等多种方式拓宽基础训练的口径和范围，为学生提供进阶训练的机会和更多选择的空间。近年来，经济学院学生在一些重要学科竞赛中表现出色，直升海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越来越多，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的高水平硕博论文越来越常见。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张军院长领衔的经济学院教师团队对人才培养倾注的无限热忱和无数心血。

梯队储备方面，着重服务教师需求。经济学院通过对原有的激励制度、招聘政策、人事体系的大规模改革，七年来海内外人才引进工作的成效提升显著，“我们现在人才引进成功率非常高了。这些年我们在海外一级市场招聘的十余位Ph.D.招进来至今考核未达标的很少，说明我们在人才引进的工作比较扎实，看得相对还比较准。”源源不断的年轻力量的



2021年，张军在北京出席亚洲银行家年会

加盟，使得学院更加朝气蓬勃，学科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最近几年，学院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五大中文经济学权威期刊和在英文Top5期刊的发文总量在全国高校中始终名列前茅，诸多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包括美国比较经济学会（ACES）颁发的最佳论文奖“伯格森奖（Bergson Prize）”、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以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

学科建设方面，重视服务国家需求。第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位列第一梯队，“这是追求学科升级这一长远目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张军认为，立足中国实际，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思路——这是经济学院在

致力于保持优势学科的领先地位和推动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当担负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过去这些年来，复旦经济学科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服务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在短期宏观经济管理、中长期经济转型与发展政策、金融改革与创新以及涉及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和劳动力市场、城市化等公共政策领域，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院以及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研究平台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智囊机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这些年来，复旦经济学院的教师向地方和中央政府积极建言献策，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上海市历届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批示。张军本人也曾多次应邀出席国家领导人（副国级以



咖啡厅、喷泉

力,如近年来修建的咖啡厅、喷泉、花园,更新的教学设备,包括新大楼建设在内的很多大额捐赠等等;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尽心尽力,除了冠名赞助设立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多项奖学金外,目前有近四百位业界校友担任校外导师参与研究生的培养。

如何吸引更多的校友来参与学院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张军认为,校友的鼎力支持与慷慨回馈不能是单向的,校友个性化的需求需要得到学院的重视与满足。“所以我们成立了校友服务中心,我要求我们的校友服务中心对所有校友的要求、需求、请求从来不能说no。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很难想象如今一个学院的发展与走出去的各界校友没有很好的联系。校友真的是很难取代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

“做了很多,但还是不够。”谈起执掌学院后推进的各项工作与取得的成效,张军如是评价。他为团队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正在逐步产生显著的回报而感到欣慰,也为不确定风险上升的激烈竞争环境而心忧,“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和人才的培养,我们始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必须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好的制度”。

“学术是一种美,需要不断地挖掘和雕刻。”学术之路是然,学科建设之路亦然。复旦经济学科已走过百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位列中国经济学科的第一梯队。坚守经世济民之初心,行稳脚踏实地之道路。推动复旦经济学科走向更高成就,进入更加发达和先进的阶段的重任已经落在了更年轻一代的复旦经济人肩上。在迈向下一个百年的启航点放眼未来,发展依旧非常可期。■



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现担任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经济类通识教学虚拟教研室”负责人,教育部财政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产业结构与政策、公共经济与政策、当代中国经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研究论文,出版专著译著多部。多次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大项目、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获国家高层次人才教学名师奖、国家精品课程奖、国家本科一流课程奖、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奖、教育部课程思政精品示范课程奖、上海市社科成果奖、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论文奖、宝钢教育奖、上海市教学名师奖、上海市精品课程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石磊： 以高标准建设学科，以宽思政作育英才

文 | 李大武

课堂上,一位儒雅教授正借助现实案例,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一步步引导学生应用经济理论知识思考现实问题。平静的教室里,他

语调舒缓、娓娓道来地讲授。下课铃响了,但同学们恍若不觉,依然沉浸在引人入胜的课程之中。这是《当代中国经济》《经济与社会》《用经

上)的各类座谈会,并多次应邀担任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嘉宾。2015年7月张军受邀出席了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

张军就任以来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高度关注服务校友需求,格外注意校友关系的维护,“校友是经济学院和学科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深耕的社会资源”。2015年,在张军的主持与发起下,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成立并在全球设立了纽约、伦敦、北京、杭州等近四十个联络处,以联络处的节点汇聚起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校友力量,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社会关系网络。校友对学院发展的支持,一方面体现在直接的出资捐款,为硬件设施条件的改善出

经过不断探索，
石磊总结出一套实现“课程思政”的方法论，
即“四个打通”。

济学智慧解读中国》等课堂上常有的景象。

授课教师石磊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自1993年起在经济学院任教。近30年的时光里，他曾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既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又始终是学生眼中如暖阳般和煦、如春风般可亲的领路人。

探需求变，经世济民

22年前，中国大踏步迈向世界经济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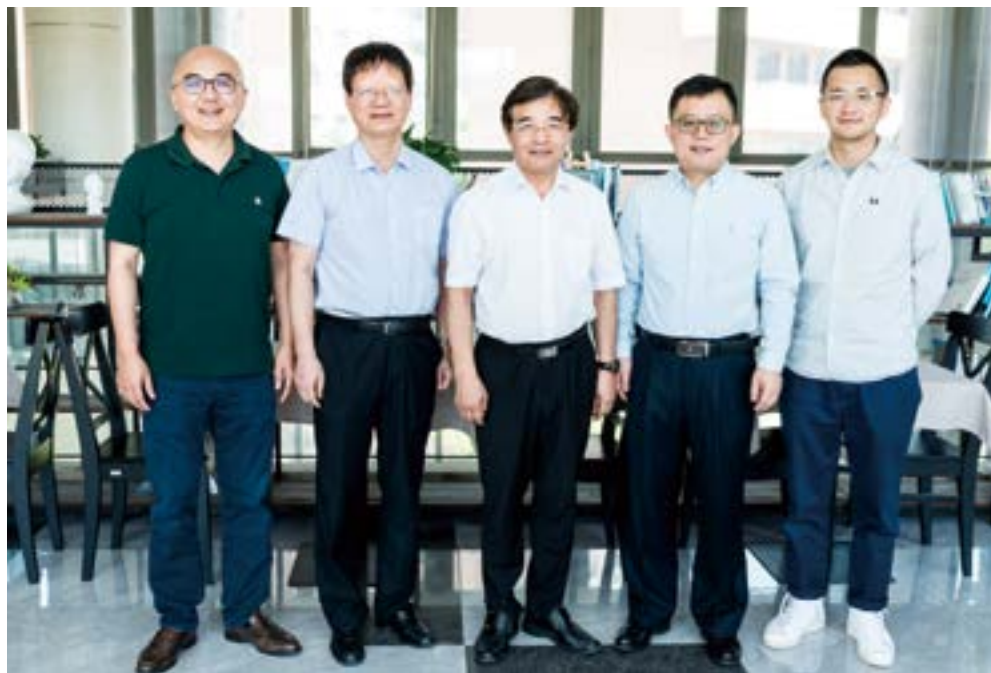


国家一流课程示范教学现场

蓬勃壮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瞩目的一环。在时代的春风中，1964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于2000年改组重建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续光荣历史与传统，向阳而生。

2000年起至2003年，石磊担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2000年10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在最初的规划中，石磊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发展定下要求：队伍组建走精品路线，核心人员三年内应不少于12至17人，滚动发展，以项目研究为载体，引进海内外、校内外学者加盟；每年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不少于两项，积极申报国家和地方重大课题，参与复旦大学所承接的国家研究任务与上海市等省市级决策咨询项目。随着这几项工作一届接着一届不断推进（2004年由张军教授接任中心主任），在此后海内外各领域同仁加盟、教育部、学校和学院的鼎力支持之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学科建设成果日益凸显。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屹立于东南海滨，源源不断地贡献着科研成果。

不过，重点基地组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教育部精品示范课程教学团队

中心创立之初，石磊始终牵挂着科研人才的吸纳与培养工作。高水平人才是开展科研、教学工作的核心，没有高水平人才，就无法承接重大项目，培养高水平人才。基地的前身，经济研究所，固然也有一些成果和影响力的积累，主持或参与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较多，但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平台很小，对吸纳更大规模的人才、承接国家和地方重点课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改建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中心在教育部和学校的指导、协调、经济学院的支持参与之下，邀请了一批高水平人才进入中心。多年来，研究中心打造了两条相辅相成的人才队伍。一条是中心内部纳入建制内的科研人员，另一条则是各学科方向研究所需的海内外中青年人才。通

过教育部平台或是院内学者长期建立的交往与联系，石磊等研究中心带头人邀请有兴趣、有能力的同行学者，进入中心合作完成研究。他笑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真正成为一个开放型的机构，国外学者和海归学者到这里来助力研究，也提高了我们的国际认知度和对外开放水平。”

20余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体制转型与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参与了经济类公共政策咨询和重大发展战略的论证工作。针对上海市各发展时期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心的诸多成果以内部咨询报告的形式得到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被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决策流程中。

不少同行学者评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开创性的”。从1964年就已经成立的研究所，过渡到教育部文科重点科研基地，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强化了复旦大学学科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年的建设发展时期，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时期。目前，按照大学科分类，经济学院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经济类一级学科，二者的影响力、学术贡献与人才培养情况都处于国内高校的最前沿。借助学科、人才、平台优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持续发挥高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性作用，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社会各界公认的重要贡献。

石磊认为，中心拥有学科、人才优势，更应该以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强化学科建设，通过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发挥学科服务社会、支持国家建设的作用。在这样一条学科发展之路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以排头兵的角色勇毅前行。



石磊做百年党史学习报告

研磨教学，作育英才

2021年6月10日，教育部在江西省井冈山大学召开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会上，石磊领衔的《当代中国经济》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是复旦获得该荣誉的三门课程之一。课程教学团队也同步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在讲话中特别指出，石磊教授的《当代中国经济》课程，是针对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学理上把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道理讲深讲透，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

综观所有各高校经济学教学建立“系统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与全方位思政育人元素相结合的教学体系”，石磊《当代中国经济》课程在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做了较早较系统的探索，其成效也得到教育部和各高校同行的认可。

这门课由石磊于1997年开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发展而来。他十分感慨：“虽然是课堂上短暂的几十分钟的教学，连续几节课也大不了两三个小时，但其中涉及很多重大的问题都不是简单能讲明白的。”

如石磊所言，《当代中国经济》课程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知识领域多，显然不能静态、孤立地讨论任何一个时期的理论和政策。石磊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近30%左右的内容更新。“我们（教学团队）循序渐进，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尤其是跟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对外开放引发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在授课时，石磊尤其注意学理与事实相结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比如在讲授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时，他有针对性地引入国内经典案



石磊进行线上教学

例，拉近专业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距离，也促进了同学们客观、冷静地观察社会、思考社会，自觉用经济学理论知识解释实践现象。他说，经济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本来并不大，但如果理论不能贴近和准确可靠地解释实践指导实践，这个距离就一定会很大。他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特约评论员，有时难免发生直播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只好借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分享直播访谈。没想到这个本来不得已的尝试却获得意外的效果——课堂的内容立刻鲜活了，同学们在新奇地分享访谈信息之余，真切地感受到把经济学知识体系与现实生活打通是何等重要，用经济

学智慧分析经济问题和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经济学之外无法企及的。

融通思政，凝神聚魂

在教学的过程中，石磊与学生们互动与交流，了解学生们的想法。他认识到，在社会思潮如此多元的当下，大学生有可能在形成独立完整的价值判断前，就被一些不知所谓、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带偏。他力图在课程中承担大学生价值引领的重任，润物无声地融入思政育人元素，使大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切身感受“四个自信”缘何而来。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并非易事。有的

课程单纯将部分语录不分语境地“嵌入”课程之中，十分生硬，把教学和思政变成了“两张皮”；有的课程则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在教学中浮光掠影地掺入些许“鸡汤”，令学生们厌倦不已。

面对“课程思政”的通病，石磊指出，“课程思政”不仅是要传播政治理论，还要扩大到人格养成、价值引领、理性思考，使学生能做到自我纠偏、独立判断、科学思维，他将之称谓“宽的思政”。因此，他在课堂教学中更注重案例分析，通过有意识地融入思政精髓，与学科专业知识体系融会贯通，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引导学生。

在讲到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时，石磊就发掘出了《吕氏春秋·慎势篇》中的一则譬喻故事：“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分未定矣。”这则譬喻的大意是成百人追捕一只兔子，并非是因为兔子可以分给一百个人，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分”）没能确定。“分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面对天下物皆无主事皆无分，哪怕是尧这样的善治之王也照样无能为力；物有主权有界，众人虽卑俗贪利，但也不会引发争执。

这则几千年前的寓言早已不无智慧地道明权责“定分”在社会治理，“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它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则有异曲同工之效。

石磊借教学内容引入这则治世恒言，主要是针对“学术界一谈到产权和交易费用，言必称科斯，引述他1937年那篇经典文章《企业的

性质》及后来的“社会成本理论”。科斯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确是经典，但石磊教授想提醒的是，“这些经典文献要说明的问题，慎子在《吕氏春秋》里已经明白无误非常通白地讲清楚了，只是被一些只了解西方文献的学者先人为主的学术话语遮蔽了而已。尊重西方学者的理论贡献是对的，不要动辄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因此无视东方智者早已有类似的经典智慧，以致无意识地妄自菲薄。妄自尊大不可取，妄自菲薄也不可取。”

传播文化自信不是要形式主义地喊口号，而是要在教学中挖掘、整理我国历史与实践中共可供当下借鉴的璀璨精华，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比较分析与探讨。“我从头到尾没有形式主义式地张扬其中有多鲜美的鸡汤，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只需把道理有理有据地说清楚了，同学们自己会领悟；理解了，悟透了，育人和文化自信的元素也就在其中了。”石磊回忆上课的场景，笑着说道。

就多次获重要奖项的几门本科专业课和通识核心课，他总结出一套实现“课程思政”的方法论，即“四个打通”：理论与实践打通、中西方打通、历史与现实打通、学术知识与思政元素打通。“四个打通”不仅要求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把历史与现实打通、把学理和做人相结合，而且也促使学生在阅读古今中外学术文献和社会实践研究中扩充知识体系，进一步提升独立思考能力。

石磊始终对未来的复旦学子寄予厚望：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始终关注国家与社会发展，承继复旦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建设中所形成的非凡贡献与光荣传统。■



姜波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1985年获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英国SUSSEX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分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博士后校友会首任执行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出版有《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理论、方法、技术、指标》等著作，其编写出版的《国际金融新编》两次获国家教委推荐教材荣誉，《国际金融学》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荣誉，《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第四卷）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荣誉。2001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5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享受政府突出贡献特殊津贴。

姜波克： 西学东渐立国金，固本培元桃李兴

文 | 李大武

姜波克是学术、教学两头同步把握的学者，
没有偏颇失衡。

入门有缘，发奋向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幸运骄子，尚在复旦就读本科的姜波克，偶然间翻阅到一本很薄的册子《国际金融基础知识》(本书由时任复旦大学世经系教授马之骧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彪如等编写，是国内第一本论述国际金融的基础读物)。正是这样一本小书，让他瞥见了一个新兴学科的光亮，也在无形中为其叩开了一扇学术之窗。

复旦大学于1982年开始招收世界经济专业国际金融方向硕士研究生，正因有之前这次与国际金融专业的“邂逅”，姜波克正式踏上了这个领域的学习之旅。人生的关键点，往往是不经意间的巧合。



1982年，本科毕业时，姜波克与同寝室室友在复旦大学校门的合影

彼时，国际金融这一学科仍是小众专业，学科建设方兴未艾。作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当时仅有的四位教授之一，马之骧教授成为了姜波克的引路人，师生之间也结成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同道之谊，堪称美谈。

研究生期间，姜波克终日向学，勤勉不倦，与日月交辉，与图书相伴。当时，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外文的。在资料查询远不如现在便捷的时代，姜波克为了掌握学科全方位的知识体系，唯有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有半年时间，他天天花费两小时，骑车往返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分类整理了国际金融学科有价值的内容与书籍，用日常省下的钱复印了过万页的资料，然后一点一点“啃”下来。回忆这份艰辛时，姜波克总是带着些许笑意，而这背后“玄奘西行”般的精神，则让笔者动容。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蕴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民族底蕴，以及“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才有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学术界各个专业领域的百花齐放，吐纳芬芳。

教研相融，学院奠基

因当时学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授们分身乏术，自研究生三年级起，姜波克就承担了国际金融专业部分本科生课程的教学任务，很



1991年，姜波克(右)与导师马之骧教授合影于英国Brighton海边

早就加入了“教师队伍”，研究生毕业后，他顺利留校任教。

姜波克是学术、教学两头同步把握的学者，没有偏颇失衡。他的学术思考，从教学端“学生的好奇”起始，从“科研端”学科底层逻辑串联。对他而言“如何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与“学科知识从源头到闭环”是一件事情。教学相长，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他也因此收获“全国模范教师”的荣誉。在他看来，本科课程虽然相对浅显，但极为要紧，要求学生的学术概念清晰，逻辑推导过程完整，这也无形中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每次备课的时间都要远远超出上课的几个小时”，姜波克笑着回忆道，“这是对教学的负责，我自己同样也能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思考、有所收获。”

2002年，复旦大学在经济学院成立了金融研究院，整合各院系、专业的金融研究力量，研

究范围涵盖了国际金融、数学金融、货币银行、保险等领域。姜波克任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负责主持研究院的各项研究事务、扩充学院的研究力量。这是经济学院在学校领导下，扩大金融学科师资队伍、提升人才培养力度的重要举措。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在经济学院重要的金融人才培养机构。在姜波克教授牵头下，在刘红忠、熊继洲、陈学彬等众多教授共同努力下，复旦大学金融学科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荣获国家重点学科称号。

学成归国，顺时而为

1988年，姜波克前往英国SUSSEX大学深造，于1992年7月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年底，姜波克留学回国。这一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式设立国际金融系，并设立了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点。

这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随着我国推进贸易自由化、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当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一大热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对我们国家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等于说是全世界的大门都向你敞开了。”姜波克回忆道。

那时学界、业界对于加入世贸展开激烈探讨与争论，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头版看到大篇幅的相关论述。这股时代浪潮给了姜波克强烈的冲击——“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如此之快，是我不曾预料到的。”与此同时，他又深深感到，潮水般涌现的学术文章、评论，大多“低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问题和对外开放的复杂性。”

在英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他又在意大利从事了9个月的博士后研究。1992年11月回国后，进入母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伍柏麟教授指导下从事人民币自由兑换理论的专项研究，成为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第一位博士后。作为青年学者，在学术志向上，姜波克毫不怯懦，他一心要把国际金融学在中国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要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让人民币走向世界，但这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对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放松外汇管理可以促进国内外价格体系的接轨，有利于规范国内金融市场。迅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愿景固然美好，但向目标迈进的路途仍然充满艰辛。姜



1997年，姜波克（左）与成思危去加拿大宣传中国桥计划时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合影

波克敏锐地意识到，彼时我国还缺乏制定出一套人民币自由兑换切实可行的方法、步骤与结构体系。他是国内最早提出要通过建立中国的货币市场来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做出铺垫、营造条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必须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进程，分阶段推进，切不可操之过急。”

历经一年多的调研与思考，他于1994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人民币自由兑换论》。十万字的报告，内容翔实，毫不拖沓，直抵核心，洞察透彻，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指明一条可供依循的道路。“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要使人民币汇率能稳定运行，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调控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货币市场。”为此，他大力倡议国

家，需优先建设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他以拳拳之心，凭学人之诚，在这条专业领域里，力出一孔，文思不绝，笔耕不断，连续发表重量级文章，分别被中国有影响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采用。其中，“我国货币市场的建设构想”一文被《人民日报内部参阅》采用，并引起了中央相关领导的重视。

1994年4月26日，对姜波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论》研究成果鉴定评议会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出席了会议，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黄达教授主持。评议结果显示，该报告是一篇“很有分量和说服力的研究报告”，达到了“国内同类课题研究的前沿水平，也具有较大的实际和政策意义。”这项研究获得了首届蒋学模经济学奖。

姜波克认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变量是汇率。他对汇率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复汇率问题研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论》出版后5年，他又完成了百万字的《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四卷本专著，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汇率理论及相关政策。

进入21世纪后，他花大量时间走访北京、泉州、东莞、宁波、深圳、天津、寿光、栖霞等地，在持续的实地考察、调研与思考中，完成了《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汇率条件：理论、方法、技术、指标》。这项研究成为经济学院第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历经四年调研思考、批阅增删，这份心血之作终于由北京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自己特有的、系统的人民币均



姜波克（左）陪同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世界经济系王熙教授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会见美国教授



1994年，姜波克（右）与博士后合作导师伍柏麟教授合影



1996年，姜波克（右）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考察团考察日本货币市场时的留影



1999年，编著教材《国际金融学》教育部评审会现场，姜波克（中）与博士生付浩、杨长江合影

衡汇率理论体系，并在全国本科生国际金融学教学中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学科独立，理路分明

为了明确学科基本概念、阐明相关问题，在教育部支持下，1999年，姜波克教授编著的国际金融专业教材《国际金融学》由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列为全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的主干课教材。2000年的大年初一，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召开全国100多所大学校长春节座谈会，姜波克受邀参会，为全国100多位高校领导、教授做了半小时的教材解读汇报，随后，教育部又先后分批次组织了全国300多位高校骨干教师来复旦大学进行使用这本教材的培训，这部教材也随之推向全国。

在国际金融领域，这部教材明确了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研究对象，创建了独立的学科体系。姜波克认为，构建新的具有明确主线、严密逻辑的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需要对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发展脉络等基础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与厘清。这部教材的学术成果，为国际金融这个学科在中国大地有效发展建立了合理性。

姜波克在《国际金融学》一书中强调，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学科。既保持经济体内部的稳定发展，又使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处于合理状态，是开放条件下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二者被姜波克分别称为“内部均衡”与“外部平衡”。内外均衡问题，是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主线，这也为后来的学

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学科建设至此“江水九折，汇流大海”。

在其发表的论文《论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中，姜波克进而指出：“国际金融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是由于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问题逐步复杂、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金融学尚处于萌芽时期，各国基本施行金本位制，经济学的发展仍处于低级阶段。在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并列于国际贸易学的国际金融学开始产生。在这段时期，各国经济日益开放，国际间货币金融联系持续增强，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次人为限定了内外均衡的实现条件。以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作为标志，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深刻、突出，国际金融学这门新兴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姜波克看来，对国际金融学学科的研究首先要深入了解开放经济的运行方式，结合特定的调控意图与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内外均衡目标。接下来要把握内外均衡的不同关系，为同时实现此两者创造条件。最后，为了实现内外均衡，就要完成合理的国内政策搭配与国际间政策协调。循着这一步骤，国际金融学以学科的中心问题——“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而逐步展开，构建了一个理路清晰、内容完整的新兴学科体系。

固本培元，桃李天下

除了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姜波克1992年

起便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从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起又开始合作指导博士后科研人员。截至2022年，他指导的各类研究生、进修教师和博士后科研人员共计超过200位。其中，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宝钢集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国际集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大型企业都有过合作指导博士后的经历。在谈到指导心得时，他说：“研究生经历不同，背景不同，指导的关键在于严格要求、因人施教、理论联系实际。”他的一大批研究生现都已成为各自单位、领域的骨干，其中有各大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4名，国家级基金重点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企业与机关骨干数十名，大学教授、博导、校院系领导几十名，他们广布在全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及中国驻海外和联合国机构之中。

除了直接指导的学生之外，这些年听过他课程的学生数以千计，而读过他编写的教材、著作、文章的学生，则更是不计其数。曾经在全国不同场合中，常有未曾谋面的学生跑来打招呼，“姜老师，我求学时候就读的您的书，今天终于相见了！”

退休后的姜波克，伴后代成长，享天伦之乐。“素其位而行，该担当的要担当，该放下的要放下”，姜波克以此教育子女，也以此自勉。

回顾往昔，虽然荣誉满载，著作等身，姜波克最引以为豪的身份还是人民教师。他严谨治学，谦逊待人，是学生眼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师者，是学生喜爱的姜老师。■



张晖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带头人，1984年起任教于复旦大学，1995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获经济学专业教授职称，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文科科研处处长，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独立学院）院长等，兼任上海市政府发展战略咨询顾问、宝武集团企业顾问，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著有《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解析》《国有资本存量结构调整研究》等，为本科和研究生开设“政治经济学研究”“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国有资产管理”等课程，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共120多人。

张晖明： 时代巨变，坚守初心，打造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文 | 段旭昶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下乡五年的张晖明抓住机会，考入复旦，就读于政治经济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并留校工作，在复旦的四十多年中，张晖明深耕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域，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传承学科传统、致力理论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巩固增强复旦政治经济学学科在全国领先的学术地位努力工作。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世纪中叶，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已是群星荟萃，漆琪生、蒋学模、张薰华，紧接着蒋家俊、伍柏麟、洪远朋……在自由、包容的校园氛围下，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并系统配置了现代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和中外经济思想史等，融合基础理论的优良学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博采众长、启发思考，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张晖明回忆，五年下乡让他对“资源配置”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经济问题有着朴素懵懂的感知，一个最直观的想法是在相同自然环境下，为什么不同生产队（农村经济最基层的核算组织）的亩产数量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让他逐渐理解形成更为理论化的认知，广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术氛围和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促使他逐步走上学术道路。

恰逢改革开放，如何结合中国国情，解答经济发展中的理论难题？在四十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张晖明始终强调“问题导向”，在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建设中，逐步形成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创新的理解。

1984年，上海市政府成立经济体制改革

办公室，并组建体制改革研究会，由于前期参与众多改革开放调研的经历，张晖明成为首批会员并被聘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这让他接触到大量一手资料，在后续的教学科研中掌握丰富的实际经济工作信息资料，现实经济生活的问题也激发了他对研究工作的兴趣，这也成为他不断提升后续学术能力的动力源泉。

1988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提出了改革深化需要重点研究的十大问题，有关“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深化”就是其中之一。为适应高潮迭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时任院长洪远朋教授的倡导下，经济学院成立课题组，张晖明成为课题组骨干，根据研究成果，形成政策建议，撰写报告以递交政府有关部门，而后学院正式向学校提出成立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并获批，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张晖明被任命为企业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张晖明接任企业研究所所长，正值86周年校庆，企业研究所举办“九十年代企业改革和发展研讨会”，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到会并对企业和市场关系发表讲话，几位试点企业的负责人也在会上交流了对改革内容的思考，张晖明对会议成果进行汇总整理并撰写会议综述，文章随后在《经济学动态》杂志发表。

扎根于企业改革的丰富土壤，以企业研究所为平台，张晖明不断成长，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跟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表达；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探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引导正确理解所有制与产权理论关系，创新相容的实现形式，出版多部有关研

在科研过程中， 张晖明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

究的专著，先后有《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解析》（1994年）、《现代企业制度纵横谈》（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1998年）、《国有资本存量结构调整研究》（1999年）、《公司制与国有企业再生》（2000年）、《率先探索的进程与思考——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2004年）、《科技创新与跨越发展研究》（2004年）、《包容与互洽：产学研合作中政府与市场作用机制研究》（2014年）、《创新转型，可持续发展》（2014年）、《国企改革：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2019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19年）；针对改革深化，他创新经济理论，立足于企业改革和上海经济发展研究，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提



出政策操作性建议，先后多次参加时任上海主要领导江泽民、黄菊、吴邦国、俞正声、习近平召开的的专家座谈会，研究成果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肯定。

在科研过程中，张晖明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担任学科带头人以来，他一直带领学科团队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创新，注重全球化的新分工方式引致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体系乃至利益关系的变化。

2015年以来，政治经济学学科面临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用好“天时地利”学术环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时整合全院力量，改组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建制，在学院的重视支持下，张晖明致力于打造“人和”的团队合作精神，他认真调研、充分吸收兄弟高校在政治经济学科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认真规划复旦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工作内容，组建研究中心、更新教学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编撰专著丛书和教材、设立专业学术论坛、积极承接课题、编写学科年鉴。申请成立“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并联合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安徽大学，发起“长三角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联盟……在他的带领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功中标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委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等工作，被授予“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影响力得到稳步提升，巩固保持学科在全国处于前三的领先地位。

在科研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之外，张晖明基于学理体系，致力于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着力提升复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标志性的学科建设成果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丛书”（12本）。

复旦政治经济学学科有紧密跟踪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开展科研活动、总结研究成果、推进理论创新的学科传统，在改革开放10年、20年、30年重大节点，都将前十年的研究进行总结，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张晖明接过传力棒，主持编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丛书”，这是国内高校唯一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丛书获得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其中的六本版权被英国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劳特里奇出版社（4本）和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2本）购得，翻译为英文，向国际社会讲述传播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今年8月，年满66周岁的张晖明教授办理了人事退休手续，但依然承担着本科《政治经济学》和博士《高级政治经济学》的授课任务，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思想碰撞，并指导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以饱满的学术热情和充分的学术储备，引导一批批年轻人走上政治经济学研究道路，为学科发展添砖加瓦。■



陈诗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主持人，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组织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中文期刊以及Journal of Econometrics、Energy Economics等英文期刊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论著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连续入选Elsevier2020、2021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目前担任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韩基础科学联委会中方委员、教育部高校财政学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主编以及《复旦金融评论》执行主编。

陈诗一： 重务实、行践履，练究经济之学

文 | 万晓强

“中国正大步踏入新的征程，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腾飞，我们学者要更加做好中国经济研究的学术创新，以赋能新发展。”陈诗一说道。一直以来，陈诗一始终致力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和要素配置机制研究，“能源环境经济问题是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绿色金融和碳减排是破局关键。很荣幸我能够参与到相关研究中，以己所能，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

积极求学，严谨治学

与大多数同辈学者不同，陈诗一并非一直以来都在高校学习和工作。1992年，陈诗一刚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当时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同时也是国有企业经营最为艰难的时期——“国有企业效率不高”“财务状况恶化”“企业亏损严重”三大难题横亘在国企发展道路之前。“国有企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国企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当时国内专家讨论纷纭。

“我同样也有很多困惑，但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我对于现实经济的观察和认知有些更独特的视角。”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的陈诗一，凭对经济学研究的无限热情和积极兴趣，毅然选择重归校园，进行经济学研究。

陈诗一回忆说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氛围历来就非常浓厚，当时也是如此。“我师从张军教授，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对中国经济研究产生了强烈兴趣。”硕士毕业后，陈诗一前往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攻读计量经济学博士学位。“计量经济学对我后来做中国经济研究帮助很大，它提供了现代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让我把一些对现实问题的想法很好地和经济数据结合起来，使得对一些复杂现象和问题

的研究成为可能，让研究更加深入、精确和科学。”2006年初，陈诗一博士毕业后又回到复旦经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21世纪之初，中国经济乘上高速发展的列车，经济总量也很快迈入世界前列。但是当时增长模式相对粗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初现端倪。“这是时代在激发我们去思考、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经济难题。”陈诗一如是说道。

在现实意识驱动下，陈诗一前瞻性地从能源和环境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问题。2009年，陈诗一的第一篇独立研究论文（题为：《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研究》上成功发表。该论文在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开中国碳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之先河，文章中的二氧化碳数据估算方法很快被很多经济学研究者所参考，目前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该文被引超1700篇次，下载量超过3万次，在该领域论文中名列前茅。陈诗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2015年，陈诗一在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暨第49届科学报告会上作报告

在现实意识驱动下，
陈诗一前瞻性地从能源和环境视角
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问题。

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上发表，这篇论文也是近五年来《经济研究》被引率最高的论文。而陈诗一今年在《中国工业经济》发表的有关财政政策支持“双碳”战略的论文也被《新华文摘》2022年第17期全文转载。

陈诗一的研究不仅引用率高，而且屡获经济学大奖，这与他始终聚焦中国经济实践重要问题，以及十分注重经济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紧密相关。“要善于发现和凝练重大经济特征

事实，要努力探究和构建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和丰富中国经济研究方法论和实证研究，要把学术研究融入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之中。这“四要”，陈诗一始终牢牢坚守。

记者注意到，陈诗一凭借英文专著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2013年由著名出版集团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在英、美、加同步出版)成为荣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的首位“70后”学者。该专



2019年，陈诗一与世界金融计量经济学学会（SoFIE）原会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Engle在复旦承办的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合影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



2019年，孙冶方评奖委员会主任江小涓给陈诗一颁奖

著不仅向国际学术界系统介绍了中国能源和环境约束型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政府节能减排的种种努力，而且为我国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陈诗一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荣获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把能源要素创新性地引入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模型，拓宽了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的界限，指明要素市场仍然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评奖委员会主任江小涓这样评价该研究的学术贡献。

经过长期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陈诗一在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与资源配置理论、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学术研究有着卓越且深刻贡献的他，先后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社部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目前，他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治理机制研究”，继续带领科研团队在中国经济研究上攻坚克难。

育人善道，带头聚力

陈诗一长期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并且担任复旦大学数量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其中，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讲就是十几年。他说道，“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教学团队组团探索教改，创新课程思政，合作编写教材和案例，联合指导学生科研，这些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多年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陈诗一主编的《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教材已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广



陈诗一在课堂上

受师生好评，本科教材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数量经济学会优秀计量经济学教材奖。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先后获评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基于经济学高端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荣获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绿色发展与碳中和战略对我国环境经济金融人才提出了巨大需求。针对人才培养中的不足，长期从事环境经济研究并深谙人才培养关键的陈诗一想到可以借助“复旦大平台优势”来首创破题。陈诗一和教学团队一起积极传承复旦大学环境经济人才培养优秀传统，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优势，发起成立全国高校首个绿色金融研究联盟，编著出版全国首本首套绿色金融教材，带领学生一起研发全国首个碳价指数-复旦碳价指数与全国首个企业碳管理和碳资信评价标准，举办首个全国大学生绿色金融大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学生

加入其中。

“融合学科、汇聚各界、贯穿实践、通力合作”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金融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四条培养路径。陈诗一解释道，“通过这样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我们才能培养出既能走出课堂，又能满足需求的专业复合型应用人才。”目前该研究成果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陈诗一还积极发挥学术带头人引领作用，指导学生们积极参与着政、望道、曦源等复旦大学本科生科研项目，目前已经先后指导了12人顺利结题。“很高兴能够看到，我所指导的同学能前往斯坦福大学、北大清华等高校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陈诗一笑着说到，“把优秀的学生领进经济学的神圣殿堂，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除了日常授课之外，陈诗一教授每周都会抽出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研究生开设研讨会。在研讨会中，陈诗一教授总能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进行问题导向性的思考。他指导学生从不拘泥于单一领域，而是引导学生从典型的特征事实中凝练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与研究方向。陈诗一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在国内985和双一流高校任职，在业界和政界工作的同学也大多表现优秀。2020年，陈诗一因其备受同学喜爱的育人实践，被评为复旦大学第九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陈诗一等一代人正承担着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伟大实践、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规律、为中国经济治理建言献策以及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的历史使命。陈诗一表示，未来将继续“行履坚定”，紧紧围绕一流学科建设主线培养人才，继续开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学科未来新的辉煌。■



2007年，刘红忠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上演讲

刘红忠： 汇通东西学说，创新学科建设

文 | 卢洁

一张比A3规格还要大的复旦特制信笺上，字迹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备课内容——这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红忠在教学初

期时的教案。刚刚走上教学岗位时，刘红忠每节课前都要手写下近1万字，讲完纸上的内容，正好是一堂课的时间。一学期下来，刘红忠便

刘红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市场学、投资学、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现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杜伦大学联合金融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和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荣获首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1999年），曾获得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第三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论著类三等奖）、第九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著作类三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两次）、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市曙光学者和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等奖励和荣誉。

不论是做学问，还是育学生，
刘红忠尤为推崇“穷其原委，观其汇通”八个字。



2014年，刘红忠和博士生的合影

有了20份满满当当的教案。纸张本身或许无足轻重，但复旦人在研学道路上求索精进、在学科发展上行稳致远的火热信念，为其赋予了更深刻的意涵。

现实关照，中西贯通

刘红忠于1984年在复旦修读世界经济专业本科。那时，复旦世界经济系的本科课程贴近现实，对现实问题的关照非常密切。

1986年9月26日，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挂牌代理买卖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股票。这是上海第一家经营证券柜台交易业务的场所，也是新中国首次开办股票交易。得知此消息后，寝室里包括刘红忠在内一共7名同学，专程前去观察具体情况，一路上至少转了三趟车。看到交易现场火爆的情况，他们切身地体验到自己所学专业与现实的联系。

次年的10月19日是金融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美国股灾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创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记录。

《美国经济》的授课教师从这一事件延伸，引导同学们探讨美国股灾对全球市场的连锁影响。上课下同学们的踊跃发言与激烈讨论，是当年复旦学子如饥似渴的求学生涯一个鲜活的写照。

为了能观照世界经济动态，世界经

济系尤为重视外语学习。当时有一种说法，世界经济系是复旦的“第二外语系”，除了英语泛读、精读外，还开设了英语口语、听力、外贸函电、英文打字等课程。同学间英语学习氛围也相当浓厚。刘红忠寝室里有两位上海同学经常拿出英语词典，让室友随机翻开一页考察某个单词的意思，结果每次都能成功答出。

在复旦的本科学习为刘红忠奠定了深厚的专业基础。毕业后，刘红忠继续在本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经济学培训，是复旦选派的2位同学之一。

这个项目俗称“福特班”，选拔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英文专业课程强化培训。时任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先生曾把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为在东西方两个平台自由转换。这一至今仍不过时的理念使刘红忠受益匪浅。

授书育人，久久为功

1991年，刘红忠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国际投资》《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当代中国金融前沿专题》《金融学经典文献选读与写作》等课程，涵盖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培养层次。

刘红忠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为1988级高

也正因此，几乎每次课程、讲座前刘红忠都要备好一份完整的授课内容。一个学期下来，他在《国际投资》这门课程上就写了近20万字的教案。

1992年，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正式设立。12月，第一任国际金融系系主任陈伟恕教授带着刘红忠一同开展普及证券知识的讲座，由刘红忠主讲下半场。在那场讲座前，刘红忠提前准备好了厚厚的一份完整讲稿，不过，他注意到陈伟恕教授只准备了一张纸，纸上只是简要的讲座框架。这样的对比让刘红忠印象十分深刻。

回忆起曾经在教学上颇显青涩的自己，刘红忠感慨：“第一次上课很笨，把所有的讲课内容都给写下来，但是其实还是有好处的。”《国际投资》这门课讲了三轮，内容也不断充实。后来，刘红忠将手稿整理成册，1995年，他作为主编出版的第一部教材《新编国际投资》，正是脱胎于此。而再往后，《投资学》和《金融市场学》等几本教材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反复打磨出版的。

穷其原委，观其汇通

不论是做学问，还是育学生，刘红忠尤为推崇“穷其原委，观其汇通”八个字。

2003年，刘红忠作为主编，出版了《投资学》一书。它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列为全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教材，先后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于2007年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这本教材出版至今广受好评，已经印刷了第四版。

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课程《国际投资》。因原先授课老师朱立刚教授前往美国进修，刘红忠的硕士导师马之骞教授建议由刘红忠来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由于是第一次授课，此前也没有学过这门课程，刘红忠备课极为认真。除了当时国内零星的几本教材外，他还参考结合了国外的教材内容。每周三节课，课前的教案就要写上一万余字。

当时，他心中十分忐忑，即使做好了相对周全的准备，却还是要担心自己对讲授进度把握不当。“有时课程上语速掌握不好，有的内容一带而过，没有细讲，好几次自己准备的内容讲完了，但是还没到下课时间，出现了这样很尴尬的情况。”

刘红忠总结这部教材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一条投资目标、投资策略、资产价值分析、资产组合构建、投资组合业绩评价的逻辑链条”，并以此为主线打造了理论与应用并重的教材体系。

刘红忠认为，197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1990年代往后，越来越多的新学科、与投资学相关的交叉方向相继产生，回答了一些传统投资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他在编撰时将一些非传统投资学的研究与讨论也纳入了教材之中。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在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教材中加入这些新兴的内容不易于理解。但刘红忠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将其保留下来，希望保持教材体系的完整，也希望学生们能够理解金融异常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觉得做学问或是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要问到不能再追问的程度，而且要能够融会贯通，就是‘穷其原委，观其汇通’。”刘红忠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也希望学生能够做到。1995年，刘红忠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2001年，他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近30年的时光，对自己培养的学生，他始终强调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追求“穷其原委，观其汇通”，他门下的研究生的微信群群名也正是这八个字。

刘红忠也将这八个字贯穿到课堂的教学之中。一次在《金融市场学》的博士课程上，他讲到汉代起贵金属在我国很少使用。中国金融史一贯公认的观点是，东汉初期佛教进入中国，在南北朝鼎盛时期各寺院持有或是为寺庙修建消耗了大量的黄金，导致大规模的贵金属不在市场流通。

在讲授这部分的内容时，刘红忠特地介绍

了《洛阳伽蓝记》这部古代著作，通过《洛阳伽蓝记》中对北魏都城洛阳佛教最鼎盛时期的描述，让同学们从历史、文化的逻辑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史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据说周杰伦的《烟花易冷》也有这本书的影子。”刘红忠笑着说。多元文化贯通、学科交叉融合的授课，也让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联通一意，共赴未来

2000年起至2016年，刘红忠担任国际金融系系主任。2001年，复旦大学金融学科被教育部列为金融学6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刘红忠至今还记得那年12月申报重点学科时的现场汇报经历。

终审汇报地点定在北京友谊宾馆，他与学科带头人姜波克教授带着手提电脑入住这家宾馆。在筹备汇报的过程中，他们前后不断修改、完善资料，但宾馆没有打印机，筹备有些不便。他们无意间与一位在京的复旦校友闲聊此事，这位校友便立刻将打印机和打印纸送到宾馆，做好打印机调试工作，提供硬件上的支持。当时，他们还希望能够拜会在京的著名经济学家、复旦经济系校友周叔莲教授，一位校友（周教授的博士生）得知后，便连夜赶到其师母家中，找到此时不在家中的周教授的联系方式。

彼时12月的北京，已经下起了纷纷大雪。然而，复旦校友的热诚的鼓励与支持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忆及过往，刘红忠感慨道：“我们复旦金融的教学、科研成果是过硬的，又有很多校友的热心帮助，最终能得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认定，确实也很不容易。”再回望复旦金融学科逐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福特班25周年合影

渐壮大的历史，感慨之余，他对复旦金融学科的未来报以更大的期望。

2002年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成立时，学校将金融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学科进行建设。在刘红忠看来，很多其他院校都将这一专业所在的系称为“金融系”，而复旦始终保留了“国际金融系”，就是因为国际金融这个方向是复旦金融学科的特色与优势。在学科规划中，金融学科要对标国内、国际高校，发扬优势，补齐短板。同时，课程内容要与时俱进，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实践形势的发展，将新方向、新领域纳入到课程教学体系之中。“这是我们（国际金融系）从1992年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刘红忠坚定地说。

与此同时，在金融研究院的平台上，刘红

忠也在期待跨院系的合作研究，欢迎管理学院、计算机系、数学系等外院系学者申报金融研究课题。学校为此给予了充分的科研、建设经费支持，研究院也为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提供了额外的科研资助。在共同努力下，研究院在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出版了国内第一套金融学研究生层次的系列教材，这套教材也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目前，除了经济学院，复旦金融学科下有许多支金融学教学科研队伍，刘红忠希望能在学校的层面将各院系力量加以整合，更广泛地吸纳有生力量，共同完成跨学科的重大课题攻关。

刘红忠也期待着，无数复旦人联通一意，共赴学科发展的未来。■



2019年，张金清在第四届复旦金融论坛上发言

张金清，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金融创新研究生开放实验室主任、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同时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于2009年至2010年选拔为中组部第十批赴川博士服务团团长并挂任成都金融办副主任。目前，主要从事金融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等研究，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金融风险管理》等教材、著作多部。其较早提出的“不完全偏好下随机最优选择理论”和“不完全风险偏好度量方法”，属该领域研究前沿。

张金清： 踔厉奋发，奋楫笃行，接力共铸学科新高峰

文 | 何思妍

张金清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故事始于2000年。这一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金融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复旦领先全国的研究资源、自由开放的治学氛围和源源不断的优秀学子，深深触动了这位年轻的教师，2002年他决定留校任教，成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的一名教授。在他看来，不论是做学术，或是教书育人，都是一场修行，除了兢兢业业钻研的勇气，更需要责任、自觉与坚持。此等信念也支撑着他在且近23年的时光，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已成为他在复旦从业从教的生动写照。

张金清最初就读的是数学专业，博士阶段研究方转入金融数学领域。长期逻辑思维与数理运算的浸泡，让他对于金融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金融风险管理等基础性的金融数理领域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

20世纪末21世纪初，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由于其公理表达简单、规范，效用函数便于计算并且能较好反映人们的理性风险行为特征，从而成为了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张金清看来，效用函数虽经典，但在解决不确定环境下风险定价以及最优选择、最优投资等方面存有局限性。他开始尝试对经典理论进行改进、发展。1999年，张金清首次对经济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偏好进行了量化分类，提出了不完全偏好意义下随机选择问题中的极大值原理和不动点定理。以此为基础，2002年，张金清撰写并出版了《序方法与均衡分析》一书。该书对著名的Zorn引理、Brezis-Browder定理等都进行了实质性改进与发展，为解决经济均衡的存在

性、均衡资产定价和经济金融中的最优问题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应用更加广泛的研究工具。

早期“不完全偏好下随机最优选择理论”“不完全风险偏好度量方法”等理论创新，也进一步激发了张金清在模糊厌恶下最优投资决策确定方面研究的灵感。2017年，张金清和他的博士生一起通过发现模糊厌恶和风险厌恶对投资策略及其绩效作用机制的差异性，于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期刊上发表了论文Dynamic 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ambiguity aversion。论文首次将模糊厌恶从风险厌恶中分离，并采用鲁棒方法提出了模糊厌恶下动态最优投资原理和模型，实质改进了著名的Markowitz投资选择理论及其许多推广。

2002年，针对当时研究生培养重学术、理论性成果而轻实践的局限，教育部正式启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张金清等一批复旦学者率先响应申报，同年12月，复旦大学“教育部金融创新研究生开放实验室”正式成立。作为全国首批获批的三家实验室之一，更是目前我国唯一的金融领域交叉人才培养平台，复旦大学“教育部金融创新研究生开放实验室”采用了项目指南与自主选题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国高校研究生鼓励课题申报与研究。截至2009年，作为实验室主任，张金清协调实验室资源，共计资助了11批研究生金融创新项目，并顺利完成89项，学生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7篇，实验室项目也由此荣获了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由彭实戈院士、张维教授为正、副组长的7名著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也高度评价此教学创新成果：“特色鲜明，思路新颖，目标明确，措施到位，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传道受业，桃李盈门。
从教30余年，张金清接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亦师亦友”是他收获最多的评价。

养模式的许多方面都有实质性突破和创新，同时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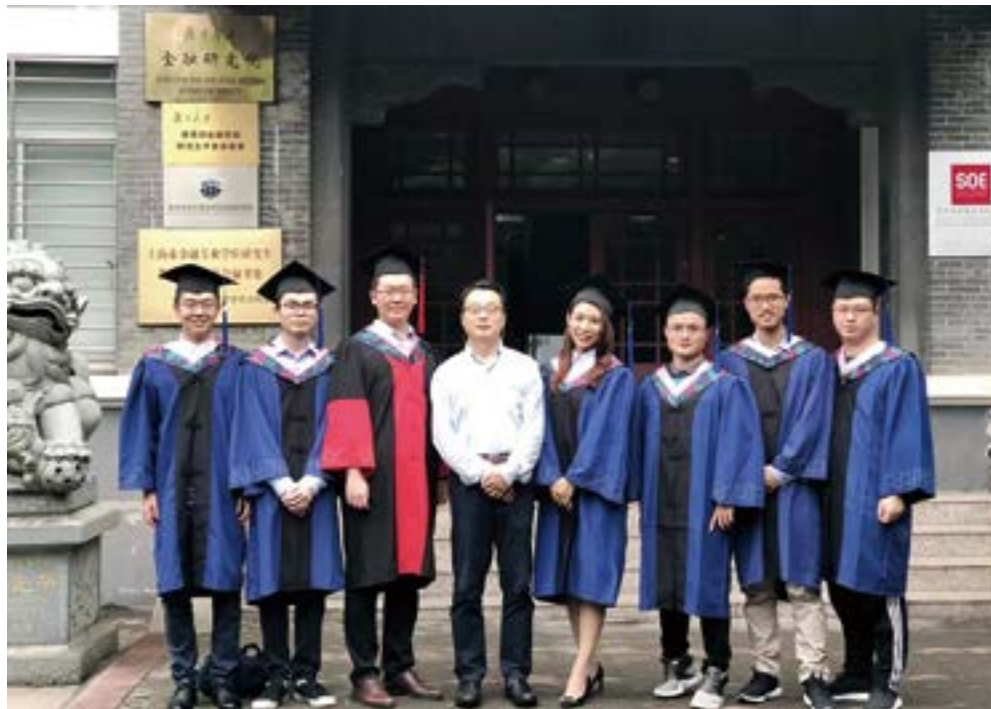
从经济数学、线性代数、到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工程，张金清在大学开设过十余门课程，但对张金清而言，感触最深的当属“金融风险管理”。作为他人入职复旦后开设的首批课程之一，他将全身心都投入其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和配合“基本原理+数理模型+如何应用+实务案例”四要素相结合的授课模

式，2009年，张金清将在复旦教学5年来的经验与研究整理成册，出版了教材《金融风险管理》，该教材对各类风险度量模型与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与评价，迄今已被30多所高校引进采用。2017年，针对市面教材多西方案例、少本土案例的现状，张金清紧密结合“普世理论”与“中国案例”，再次编写出版了《金融风险管理实务》，对实务中7类风险对冲策略的基础、步骤与应用要点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梳理，受到教师、学生还有业界的广泛好评。

2015年，是社会经济形势高速发展与变化的一年。也是这一年，张金清接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在他看来，“求变”是研究生教学与时代对话的最好选择，“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迫在眉睫。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名校经验的基础上，张金清领衔构建了适应于大数据金融、金融科技等新的培养方向，以及以行业分析、人文与职业素养等系列实务课程为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一改原课程体系中内容重复、知识陈旧、与当前实务脱节等问题。同时，与上述课程体系配套的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改革也有序展开。在他的主持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12年，张金清（右）与受邀到我校报告的彭实戈院士以及时任复旦培养办主任廖文武教授合影



张金清与指导的2018年毕业研究生合影

教师深耕中国金融市场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中国案例、讲述中国故事，共成功出版了以张金清《金融风险管理实务》为代表的13本专硕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了4个专业学位项目，进一步提高了复旦大学专硕教育学以致用用的践行力度。上述成果也先后获得了四年一度的优秀教学成果复旦特等奖（2021）和上海市一等奖（2022）。

传道受业，桃李盈门。从教30余年，张金清接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亦师亦友”是他收获最多的评价。每周一次的学术交流会议，每两周一次的非学术讨论，这位学术严格谨慎但日常生活和蔼可亲的老师，始终秉持着以学生为首位的迢迢热忱。在他看来，学生的成就正

是老师成就感的最大来源。基金公司、保险公司、政府机关、独立创业……学生们的未来五花八门、多元绽放，也正是得益于张金清对不同学生、多样性格、差异兴趣的包容与鼓励。

“超越自我、永不放弃”是张金清指导学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成为了他研究时遇挫的自我激励，以及在学校和生活中的处世哲学。张金清，这位已从教30余年的复旦教师、复旦学者，承前辈之果，合众人之力，带领着复旦经济学院多次、也将再次勇攀高峰，让愈来愈多的复旦学者、复旦方案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上流光溢彩、光彩闪耀。■



田素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曾任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

田素华： 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能力的复旦经院人

文 | 温瑞琪

研学求问

1992年，田素华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一家企业从事对外经贸工作。1996年，田素华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庄起善教授；三年后，他继续在经济学院攻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师从洪文达教授。时至今日，田素华仍对在复旦的六年学生生涯记忆犹新。在复旦六年的求学过程中，田素华增加了对经济学学科深度和广度的积累，也学会了更理性、更独立地思考问题。在知识的殿堂求索钻研之余，丰富的复旦校园生活也同样让人难忘。二十多年过去了，田素华和同班同学、上下届的学长学弟之间仍旧会不时小聚，共忆青春岁月，畅谈人生感悟。

200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田素华选择了留校任教。他专长于运用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因素的国际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中国开放经济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他长期坚持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世界经济重大问题，担任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国际投资专委会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撰写的资政报告多次被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采用。

留校任教至今，田素华致力于从国际收支账户、国民收入账户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等账户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系统地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跨国银行、货币政策等问题，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IFDI与OFDI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首席专家。他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1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媒体发表文章数十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17项。出版《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结构变动与效应研究》《东道国国际资本流入结构的成因与管理》《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信贷偏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等专著4部；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刘诗白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国家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等科研奖励20余项。

行政事务

2009年至2014年，田素华担任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负责世界经济系的学科和科研及研究生教务工作。2015年开始，他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负责经济学院本科生培养工作，职责范围包括本科生招生、本科生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本科日常教务管理、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本科生专业分流、推免直升研究生等。

2015年，田素华推动制定了经济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组织了经济学院本科生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工作并坚持每年举办一次。他不仅重视本科生论文的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更希望借助本科生学术论文评选过程中的学术展示和专家讨论，激励与帮助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全方位地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

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2016年，经济学院先后成立了数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四大教研室，并围绕

学科建设发展、课程体系完善与师资队伍优化等方面开展工作。

鉴于不同课程之间内容存在重复,专业课程之间缺乏联系,层次不够分明,以及本科培养体系脱离实践倾向、忽视对学生专业能力塑造等问题,2017年,在张军院长和学院党政班子的领导和支持下,田素华带领经济学院本科教务团队,对经济学院各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课程进行模块化整合,在围绕培养目标设置课程模块的同时,强调不同课程模块之间的补充和递进关系。

2019年,为适应学校“2+X”的培养要求,满足学生成长需要,在学院同仁的热情参与下,田素华与经济学院本科教务团队再次升级经济学院本科生课程体系,结合经济学大类基础课程和经济学专业课程特点,在全院范围内设置8门经济学专业核心学院平台课程,促进经济学院各专业之间的优质师资共享,同时设置全英文课程、荣誉课程,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选读,并启动经济学院本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打造全新的经济学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教书育人

在承担行政工作的同时,田素华对教学工作也投入了大量精力。秉持“做最好的本科教育,读最经典和最前沿的研究文献”的理念,不断地系统化、完备化、科学化授课方式。他为经济学院本科生开设《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两门课程;前者属于专业核心学院平台课程,后者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的专业进阶课程。在研究生教学方面,他开设《国际金融专题》《高级国际经济学》等课程。他担任经济学院本科生专业核心平台课程《国际经济学》的团队负责人,编著出版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政策》教材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主讲的《货币经济学》课程2021年入选上海市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2021年获复旦大学本科教学成果特等奖,2022年获上海市本科教学成果特等奖。

田素华认为,“在教授课程时,除了进行知识讲解外,更重要的是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将知识传授和学生能力塑造紧密结合。”在讲授货币经济学时,田素华不仅会介绍中央银行管理宏观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还



会安排学生分组讨论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组织学生研读美联储等各国中央银行最新的货币政策报告,以加深学生对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授课方法达成了学理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有助于学生能真正地成为课堂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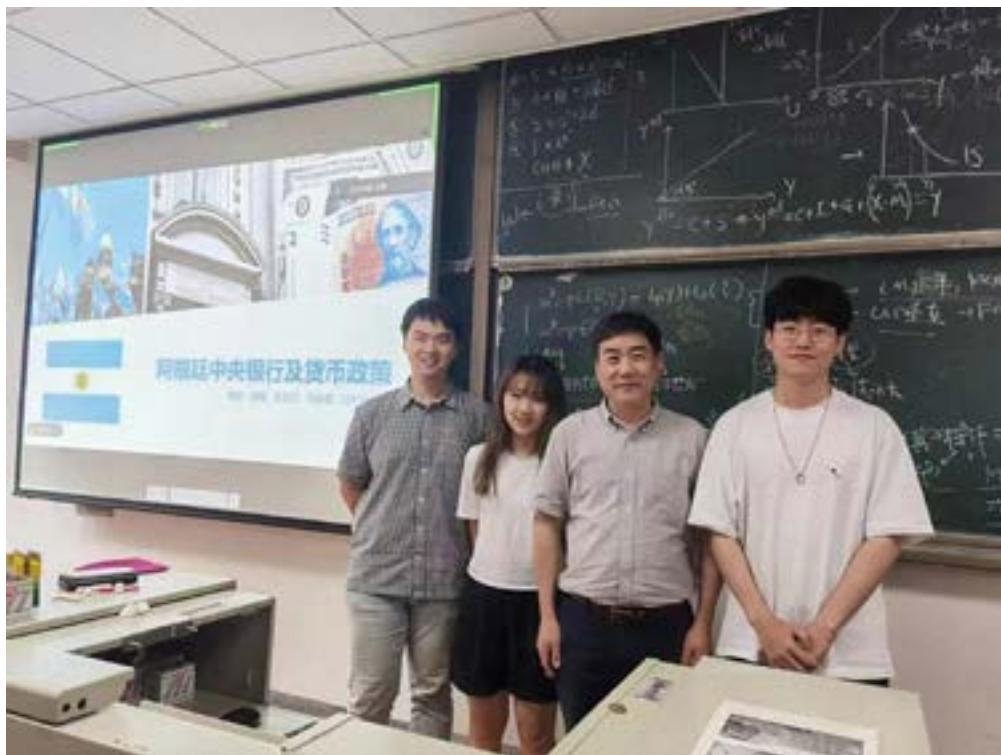
田素华坚持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夯实经济学基本功,强化学生对前沿理论的学习,还致力于用不同的指导方式培养学生。通过项目组会、读书会以及电话、邮件、微信等多种途径,田素华与学生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论是学术问题还是生活问题,他都会与学生认真交流探讨,努力做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他2019年获上海市育才奖,并被评为了2022届复

旦大学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新文科”建设

田素华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学现在的知识学科、专业体系和育人模式大多借鉴于西方国家,但发达国家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构建远远不够。”他眼中的经济学“新文科”建设首先就是从中国本土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汲取养分,讲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和道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他于2018年至2020年组织并完成《世界经济学科和全球宏观经济学发展》调研报告,提出全球宏观经济学建设设想;他撰写的《新文科建设

田素华专长于运用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因素的国际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中国开放经济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与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教学研究论文刊发于《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3期。

“新文科”建设要注重跨学科协同发展，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田素华说，“现在流行的运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学跨学科发展的最典型做法；经济学还需要与更多的学科交叉融合。”2022年，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与大数据学院，携手推出国际经济与贸易-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该项目旨在顺应信息科技发展潮流，通过联合“双专业”的理论与实践协同体系，培养适应大数据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这是经济学院建设“新文科”的一个有力尝试。

未来，田素华期待经济学院不断地提高硬件、软件设施与行政服务效率，集聚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和专家学者，加快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经济学学术高地。田素华希望经济学院的同学“格局大、眼光远，既心系天下又脚踏实地，既有扎实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娴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又有远大理想、家国情怀和豁达胸襟”。



封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经济系系主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担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民盟经济委员会主任等兼职。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保障和公共经济学。其较早提出以经济学视角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并领衔使用微观数据的计量学方法，可谓该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核心领头人之一。

封进： 巾帼雄志，以科学与想象力共筑学科繁荣之路

文 | 何思妍

“以科学方法与想象力探索经济学的魅力”，
是封进对于自己20年学术生涯的精准概括，
也是她未来将持续坚持的理念主张。

封进与复旦大学的缘分始于2003年。当时，一心想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封进，在了解到复旦大学的袁志刚教授为该领域的权威后，便毫不犹豫地前往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后。2005年，封进博士后毕业。由于出色的研究表现与丰富的国际交流背景，封进顺利留校，成为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老师。一丝不苟研究，兢兢业业育人，是她17年从业生涯的生动写照。

封进的研究领域从属“劳动经济学”范畴。在刚进入复旦时，这一领域在复旦，甚至

是全国都处于弱势。“我进行的是社会保障研究，它作为一个跨学科话题，已经有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探究，但经济学视角一直是缺失的。”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经济学视角的开创者之一，在封进看来，经济学视角，不同于公共管理、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它能够为社会保障问题的分析提供个体行为分析的基础，从社会保障和个体行为互动的角度来评估政策效果，完善政策设计。借此，2005年，封进成功申请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健康需求与医疗



封进和学生合影



保障制度建设》，以经济学视角评估了养老和医疗保险效果，以及相关保障制度，实属复旦前沿。

封进还是较早应用微观计量方法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之一。21世纪初，定性方法占据了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主流。但在丁伯根长达一年的访学经历，却让封进对这种主流方法产生了一些质疑。她不禁开始思考：“纯粹依靠理论、逻辑分析，和宏观数据统计的定性研究方法，能否在不同的国情背景下依旧具有普适性。”她开始尝试通过微观数据建立宏观理论与国家现实变量之间的桥梁。

要打破常规并不容易。封进回忆道：“当时

全国，包括清北、复旦等高等学府在内的博士生都对微观数据存有疑虑，特别是当时学术期刊的审核标准也更偏向于主流的定性研究方法，未能提供相对友好的创新环境。”但国外交流期间对计量学等前沿方法的学习了解，让封进始终相信：“微观数据可以通过深入了解个体行为，为政策分析提供基于中国国情的微观基础。”

在此信念的支撑下，封进身先力行，率先应用微观计量方法。2007年，以《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为题的论文发表于著名的《经济研究》，文章利用1997年和2000年农村面板数据，探究了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以

及影响健康的方式，是复旦最早应用该方法产出的具体成果之一。封进、陆铭、陈钊……这一批年轻复旦学者的坚持与倡导，让微观计量经济学在复旦大学得以起步和发展。

2009年，封进开始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后又因院系调整，于2015年被调至公共经济系担任系主任。相比于经济学系，当时的公共经济系成立时间短，人数少，师资结构也不尽合理。为了提高公共经济系的学科实力及影响力，作为系主任的封进绞尽脑汁，鞠躬尽瘁。依托于公共经济系的老牌活动“双周论坛”，封进邀请了毕业于全球各大知名高校的学者为经济学系师生讲座，至今已组织了70余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培育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同时，为了构建更科学完善的学科人才梯队，封进积极与学院领导沟通，大力推进公共经济系的人才引进与留存工作，成功引入了包括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宋弘老师、休斯敦大学的左雪静老师在内的一大批年轻血液，壮大了学科师资队伍。

在封进的带领下，公共经济学系发展迅速，以该系主管的税务专业硕士项目的招生人数为例，已从成立初期的20人增长到了目前的40人，并预计2022年的招生人数还会持续增长至60人。“这也代表，我们的学科品牌愈来愈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认可”。

不仅是学者，更是老师。“王贞、唐珏、谢强……”从教17年，封进接触过上千个学生，却依旧对他们的名字如数家珍。从四大银行，到国企、选调，学生们的最终去向五花八门，但更多的却选择了和老师封进一样的学术道路。封进将这视为一种“传承”：“一个学科要持续发

展，后继无人是不行的”。也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封进每天要花费近7个小时的时间指导所带学生的科研。她所指导的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都留校任教，进一步壮大了公共经济系的学科力量。

醉心学术，勤恳耕耘，立德树人。由于封进在学科领域的不断耕耘，以及始终把学生培养摆至首位的热忱，2021年封进被授予了“长江学者”的荣誉称号，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仅有的六位长江学者中的一员。获此荣称的封进却仍宵衣旰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之中。2021年12月，为响应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在以彭希哲教授、封进教授等为核心的一批学者的倡导与支持下，全国高校第一家实体老龄研究院正式成立，封进教授担任其中的银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她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未来，愈来愈多老龄社会治理的“复旦方案”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以科学方法与想象力探索经济学的魅力”，是封进对于自己20年学术生涯的精准概括，也是她未来将持续坚持的理念主张。封进，这位温和勤恳的女学者，以己之力，与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僚们一同开拓并见证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在全国乃至世界“公共经济学”领域深深印刻下了独属复旦人的智慧。未来，封进也将笔耕不辍，向学界传播更多的复旦声音，推动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的再一次升级。■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公司金融以及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目前担任《中国微观经济学》国家教材主编工作。

寇宗来：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接力共谱复旦经济新华章

文 | 何思妍

复旦大学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寇宗来是跨学科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由此许多人都会问他，当时为何如此“大尺度”地从物理学跨界到经济学。他的答复颇有些哲学意味：人生的轨迹好像是“布朗运动”，关键的转折都来自机缘巧合的碰撞。第一个原因是在大二的时候，班上有位同学买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看，是那本很厚的红宝书。书非借不能读也，他看了之后非常着迷，心生了转修经济学的念头。第二个原因是他曾经跟着上一级的师兄师姐们去了人才招聘会，感到当时物理学专业就业前景相对暗淡，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来自西部边远省份的学生要想在上海工作，还需要获得很难获得的“出省证”，这更加强了他继续深造的念头。第三个原因则是“临门一脚”，他坦言当时跨界考研，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印象颇深的是有一道“第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题完全不知所云，但或许是当年复旦1992和1993级一起毕业的原因，招生名额有所增加，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寇宗来非常喜欢电影《阿甘正传》，格物致理，经世济民，从物理学到经济学，既有均衡的共通之处，又有演进的差别所在，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但他也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拥有

一颗好奇心，因为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寇宗来的研究领域涉猎比较广泛，包括产业组织、创新与知识产权、合约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等。但依照他的事后之见，这些研究似乎都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不断探究“知识”的性质及其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2002年，寇宗来有幸聆听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Jean-Jacques Laffont的激励理论课程，在“法兰西之子”——Laffont教授人格魅力的感召下，2007年，他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赴图卢兹一大的产业经济所 (IDEI) 做博士后研究。Laffont教授是激励理论的大师，倘若不是英年早逝，他应该会与Jean Tirole一同获得2014年的经济学诺奖。Laffont教授更是一名具有领袖气质(chrisma)的创业者，他所创立的IDEI以及后来的图卢兹经济学院 (TSE)，汇聚了包括Tirole在内的一大批法国经济学家，其中许多人是放弃了美国的优渥条件回到法国的，这极大地推动了法国的经济学发展。寇宗来认为，图卢兹的访学经历让他开阔了学术眼界，提升了学术品味，感悟了人生价值。在此期间，他展开的合作研究为专利的创造性要求提供了合理性基础，该论文后来发表在著名期刊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上。依托于由此建立的学术合作和信任关系，TSE著名经



济学家Jacques Cremer教授和Patrick Rey教授先后到复旦开设蒋学模讲座课程。2019年，Tirole教授受邀到复旦访问，此后复旦与TSE就创新与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寇宗来崇尚苏格拉底式的启发式教育，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开放性和批判性的思考，针对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而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形成既关照现实又符合逻辑的独立观

点。寇宗来认为，“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还要普及好的经济学。”为此，他为复旦本科生开设了《经济与社会》通识课，受到了广泛追捧，而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硬核有料，深入浅出，是学生们对这门课程最多的评价。激情是道，理性为径，他普及经济学的另一个实践是开设了“来谈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中“五分钟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作为主要成员，寇宗来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创新一等奖、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而主讲课程《经济与社会》也入选上海市优秀在线课程。

寇宗来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社会科学，而非不问现实的黑板经济学，也不能满足于仅有事后之见的经济解释。作为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对自己的明确定位是做好一名“服务生”，并注重将自己专长的激励理论用到分管的科研、人才和学科工作之中，通过不断优化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改进数据支持和服务工作，尽可能让每位教师都能人尽其才，在科研、教学和服务社会中做出更大贡献。

2022年是复旦经济学科的百年纪念。百年学术，薪火相传。在复旦求学，在复旦任教，寇宗来是一位地道的复旦人。他时常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与学生共勉，以求实现私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任教20年来，他接触带教过已有近千名学生，不管是留在学界，还是进入业界，都希望他们能够践行“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的经院精神。■

复旦大学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
寇宗来是跨学科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刘军梅，副教授，2000年加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曾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10年起至今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分管行政和校友服务。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理论、公共财政、转型经济、数字经济等。

刘军梅： 尽其所能，道在人为

文 | 温瑞琪

“我们正处在一个只要努力就会收获的黄金时代。”
刘军梅说。

1990年，刘军梅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同年经选拔由国家教委公派留学苏联，这是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倒数第二批公派本科生。结束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师范大学的预备系学习之后，基于对经济学的兴趣，她向苏联教育部申请转学到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专攻世界经济，以优异成绩获得本硕及副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刘军梅回到了祖国，并选择扎根上海这座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城市。彼时正逢复旦大学筹备组建俄罗斯研究中心，拥有相关学术背景与扎实研究能力的她顺利应聘、入职了经济学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专精于中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研究工作。

世经所成立于1964年，是由国务院签批的两所外国经济研究机构之一。2000年9月重组后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是经济领域的智库，重点研究世界经济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培养优秀的世界经济学科和涉外经济活动人才的同时，为国家 and 地方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性咨询与研究报告，并为中国的企业如何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等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刘军梅副院长工作认真负责，真诚待人，细心中透着坚毅，柔声中见出智慧。她积极学习与探索行政管理的有效经验，倡导一视同仁地服务师生的理念，不管是资深教授，还是初进校门的学生，均一视同仁、热情服务，尽全力帮助师生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仅如此，在服务效率上，更通过恰当的激励方式推动各部门工作程序的优化，打造凡事有标准、推动有流程、结果有评价的服务体系，进而为实现数字化管理做好准备，让工作的落实更有抓手，使新人能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完善签到制度，设立年终全勤奖，践行“八点上班、五点下班”的工作准则。

刘军梅坦言，行政管理是一项琐碎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工作，费心费力，充满不确定性，但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心尽力做好各项工作。尽管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众口难调，阻力不经意间就会出现，但为了能够给全院师生提供一个良好和谐的后勤保障服务，她仍然任劳任怨，尽己所能，和院办老师一起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到位，成为师生们的好管家、好助手。正如她所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在张军院长的高度重视与直接领导下，刘

军梅同经院校友服务中心的老师们一道，群策群力，开拓创新，扎实推进校友会各项工作，成绩斐然。校友会筹建之时，筹备组向全体校友征集logo，并最终采用了远在美国的经济系1978级王建平校友设计的作品，一个“旦”字反映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复旦精神，一个腾转的“e”字表现了经济学院的蓬勃发展，而多彩的一横则象征着在全球发光发彩的复旦经院校友们。

乙未之秋，时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30年的磨砺，带来经济学各个领域的百花齐放，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焕发出勃勃生机。本着务实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复旦经院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在各界校友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紧张而有序的筹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

于2015年10月11日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作为该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刘军梅出席并任会议主持。

以“探溯学术真谛，思求经世济民，坚持创新发展”为目标，秉持“联谊，互助，责任，发展，荣耀”的宗旨，经院校友会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服务全球校友、助力学院成长、聚焦社会发展的交互平台。目前已在全球各地设立了三十多个校友联络处，聚集当地校友，连接校友资源，使校友和母校形成良好互动、共同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校友会在张军会长和赵定理、俞乃奋两位联席执行会长的领导下，带领秘书处和全体校友们共同努力，聚焦打造了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外滩智本汇沙龙、青年校友讲堂、金浦基金投资实战分享会、全球



校友云讲堂等一系列核心品牌活动，推动建立了佩琳汇、投行俱乐部等行业校友会与兴趣组织。在校友网络建设方面，全方位大力完善校友数据库，支持地方校友联络处建设，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优化校友网络组织。学院还创办了自己的校友杂志《仙舟客》，分享校友们人生的经历与感悟，至今已出版了12期。

经院校友饮水思源，积极助力母校母院事业发展，先后设立了各类奖助学金、捐献了学院发展基金和抗疫物资、赞助论坛活动等，包括实物捐赠的咖啡吧与绿庭花园，关怀与回馈学院。2020年，校友会联合学院生涯发展办公室共同发起“云端战役，再起征程：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的倡议活动，成立“学工+校友”工作小组，结合疫情发展最新形势和学校

就业工作实际情况，与各校友及校友企业对接，积极助力经院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地择业与就业。

作为硕士生导师，刘军梅迄今已指导了一百多位学生。她为所有同门创建了一个大群，时常组织聚会活动，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事业发展、家庭建设心得的共享平台，寄望学长学姐们能为刚刚步入社会的学弟学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提携。

近年来，学院着力打造复旦经济学科升级版，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新气象，例如国际化的发展、本科生URP项目的开拓等等，希望在国内打造一个更具特色、独一无二的经济学院。“我们正处在一个只要努力就会收获的黄金时代。”刘军梅说。



陈钊，1973年1月生，浙江省舟山市人，1991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2001年7月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于2007年11月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学报》副主编，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

陈钊： 做经济领域建设性的批评者

文 | 王嘉怡

二十多年前，一位青葱学子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迈进了复旦的大门，彼时他尚不知会在此度过人生最宝贵的数十载光阴，也不知自己会

全心投入在广袤的学术之原，心甘情愿将美好的青春奉献给这里。这位学子就是陈钊教授。

几年学习下来，陈钊对复旦产生了三个很

——
纵观陈钊的学术生涯，
他始终所求务实创新，科学严谨，同时立足中国发展，大胆放眼世界，
将本土问题和国际方法进行融合。
——

深的印象。首先就是丰富不断的学术活动，他提到当时经院会举行不定期的学术沙龙，像张军老师、李维森老师，还有当时的博士后比如张雄老师，都来参与讨论。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陈钊坦言，虽然从今天的视角反观过去，他们的知识体系与当今学术界最活跃的那批人所用的方法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群老知识分子身上那股安心做学问的踏实与执着，带给他巨大的震撼。除了老教授们的拳拳之心，当时的一批青年学者同样让他佩服不已，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抱着满腔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更加现代的经济学方法，用以思考中国的问题。陈钊清楚地感受到了当时青年学者身上的那种学术热情与思辨意识。

受到经济学院浓厚学术氛围的影响，加之

自己对于经济学的强烈兴趣，陈钊决定在这一方向继续深耕。在复旦经院求学又任职的数十载光阴，陈钊见证了它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经济学学科在进步，经院学者们的方法意识和研究工具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陈钊提到，复旦经院是在国内最早与国际接轨，把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引入进来的学院之一。虽然今天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杂志期刊上的论文抑或是学术宣讲的成果，实证研究或者说是经验研究都占了绝对的主导，但在二十多年前并非如此。陈钊回忆，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更像是学者们进行思辨性的探索或者是做一些理论模型，而复旦经济学院却在以张军教授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引领下，敢为人先，顺应整个学科发展的潮流做出了转变，接轨国际。陈钊也着手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工作，比如关于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户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而在学科发展日新月异之时，有些根植于心的东西却从未改变。在复旦经院，活跃着像陈钊这样的一批70后学者，他们始终关注中国重要的现实问题，保持炽热的人文关怀。这背后所体现出的，不仅是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更是一份家国情怀。陈钊眼中的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看到其中具体的人，力求增进百姓福



祉，而经济学的目标恰恰便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他会从现实关怀角度出发，做经济研究领域中一个建设性的批评者。

陈钊在2007年10月成为了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经济，他早期研究城乡和区域问题，而近来的一些研究则跟产业政策或环境规制等话题有关。在《为和谐而竞争》这项研究中，涉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设计。陈钊认为，过去可能是“为增长而竞争”，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GDP不能完全代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因此就需要转变模式。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将其称之为“为和谐而竞争”，也就是从以前自上而下的“为增长而竞争”的央地治理模式，转化成为自下而上的更多考虑地方政府辖区内老百姓满意程度的治理模式。

陈钊表示，当今的经院保持了国际化的惯例，很多包括他在内的学者都尝试在国际期刊发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研究重要的中国问题，将经济



学现代的分析方法与中国实践做出了完美的结合，学者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从而能获得更加开放的信息，这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陈钊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涉及城乡与区域发展、产业政策、跨国资本流动等方向。他的学术论文不仅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权威期刊，还见诸*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国际学术期刊。近期，陈钊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评估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激励政策，证实了该政策具有社会福利增进的效果，相关成果以首篇位置发表于国际经济学顶尖学术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年第7期。

作为长期深耕于经济学的前辈，对于一些有志于进行相关研究的后辈们，陈钊也表达了恳切的期许。在为人处事方面，一定要有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不能在多变的环境中迷失自己，而在做学问方面则要在打好知识基础的同时，关心现实世界，保持一颗探求真相的好奇心。要记得心无旁骛，方能行远。如果为了一己的利弊得失而不择手段，为了显得自己有多厉害而处处攀比，那终会蒙蔽心智，止步不前。

纵观陈钊的学术生涯，他始终所求务实创新，科学严谨，同时立足中国发展，大胆放眼世界，将本土问题和国际方法进行融合。陈钊接过前辈们的旗帜，身体力行，以身垂范，将经院的学术品格传承下去，这份精神也将激励无数后学攀登高峰。■



许闲，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研究员等。曾获英国科学院牛顿高级学者、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上海市浦江人才等人才项目。目前担任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保险研究》《中国保险》和《上海保险》等期刊编委。许闲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分别是保险财务与会计、灾害管理与巨灾保险、保险科技、保险市场与保险监管。

许闲： 良师益友，创新开拓，谱写复旦保险学的新篇章

文 | 沈娇娇

许闲成为了保险科技领域的拓荒者， 是国内第一个进行保险科技学术研究的学者。

2010年，许闲在德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之后，来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任教。十余载春秋已过，许闲始终致力于保险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专注探索保险学最前沿的学科议题，为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许闲陪伴着一批又一批经院学子成长，谆谆教导、诲人不倦，扮演着良师益友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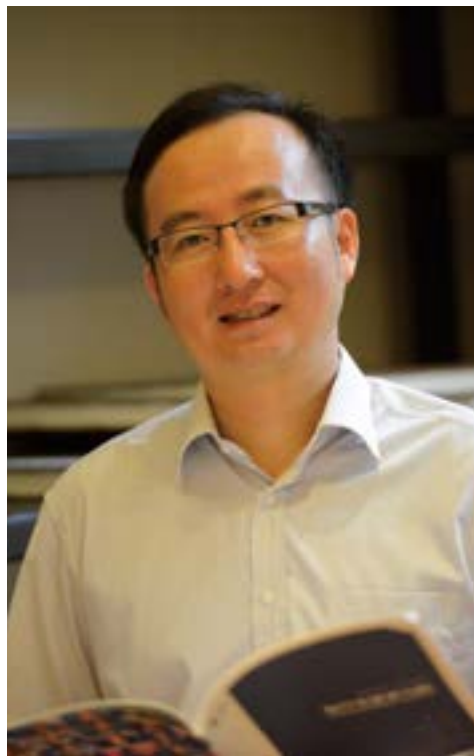
许闲在德国读博期间，恰逢国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地震灾害，分别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玉树地震，致使当地居民蒙受了极大的人身损害和经济损失，这深深地触动了许闲。海外学习和生活经历告诉许闲，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对于地震这种巨灾的损失赔付程度可以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然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甚至不到1%。可以说，巨灾保险在国内尚处于空白。因此，许闲来到复旦任教之后，便投身于灾害管理与巨灾保险这一领域，研究灾害损失评估、自然灾害经济学等，承担了多项与灾害损失有关的课题和项目研究，撰写专著《中国自然灾害经济学研究》，积极推动国内灾害管理和巨灾保险的发展和进步。

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之后，“互联网+金融”这一模式被业内广泛接纳和探讨，国内金融科技行业亦是发展得如火如荼。彼时，众人的目光都聚焦于热度颇高的“FinTech”领域，而“InsurTech”这一概念却鲜为人知。由此，许闲成为了保险科技领域的拓荒者，是国内第一个进行保险科技学术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在新技术的革新必然也会推动保险学科的向前发展。作为开路先锋，许闲一度仿佛“着魔”一般，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绝非易事，他很快面临案例少、数据非标准化等研究难题，但是在许闲的执着努力下，一项项难题都被攻克，许闲撰写了《保险科技：创新运用与商业模式》、《合规科技与监管科技》等多本专著，带领团队发布了诸多保险科技相关的白皮书和文章，承担英国科学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保险学会等多项重要课题，进行行业最前沿的探索和思考。另外，在许闲的组织和牵头下，复旦经济学院开辟先河，成为国内首个开设保险科技课程、首个招收和培养保险科技方向研究生的院校。

此外，在保险市场与保险监管领域，许闲著有专著《保险大国崛起——中国模式》《闲话保险：十年变迁（2007-2016）》；在保险财务与会计领域，亦在国内外多个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

2018年起，许闲开始担任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一职，他在管理岗位上兢兢业业、创新开拓，带领团队为经院师生完成了多个重要贡献。

2019年10月，在许闲的主持下，复旦大学保险教育百年论坛在光华楼隆重举行，论坛上，师生们共同隆重庆祝复旦保险学的百年历史，回顾中国保险业波澜壮阔的过去，同时展望未来美好的未来。然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



经院学子们仅仅只知道复旦保险学系正式建系于2002年，却并不知复旦的保险教育已历经百年沧桑岁月。

复旦大学保险教育最早可以追溯至1919年，1919年的《复旦大学》章程里完整记录了复旦先贤们在商科开设“保险学”“保险利息算学”“保险原理”等保险专业领域的课程，是目前有准确历史档案记载的国内高校最早开设保险教育的史实，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后，复旦大学曾经内迁重庆，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保险教育。

然而，这一段历史蒙尘已久，逐渐无人知晓。许闲也是在一次偶然的会里，恰好阅读到了中国保险学会的一篇文章，提及了这段宝贵的历史。许闲立即向中国保险学会索要了部分史料，并组织、带领学生一同去档案馆寻找资料、翻阅史书，整理史料并编撰成册，重新还原了这段珍贵的回忆。

此外，2019年9月，在许闲及其团队的努力下，复旦大学正式成为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考试豁免认证高校，获得准精算师资格需要通过10门考试，复旦大学一举获得6门Core Principles考试豁免。英国精算师协会是全球历史最为悠久的全球性精算职业协会，其精算职业资格认证是精算教育领域的黄金标准，豁免协议的达成对复旦师生都有重要的意义。

许闲，这位博学多识、儒雅温和的大学教授，深耕科研土壤，主动适应社会和行业要求，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点，不辞辛劳、春风化雨，教导并陪伴着莘莘学子，积极承担新时代使命，为培养中国保险业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詹璐，2006级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2009年至2015年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研秘书，2015年至今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务办公室主任，兼任经济学院工会主席。

詹璐：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文 | 黄琛

选对平台，把握机遇

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毕业到进入经济学院工作，詹璐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詹璐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中的

一门相对特殊的学科，涉及大量经济学专业知识。因此，在读研期间，詹璐便与经济学院的许多“大牛”老师有过接触，并在学习过程中对经济学院的治学风格心生向往。

2009年硕士毕业时，一次机缘巧合，詹璐

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研秘书的工作机会，面临着券商工作和留校之间的选择。詹璐表示，平台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尤其重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是她心目中极佳的新人发展平台。中心由张军老师领衔，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是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流学术平台。得知消息后，张军老师约见詹璐，对中心的情况和科研秘书的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张军的介绍仿佛一针强心剂，更坚定了詹璐留校的信心。

从2009年到2015年，詹璐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了六年，也在大大小小的挑战中获得了成长。2015年，恰逢学院行政人员轮岗，詹璐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学院院务办公室，在更大的平台上迎接挑战。这让她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也有了新的改变。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詹璐的工作主要对接中心老师，工作内容相对固定；但在院务办公室，詹璐需要对接全院的教职工和师生，面向的人群更

广阔、需求维度更多样，每天都有各种突发的临时性需求：来访接待、中转联络、部门协调、服务响应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院务办公室来解决，詹璐和办公室同事几乎包揽了行政服务的所有后勤工作。尽管院务办公室的工作是繁多而琐碎的，詹璐依旧不敢马虎，她表示：

“千万不能让自己的一个滞后或懈怠，影响到学院工作的推进和展开。”在向新进老师介绍院务办公室的工作职责时，詹璐常说：“当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或者不知道该找谁解决的时候，就可以来找我们！我们肯定会帮你想办法解决！”

疫情来临，迎接大考

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来势汹汹，詹璐的工作迎来了一次大考。3月13日起，复旦大学实行准封闭管理，进行线上办公和线上教学。准封闭前一天，詹璐检查了学院大楼、办公室和后勤区的水泵房和电机房等，以确保环境安全、所有人员均已离校，并把最后的一批文件校外送签，再赶着学校关门时间送回校内部门。等办理好所有事项后，詹璐成了最后一批离校的人，出校打卡时距离校园封闭仅剩17分钟。

随着封控时间的延长，在四月份时，有部分老师反映家庭食物短缺的问题。得知该情况，兼任经济学院工会主席的詹璐立马着手制定解决方案，联系校友会、供应商、物流等多方，在院领导、同事和校友的支持下，紧急采购了一批包含蔬果、牛奶、肉蛋奶和口罩的抗疫慰问礼包，在一周内实现了物资送货上门。詹璐坦言那是她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学院老师们的住所非常分散，詹璐在收集好地址后还要进



詹璐在学院教代会上汇报年度工作

詹璐坚信“伟大的成就都是从小地方做起的，最伟大的建筑也是从一颗颗沙石堆积起来的”。

行细致的归类，分区域派送。有一次，订购的菜送到上海时已经很晚了，原本联系好的运输小哥因为等待时间过长取消了订单，詹璐担心第二天送菜会不新鲜，赶忙连夜联系新的配送公司。送菜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关系到最终结果，詹璐一刻也不敢松懈。有时，菜配送到小区门口了，但由于各个小区的管理规范差异，不能送菜上门。詹璐一一和老师们确认，保证所有人都能接收到学院的关怀。她把“绣花功

夫”用在了防疫工作上，用她特有的缜密和细心，把各项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她常说：“我做的是普通的工作，虽然技术难度不高，但能把简单的工作做好，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詹璐既紧张又兴奋，在忙碌中享受着切实解决问题的喜悦。

三月底，眼见封闭管理时间延长，詹璐为了及时处理老师们的审批需求，冒着风险申请返校取公章，并通过多方渠道借到打印纸和墨盒。得益于詹璐的坚持，线上所有行政审批流程正常进行。截止返校当天，詹璐积累了两大包打印纸厚的表单。

十年征途，一同成长

在复旦工作了十余年，詹璐认为经济学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科在国内第一梯队的位置不断稳固，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近几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致力于培养具有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詹璐认为，学院的进步对行政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也在与经济学院共同成长，继续探索前路、建设后勤服务团队，更高效地支持学院科研教学的发展。

詹璐一直是师生心中的“劳模”。中秋节夜晚，学院老师在路过经院大楼时，发现有两个窗口还亮着灯，其中一间就是詹璐的办公室。在



詹璐(中)和工作小伙伴在一起

经济学院30周年院庆那年，詹璐刚就任经济学院院办主任，新上任的她面对着复杂的工作交接，又恰逢院庆有一系列的活动需要筹备。在夜以继日投入的极大的精力后，经济学院30周年院庆得以圆满结束，但詹璐在活动落幕后由于前期消耗太大而病了一个星期。在平日工作时，詹璐的手机从来不开静音，一听到有新通知声音就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打开回复，迅速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她对这份工作的热情、投入与奉献得到了身边师生的一致赞扬。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虽然工作任务繁杂，但詹璐丝毫不因小事而懈怠，她坚信“伟大的成就都是从小地方做起的，最伟大的建筑也是从一颗颗沙石堆积起来的”。对于将要进入职场从事类似工作的同学，詹璐给出的建议是注意情商和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情商不

仅仅体现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包含对自我的定位。行政工作会需要和很多的老师、学生接触，不同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都是不同的，行政工作人员应当要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和大家交流，而不因对方的冷淡或无礼改变自己的态度。而在自我定位方面，詹璐表示，由于行政工作非常繁杂，所以新人难免会被分到一些比较琐碎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不需要被认真对待，无论工作内容如何，都应该怀有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态度。

基于校友和行政老师的两重身份，詹璐对经济学院新生寄语道——“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也是她的人生座右铭。她解释说，世界很大，要选择你真正热爱的事业；一旦选择，就坚定地向着目标奔去，奋力追逐远方。■



詹璐代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市教育系统诵读大赛

《**客**》发展基金



2015年10月，于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之际，学院隆重举行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成立大会，这是学院发展史上的大事件。2016年初，伴随着30周年庆祝活动的余热，首期《仙舟客》被送至各位校友手中。

各位校友或许会记得，复旦大学校园里的700号楼，曾叫仙舟馆，为的是纪念老一辈经济学家薛仙舟先生。建筑背后常常会有动人的故事，在首期杂志中，我们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仙舟馆的风物变迁。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院本身又何尝不像一叶仙舟？风引仙舟，客路相逢，数十载间，我们从远方而来，汇聚到这里，即便有一日离开，也会怀有某种乡愁。一代代人，在这里得到成长，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这本《仙舟客》，记录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老师的故事。这是我们创办这本校友刊物的初衷。

在《仙舟客》中，您可以看到多位经院校友，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灿若群星。您也能在文章中找到您自己熟悉的身影。

时代总是在变，电子媒介今天已是潮流所趋，但我们还是选择做更传统的纸质杂志。我们相信，它触摸上去会有温情。除了文字优美，我们也希望它有好的色彩，好的版式，让您爱不释手，甚至感觉受到款待，像再次回到了校园。

杂志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广大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为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准，扩大赠阅量，特设《仙舟客》发展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专业化采编、队伍培养、扩大赠阅范围等事项。



详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021-55665306

